

《研究·资料与译文》增刊

纪念李大钊诞生九十五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

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三月

D. 111111

说 明

1984年10月,为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北京党史学会和北京师大马列所联合召开了学术讨论会。现将会上的论文汇集出版。(已收入河北社联编印之文集的除外)。

目 录

论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到

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金保珍 (1)

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先驱

——李大钊同志……………尹凤英 (13)

试论李大钊由进化论向阶级论的转变……………张树军 (22)

从忧国忧民的志士到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汪 新 (35)

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先声

——李大钊“平民政治”思想浅析…张济顺 (59)

李大钊同志在我党早期统一战线

工作中的杰出贡献……………曹延玉、谢作黎 (72)

李大钊与冯玉祥……………阎稚新 (85)

李大钊和国民军……………王承璞 (105)

李大钊同志与北京蒙藏学校学生……………赵履谦 (116)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陈泰生 (128)

李大钊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之贡献……………白 桦 (145)

无产阶级解放是妇女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季 华 (153)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与李大钊……………刘茂林 (172)

试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刘庆福 (194)

李大钊图书馆学思想研究……………陶秉福 (209)

论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 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金保珍

李大钊，字守常，生于一八八九年十月，殉难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他原先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十月革命改变了时代的方向，也造就了一代新人的成长。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愧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

(一)

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中国社会的性质、近代革命的任务、工人阶级的基础、思想的准备和个人的努力等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在他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大钊是开路的先锋、领头的人。研究他的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等有着普遍的意义。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斗争接连不断。每一次革命运动都在帝国主义伙同封建主义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中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流产，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加紧对中国的入侵而更加尖锐。中国已处在“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①的危机时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依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主要任务。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斗争的任务决定了中国先进分子必然会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前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帝国主义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入侵，至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新生的无产阶级相应成长和壮大起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工人运动的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阶级基础，也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具备的阶级条件。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的方案，由于袁世凯的篡权而破灭，但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先进人物不灰心不丧气。他们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发起了比以前更为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陈独秀和李大钊是这场运动的主将。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又是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性质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但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在追求个性的解放、民主与自由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遇到了十月革命，才找了解救中国人民真正的出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打开了前进的道路。

上述三个方面是李大钊等一切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这三个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五四运动前已日趋成熟。

考察李大钊的转变，不可完全抛开个人的主观努力，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同处于一时代的人，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自觉地前进，而李大钊又是这少数人中的带头人。

李大钊出身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未出世就死了父亲，母亲也在他不到十六个月的时候离开了人间。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姐妹的李大钊是在祖父的精心抚养下长大成人。大钊的家境无法供他出国学习，在友人的资助下，他才能东渡日本进了早稻田大学。大钊个人的经历对于他后来形成的朴实、谦和、不争权夺利等美德是有关联的。他的经历和美德使他善于接近和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孜孜不倦地为解除人民的痛苦而寻找道路。这一切有利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

大钊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太平天国的英雄事迹曾打动了大钊少年的心灵。他敬慕洪秀全，立志长大要当洪秀全，推翻清王朝。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②从读书识字时起，就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这在他青年时期的著作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充分地验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强烈的爱国主义使李大钊不断探索人生的价值，使他产生了追求真理无止境的上进心、敢于斗争和勇于胜利的进取心、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赤胆忠心。李大钊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又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飞跃而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刻苦学习，善于思考。他学识渊博，懂得日、英等国文字，在日本就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回国后，被蔡元培聘请为北大图书馆主任。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工作的方便条件，使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发生后，能够及时地搜集整理、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这对李大钊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极大帮助的。

当上述列举的主客观条件具备之后，十月革命促成了李大钊的转变。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是顺应历史发展之需要，符合时代潮流之精神。他的转变是一代新人成长的必由之路。这条路是光明的路。历史正在或将要证明，只有这条路，才能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达到共产主义。一切动摇和怀疑这条路的人，请回顾一下李大钊等一代新人辟路的艰难历程，就能以史为镜知兴衰了。

(二)

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一九一八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李大钊的关注。他把十八世纪末期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同二十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进行了比较，找到了两个革命之间的本质区别，明确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③这场革命将对世界历史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号召人们“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④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

协约国一方的胜利而告终。当时，北京城里家家门前插着国旗，人人口里喊着万岁，不管什么人都都在欢天喜地地庆祝政府的胜利，面对这种情况，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对于举国上下庆祝协约国和本国政府的胜利提出了既切中要害又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回的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文章分析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⑤是“大……主义的冲突”。⑥大……主义就是专制主义仗着自己的强力欺压他人主义。既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那么参战的双方都应该被打倒。我们不应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这回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我们应该为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当时，大钊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

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其中心内容是向中国人民宣传十月革命。关于这一点，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有过说明，他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⑦又说：“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⑧文章从十月革命的组织领导者是布尔什维主义到他们奉行马克思主义为“宗主”，以及十月革命经过“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打破障碍社会主义的国家界限，打破“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建立劳工的

世界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⑨文章指出，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⑩文章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⑪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月，李大钊先后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三篇论文表明，李大钊已经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已不是三民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开始成为李大钊奋斗的大目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标志着李大钊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巨大威力，产生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大热情。一九一九年上半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战后之妇人问题》、《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这些文章，尤其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集中反映了他在十月革命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一九一九年二月，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⑫文章号召被侵略被吞并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结成“新亚细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实行“民族自决”。⑬同时，李大钊还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文章指出，中产阶级与劳动阶级“这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各异。”⑭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联合本国和世界无产阶

级的力量，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⑤《战后之妇人问题》谈的虽然是妇女问题，但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两篇文章叙述的问题各异，但都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得出了对内对外都要联合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推翻资本制度的共同结论。

一九一九年二月、三月，李大钊先后发表了《青年与农村》和《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李大钊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思想。知识阶级为什么要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呢？文章分析了中国的实际，“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⑥农村中的“有土农夫”、“专作农工的佃户”和“专待雇佣的工人”受到“厚佣田畴的地主”的“苛待”，^⑦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知识阶级必须到农村去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了解农民受苦的根源，研究解脱他们痛苦的方法，向他们宣传十月革命现代的新文明，启发他们的觉悟。李大钊认为，知识青年只有“开发农村”，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源泉”。^⑧如果农民不解放，那么等于我们全体国民不解放。李大钊在中国首先倡导知识分子同劳工阶级相结合有以下几个考虑，开发农村，教育农民；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实行民主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从总体看，李大钊是从改造中国社会政治以及革命运动发展的前途出发，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思想。这一思想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劳工阶级主要指农民，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主要与农民打成一气，没有把

工人阶级放在首位。但是，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相结合的对象也就从以农民为主体改变而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了。知识分子同劳工阶级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尽管在初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一思想的提出对于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等都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伟大作用。

一九一九年初，李大钊发表的上述文章表明，李大钊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工具，并得出了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结论。李大钊从宣传十月革命发展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他在通往马克思主义的大道上，又继续向前迈出了大步。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第一次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文章摘引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等精典著作的重要段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同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学说等原理，并阐述了自己对这些原理的理解，以便帮助大家搞懂马克思主义，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⑩李大钊赞同阶级斗争，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在于，主张联合劳工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⑪统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这一时期的著

作，李大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几个字，但赞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存在的。用列宁关于“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⑧的标准来衡量，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三)

衡量一个人是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看他的言论，还要看他的行动。看他表里是否如一，言行是否一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口头上或表面上的承认，而是探究其实质。当对其基本原理有了一些理解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讲：“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⑨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李大钊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具有的显著特征。

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中国人民成为李大钊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在早期“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的主要任务。李大钊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从一九一八年七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文以及短评，根据《李大钊选集》统计有二十七篇。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他同陈独秀发起创办《每周评论》，在六、七个月的短时间里，李大钊在该刊上在发表的文章多达五十五篇。^⑩当时，李大钊的文章，其篇幅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深在当代同人中是无与伦比的。

李大钊努力创办各种刊物，开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园

地，组织各种会社，建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一九一八年六月，李大钊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担任《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该会于一九一九年七月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发展最大的革命组织之一，会员多时达百人以上，为中国培养了象毛泽东、邓仲夏、恽代英等大批优秀的干部。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钊担任《国民杂志社》的导师，同年十二月，他同陈独秀创刊《每周评论》。当时，《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最有影响的刊物。李大钊通过这两种刊物做了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李大钊还担任了《新潮》杂志社的顾问。同年冬天，他在北大组织《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在《晨报》付刊上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刊登《共产党宣言》等马、恩的原著。在李大钊和《新青年》的影响下，各地革命刊物和革命组织不断涌现。

应该指出，李大钊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用他当年的话讲，还是“极其贫弱”的。②鲁迅后来也说：“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③用“贫弱”与“未必精当”来评价李大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符合实际的。“贫弱”的说法并不出于自谦。李大钊虽然承认阶级斗争，也赞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正为因这样，我们才说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没有完全摆脱互助、新村主义等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同社会的基本矛盾之间的关系还不能正确理解；对于中国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点还没有透彻的分析；对于中国革命

必须分两步走也还无法清楚。尽管如此，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通通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在指出大钊理论不足的同时又说：“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①李大钊带头自觉地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事迹起到了“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②的巨大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还有陈独秀等革命知识分子都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在大钊的影响下，鲁迅先生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受到压抑的情绪中振作起来，遵奉那“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③发表了《狂人日记》和《药》等小说，从事起“遵命文学”。^④鲁迅先生用他那犀利的笔锋投向那死寂的黑社会，为李大钊等“热情者们”呐喊助威，一同“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⑤李大钊成为鲁迅先生的良师益友。

总之，马克思主义由他开始传入，马克思主义者由他开始诞生，共产主义运动由他亲手开辟。李大钊为中国革命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李大钊生长在新旧民主主义交替的时代，在那风云变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李大钊仅仅生活了三十八年，但他短暂的生命所发出的音响与光华至今犹存。他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勇进！

注：

①《李大钊选集》，第二十六页。

②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总

第23期，第十四至十五页。

- ③《李大钊选集》，第一〇二页。
- ④《李大钊选集》，第一〇四页。
- ⑤《李大钊选集》，第一一〇页。
- ⑥《李大钊选集》，第一〇九页。
- ⑦⑧《李大钊选集》，第二三一页至二三二页。
- ⑨上述引文与观点见《李大钊选集》，第一一四页。
- ⑩《李大钊选集》，第一一一页。
- ⑪《李大钊选集》，第一一七页。
- ⑫《李大钊选集》，第一二七页。
- ⑬《李大钊选集》，第一二九页。
- ⑭《李大钊选集》，第一四四页。
- ⑮《李大钊选集》，第一四五页。
- ⑯《李大钊选集》，第一四六页。
- ⑰上述引文见《李大钊选集》，第一四七页。
- ⑱《李大钊选集》，第一四九页。
- ⑲《李大钊选集》，第一七七页。
- ⑳上述观点见《李大钊选集》，第一九一页。
- ㉑《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九九页。
- ㉒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总第23期，第十五页。
- ㉓《李大钊传》，第五十二页。
- ㉔《李大钊选集》，第一七三页。
- ㉕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一五六页。

⑳ 《李大钊传》，第四十五页。

㉑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第一四九页。

㉓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先驱 ——李大钊同志

尹凤英

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回顾李大钊同志的光辉战斗的一生，使我们深切地感到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更加光彩夺目，因而也就越来越强烈地感染我们、激励我们为早日完成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勇前进！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他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不断地孜孜追求、探索。大钊同志所生长的年代正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之时，这对青年的李大钊的思想给予深刻的影响。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大钊为此而深深的哀痛，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了无限的忧虑，他写了《隐忧篇》与《大哀篇》的文章。随后，他含愤东渡

日本人早稻田大学学习。此时他开始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

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作为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的李大钊亲自起草通电。他满怀悲愤用血和泪写成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文中说道：“寅卯之交，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取皆鸩火。战云四起，倭族乘机，逼我夏宇。我举国父老兄弟姐妹十余年来隐忧惕栗，梦寐弗忘之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噩耗既布，义电交驰。军士变色于疆场，学子愤慨于庠序，商贾喧噪于厘市，农夫激怒于阡陌，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义国死。”“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未负。”接着他列举了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种种罪行，特别是剖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我国的“21条”的实质，他大声疾呼，“中国者为吾四万万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之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最后他说：“九世深仇未复，十年之胆薪何在……愿我国民从兹勿忘以弥天下之耻辱可耳。泣血陈辞，不知所云。”这铿锵有力的感人肺腑的言词深深打动了当时我国四万万同胞之心弦，对当时的反日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卖国贼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李大钊又编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了《国民之新胆》一文，号召全国人民继续斗争。大钊还参与发起组织了反袁的秘密组织神州学会。这时年青的李大钊战斗在爱国斗争的最前列。李大钊一九一六年夏回国后，就积极地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他同陈

独秀，鲁迅等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闯将的作用。他积极地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热情歌颂新生事物，特别是对青年寄予无限的希望。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教导青年说：“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篇文章可以说对当时的青年思想解放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当时的不少青年正是冲破历史之网罗，从陈腐的孔孟之道中解放出来而走向光明，走向革命。李大钊同志不仅给青年指出斗争的目标与方向，而且还鼓舞青年要发扬薪胆精神，“赴国难，雪国耻，再造神州”，他在《晨钟之使命》一文说：青年是什么？是“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他还说：“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他对青年寄予极大的希望，他说：“长驱迈往之青年乎，其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变‘求’之幸福为‘取’之幸福，觅新国家，拓新世界，……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春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高撞自由之钟，以助其进行之勇气”。这字字句句都表现出大钊同志热爱青年的真挚情感和为创造青春之中华与青年共同战斗的决心。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同志深受鼓舞和启发，他以其特有的敏感的政治嗅觉，在比较了各种学说、主义之后，深感马克思主义是拯救苦难中国的

唯一思想武器，所以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皆尽全力而传播之。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发表了第一篇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接着又在北京大学的天安门演讲会上作了《庶民的胜利》演说，又连续发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新纪元》《战后之世界潮流》等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与演说中，他热烈地赞扬了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兴奋地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郑重地宣布：“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的声，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这表明了李大钊同志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人类的命运，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决心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这时李大钊同志的视线转到中国劳苦大众的身上，他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的文章。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三月写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牛马）《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从这些文章中表明，李大钊同志认识到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最严重，最痛苦的阶级。因而也是革命的真正主力军，所以他号召知识青年应与工农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仍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全体的愚暗”，他教导青年

说：“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病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呵！”这就为知识青年指出了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也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相结合指明了方向。也就在这时，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从未有过的伟大事件即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由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由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号召下，爆发了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线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作为青年思想领袖的李大钊同志积极地投入这场运动中，他夜以继日地与青年并肩战斗。他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指导运动。如他发表的《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对把学生运动推向各界起了号召与指导作用。他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为运动指明了远大的政治目标，号召中国人民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积极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亲自到热闹街市散发传单，还派骨干学生邓中夏、许德珩等到外地串联，扩大影响。特别是六三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这一伟大运动获得最后胜利，这使大钊深受启发，更加转向了工人阶级。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时，大钊又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从而捍卫和保护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在这前后，即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月大钊发表了长篇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深刻地论述了“唯物史

观”“经济论”和“阶级竞争论”，明确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也表明了李大钊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这时，李大钊同志的爱主义思想发生了突变，升华，也就是说，李大钊同志的爱国主义思想又赋予了新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标志着李大钊同志的世界观发生根本的转变即由一个激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李大钊同志，在多年的奋斗中，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面对面的斗争中，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由一个炽烈地爱国主义战士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在比较了各种学说，各种主义之后，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思想武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由中国人民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经过无数的失败而证明的真理，作为一个先进的思想家，一个真正的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李大钊同志，首先认识到这一真理，因而他紧紧追随时代的发展，适时地使自己的世界观完成了转变，从而由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李大钊同志的思想转变，世界观转变，就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第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社会在中国扎下根的人，因而，李大钊同志是我国共产主义先驱。从此，李大钊同志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从未停息，从未手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发展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在一九二〇年初曾和陈独秀一起酝酿建党问题。一九二〇年四月他与共产

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建立了联系，并在他的介绍下，一行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谈，研究建党问题，一九二〇年八月上海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十月，北京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也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虽然大钊同志未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建立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故有“南陈北李”之说。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中央委员。党建立后，李大钊一直作指导北方党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派出许多同志到晋、鲁、豫、陕，内蒙与东北等广大地区开展工作。为了推进中国革命他还积极主张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他受两党委托，领导两党的北方工作，直接威胁了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中枢北京的中央政府。由于李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也是大钊同志所以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李大钊同志曾多次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特别是在三一八惨案中与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战斗从而负伤。但他仍继续坚持斗争。当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入京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许多同志与亲友劝大钊同志离开北京但都遭到他的拒绝。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等八十余人，其中包括大钊的妻女在内。凶残的敌人对大钊同志施以各种酷刑，但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他在狱中亲笔写了所谓的“供状”即《狱中自述》，他记述了自己为挽救民族与国家的危亡，为解放中国的劳苦工农大众而英勇奋斗的

壮丽的一生，表述了自己革命到底的坚定信仰和伟大的抱负。最后他自豪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晦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这就是，大钊同志对自己为国，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作了总结，用自己的行为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也表现了身陷囹圄的大钊同志仍念念不忘“再造”和振兴青春之中华。同时也表明了他要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来换取与其一同被捕的青年们的自由真是“敢抛热血，护新生”。大钊同志在狱中斗争的事迹为世人所感动，据当时北京晨报等报纸报导，李大钊受敌审判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自谓平素信仰共产主义，侃侃而谈，不愧为革命志士本色”。大钊在他的生命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党和革命事业，“在狱二十余日，绝口不提家事”，据与其同时被捕的大女儿李星华同志回忆说：“在法庭曾见过父亲一面，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既不愉快，也不伤心，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笼罩了大钊同志的整个精神。李大钊同志在全国人民心中有极高的威信，当时被捕消息传出后，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震动，社会名流与学者，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无不万分悲痛，各界都在纷纷奔走设法营救。北京地下党也极力组织营救，北京铁路工人准备组织劫狱队，但遭到大钊的拒绝，北京二十五所大学校长开会，发表书面声明，大钊同乡也写信。当时报纸指导“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但灭绝人性的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革命群众与社会舆论的谴责，于

四月二十八日公然审讯和杀害大钊等被捕的革命同志，大钊同志第一个从容地、昂然地走上绞刑台，他还是穿着那件灰布棉袍，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大钊同志为了青春中华的到来，赤旗世界的到来，而壮烈牺牲了。

李大钊同志一生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自己的座右铭，他的道义和文章影响和感染了中国整整一代青年，不仅是第一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钊同志情操高尚，他用自己的全部言行，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箴言。他道义感人，一生艰苦朴素，虽然他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工资不低，每月一百八十银元，但他生前为了资助党的活动经费和穷苦学生，一直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苦生活，而他死后却连安葬费都没有，如当时报纸所说：“守常先生身后萧条，两袖清风”。

李大钊同志虽然牺牲多年了，但他那爱国爱民的高尚道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紧跟时代前进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光辉榜样。我们一定要继承大钊同志的革命遗志，发扬他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为振兴中华，为把我国建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继续奋斗！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

①《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试论李大钊由进化论 向阶级论的转变

张树军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反帝爱国、救亡图存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最迫切的课题，国家富强自立被推到了当务之急的首位。先进的思想家从西方搬来了他们认为可以挽救民族危亡，使国家富强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武器。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便是其中主要的，影响过几代爱国志士的学说之一。生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开端时代的李大钊，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并以此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但是，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①。现实斗争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李大钊逐步对进化论由怀疑到批判，最后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转变。本文试图对这一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作一粗略分析。

李大钊最初也是进化论的信奉者。他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它无力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

成。李大钊看到：帝国主义列强仍旧步步紧逼，“包藏祸心”^②，图谋瓜分中国。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少数“骄横豪暴之流”^③所篡夺，“民国之最高权”^④落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之手。在他的反动统治之下，“真理大义，暗而不明，郁而不彰”^⑤；“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芑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⑥，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等成为“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⑦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残破到如此程度，现实证明：“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⑧中国不仅没有富强自立，相反却更加贫弱了。这一切，激励着李大钊这样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去寻找拯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那么，在当时的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什么呢？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与剥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缓慢，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还不够壮大，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讲求静止，“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显然不符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口味。而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也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因此，进化论在这时还没有丧失其生命力，还有一定的市场。尽管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好印象，但是在没有找到新的理论武器之前，强调进化、“适者生存”，仍旧是非常合乎李大钊这样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需要的发奋自强的思想武器。李大钊正是被这种理论激发起爱国的热

情，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李大钊从少年时代起，耳闻目睹了中国内忧外患的惨境，“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从而推动他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大量阅读了中外思想家的著作，“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⑨。这些，就成为他接受进化论，成为进化论者的思想基础。

从辛亥革命后到1917年初，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运用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写下了大量揭露帝国主义和抨击时政的文章，提出了“青春中华”的理想。

第一，李大钊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痛恨辛亥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山东和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他运用进化论，写下了《国耻纪念录》、《国民之新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章，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揭露了“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和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号召国民奋起自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痛史”，指出日本侵华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二十一条”一旦签订，“国将由此不国矣”^⑩。但是，只要我国民“卧薪尝胆”，奋起自救，“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⑪。他警告日本帝国主义，“今日以之亡中国，异日即以亡其日本”^⑫。对于国民应如何去做，李大钊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指出，“国民而不愿为亡国之国民，亦宜痛自奋发，各于其本分之内，竭力振作其精神，发挥其本能，锻炼其体魄，平时责其知能才艺于社会，以充

足社会之实力，隐与吾仇竞争于和平之中；战时则各携其平时才智聪明素积之绩效，贡其精忠碧血于国家。吾辈学生，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想，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宜时摭其湛深之思考，施以精巧之应用，谋我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诚以精神具万能之势力，苟克持之以诚毅，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⑩很明显，李大钊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中国要自强图存，首先赖于组成国家的无数细胞即国民个体“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素质。这里，尽管存在着斯宾塞所宣扬的以庸俗进化论为依据的社会有机体论的痕迹，但是，李大钊发奋图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第二，李大钊站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上，不满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的专制主义统治，在《民彝与政治》等文章中，以进化论为依据，痛斥了君主专制政治的反动性，阐明了代议政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需求。中国大地物博，人口众多，在历史上曾走在世界前列，为什么到近代则落后挨打了呢？他说：“余思之，且重思之，则君主专制之祸耳”。因此，他提出要打倒君主专制制度，“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⑪。在推翻专制制度之后，建立像西方文明先进之国那样的“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⑫。据此，他还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批判。李大钊从进化论出发，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替封建专制制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的思想。

与此相联系，李大钊还以进化论为依据，批判了思想文

化领域里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指出：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尊孔复古是“专制复活之先声”^⑧。因此，他从宇宙不断发展进化，社会不断前进的观点出发，进一步说明“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一切旧思想旧道德“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而代之以“自然进化”^⑨之新思想新道德。

第三，在这个时期，最能反映李大钊进化论思想的是他的“青春”观。在《〈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章中，他把袁世凯称帝的覆灭，看成是“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基础，号召人们“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⑩。他号召青年“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⑪，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⑫。只有这样，“白首中华”才能变为“青春中华”，只有打破守旧的社会，才能创造出新的社会，“再生”和“创造”出一种“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⑬的国家制度。显然，李大钊以进化论为依据，从新旧对立和“青春”“白首”的对立中，论证了“青春中华”再生的必然。这种理想在当时虽然是无法实现的，但它激励着人们不断进取，勇往直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方面，李大钊在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之前，受进化论的影响是很深的。由于他还没有树立阶级的观点，对于新旧事物的本质认识是模糊的。《青春》一文中，他赞扬“其校新者，惟德意志与勃牙利，此次血战洪涛中，又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发，以挥展其天

才矣”^②。这显然是依进化论而导出的错误结论。但另一方面，进化论又不能概括或代表李大钊思想的全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在日本留学期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尤其是对进化论中发展变化思想的着重注意，又使他的思想萌发着某些新的因素。这就为他后来向阶级论转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二

从1917年开始，直到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从怀疑进化论到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的时期。

为什么在1917年李大钊开始对进化论产生怀疑呢？李大钊于1916年4月底从日本回国后，先后担任《晨钟报》和《甲寅》日刊的编辑。从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看，其主要内容是痛斥“军国主义”和军阀政客的“腕力主义”，提倡民主主义。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激进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他的进化论观念发生了矛盾。同时，李大钊亲身参加斗争实践的体验，也不断教育着他。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先生”老是欺负“学生”的严酷现实；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失败，将近两年的新文化运动所表明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软弱无力，都促使他逐渐对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产生了怀疑，也促使他逐渐认识到进化论的弊病。另外，进化论本身的缺陷，强调“弱肉强食”，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贼丧权辱国的口实。这也从反面促进了李大钊对进化论的怀疑。

基于上述认识，1917年3月，李大钊发表了《战争与人口

问题》一文，从反帝的立场出发，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驳斥了帝国主义宣扬的“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的谬论。他指出：帝国主义宣扬的“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无演之义，万无可逃者也。此其所据，全根于马尔萨斯之人口论与达尔文之天演论”。^③他列举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四大缺点后指出，“有此四者，野心家乃取以与达尔文之天演论并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以有今日之惨祸”^④。而“达尔文之天演论，盖深感于斯说而著也”^⑤。这样，李大钊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联系起来，揭露了其“近世侵略家”服务的真面目。这种认识是李大钊对进化论产生怀疑的开始。

李大钊真正向阶级论转变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转变的契机是十月革命对他的影响。十月革命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已经由进化论者转变成为阶级论者。主要表现在：

第一，李大钊开始用阶级观点分析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从阶级本质上对法俄革命进行了比较，揭示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当全国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欢之时，他冷静地用阶级分析方法加以考察，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对军国主义的胜利。他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时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

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②，从而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同时，他还主张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民，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③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明确指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④乃是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

李大钊还试图用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他在《新纪元》一文中，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指出：“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⑤。在分析农村阶级状况时，他指出：佃农与雇工受压迫和剥削最重，生活最苦，要彻底改造中国，就要发动广大农民。

“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全体国民不解放”^⑥。他号召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宣传与组织农民，打倒掠夺农民的强盗。李大钊也很重视妇女解放问题，认为妇女运动“带有阶级的性质”^⑦，资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的利益根本不同。在论及妇女卖淫问题时，他指出：这是“因为有一个强制妇女不得不去卖淫的社会组织在那里存在”，所以“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⑧，只有“根本改造”旧的社会制度，才能使整个社会获得解放。上述一切说明，李大钊已经树立了阶级观点。

第二，李大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

学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强调马克思三个组成部分的“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具有不可分的联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他引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的论断，阐明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与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观点。进而他论述了阶级斗争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指出：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⑧。这样，李大钊不仅本身已经基本掌握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且也把运用这一革命学说去求解放的方法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三，李大钊批判了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取消阶级斗争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到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⑨。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他批判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谬论，主张“根本解决”。对于如何“根本解决”，在论述了经济变动是一切表面构造变动的基础之后，他强调指出：如果只信这经济变动是必然的，而对“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⑩。在这里，李大钊通过批判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阐述了阶级斗争对于社会改造的重要作用，表现了他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坚定信仰。

综上所述表明，在五四时期，尤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为标志，李大钊已经由一个进化论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了。但是，应当指出，这个时期，在

李大钊的思想中，进化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清除，先是“调和论”后是“互助论”在他的思想中还严重存在着。这当然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间不长，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还不太有关，同时也与当时思想界的复杂局面有关。而李大钊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不断前进。后来，他不断清除自己思想中不正确的因素，到1924年以后，就完全抛弃了“互助论”的思想影响，而成为一个完全的阶级论者了。因此，对于五四时期他的思想中某些不正确因素，我们不能过分苛求。

三

李大钊从运用进化论到怀疑进化论，进而转变为阶级论者，并不是偶然的。分析其转变的原因，对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普列汉诺夫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其中心的一环，都有为这种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固然没有改变，救亡图存一直是首要的主题，但每个发展阶段的社会内容却各具特色。李大钊投身于斗争的时代，虽然仍旧内忧外患极为严重，但是，辛亥革命毕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变化，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成长壮大起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随之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时代特色。这些就成为李大钊逐渐由进化论转向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重要因素。

其次，李大钊在运用进化论的同时，抓住其中关于发展

变化的合理部分，从唯物论出发，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思想，由进化论进到了一种辩证的观点。李大钊的唯物论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他指出：“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道德者，宇宙现象之一也。故其发生进化亦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而其自然变迁，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⑳不仅如此，更可贵的是李大钊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辩证法的思想。他认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㉑。“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㉒也就是说，物质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永远处在矛盾运动之中。列宁认为：“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从前面我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李大钊的发展观应该属于后者，并且已经有了某些唯物辩证法因素。这对于他划清与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界线，接受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由进化论转变为阶级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再次，李大钊不但是—位思想家，更重要的他是一位革命家，亲身参加了实际斗争。从1912年加入中国社会党，到1919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从参加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复辟的活动到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从1912年发表《隐忧篇》到后来主编《新青年》等报刊，李大钊在许多方面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活动，这种经历和实践经验必然会对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作用，促进他思考问题，

探求真理，从而逐步放弃进化论，而向马克思主义阶级论靠拢。

最后，李大钊在亲身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中，逐步认识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他批判了“历史英雄论”，认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刻英雄无势力焉”。^①“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②。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力量，更使他这种认识加深了一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认识到这种程度，对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阶级论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李大钊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同马克思主义代替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一样，是合乎规律的发展。应当指出，李大钊由进化论向阶级论的转变，是五四时期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转变的缩影。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多信奉过进化论，从此为武器，由爱国而革命。但是谁最后转变为阶级论者，谁就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反之，则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和历史的无情淘汰者，这是一条规律。因此，我们研究李大钊由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的过程及其原因，对于我们理解五四时期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2页。

②北洋法政学会：《支那分割之运命驳义议》

③《李大钊选集》第1页

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25页

⑤李大钊《是非篇》：《言治》第1年第4期

- ⑥《李大钊选集》第3页
- ⑦李大钊：《隐忧篇》，《言治》第1年第3期
- ⑧《李大钊选集》第1页
- ⑨李大钊：《狱中自述》
- ⑩《李大钊选集》第8页
- ⑪《李大钊选集》第27页
- ⑫《李大钊选集》第25页
- ⑬《李大钊选集》第17页
- ⑭《李大钊选集》第56页
- ⑮《李大钊选集》第40页
- ⑯《李大钊选集》第77页
- ⑰《李大钊选集》第80页
- ⑱《李大钊选集》第62页
- ⑲《李大钊选集》第63页
- ⑳《李大钊选集》第75页
- ㉑《李大钊选集》第50页
- ㉒《李大钊选集》第70页
- ㉓《李大钊选集》第83页
- ㉔《李大钊选集》第84—85页
- ㉕《李大钊选集》第84页
- ㉖《李大钊选集》第110页
- ㉗《李大钊选集》第129页
- ㉘《李大钊选集》第130页
- ㉙《李大钊选集》第121页
- ㉚《李大钊选集》第146页
- ㉛《李大钊选集》第144页

- ⑳ 《李大钊选集》第145页
- ㉑ 《李大钊选集》第177页
- ㉒ 《李大钊选集》第234页
- ㉓ 《李大钊选集》第233—234页
- ㉔ 《李大钊选集》第79页
- ㉕ 《李大钊选集》第93页
- ㉖ 《李大钊选集》第95页
- ㉗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
- ㉘ 《李大钊选集》第48页
- ㉙ 《李大钊选集》第46页

从忧国忧民的志士到无 产阶级革命先驱

——试析李大钊同志“五四”前后
反帝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

汪 新

李大钊同志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出现的一位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爱国救国的杰出战士。他毕生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而竭尽心力，直至献出生命。从一位忧国忧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最终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反帝爱国思想始终是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为了“反帝”和“爱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这样的奋斗目标，促使李大钊同志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因此，剖析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的发展过程，对于认识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乃历史必然，对于我们学习革命先烈崇尚真理、奋进不止的革命精神，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同志早期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为悠久的爱国传统，历史上我国曾涌现出无数的爱国志士。无论是古代的民族英雄，还是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直到与大钊同时的革命者，他们都怀着对民族的深厚感情，谱写了一曲曲爱国救国的光辉篇章。但是“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①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们进行斗争的方针和对象也各有不同。一八四〇年以后，在帝国主义用大炮加鸦片叩开中国大门，民族陷于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人民就把自己的爱国心集中表现为，对祖国河山破碎、对人民规律生活的满腔悲愤，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于是热爱祖国，痛惜人民的遭遇，关心民族的前途命运，就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了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历史环境。少年时的李大钊“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②青年时期在他对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之后，便“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③不断地探求着挽救祖国的真理，广泛地涉猎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思想。这样“随政治知识之日进”^④逐渐形成了他的早期反帝爱国

思想。

其主要表现有两大方面：

（一）忧国忧民

大钊同志的忧国忧民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隐忧篇》、《论民权之旁落》、《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大哀篇》等著作中。

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帝，但革命果实却为封建军阀袁世凯窃夺。中国人民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暴统治下呻吟。大钊同志悲愤地写道“则革命以前吾民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患在数十专制都督。”^⑤他以敏锐的政治感觉认识到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⑥他不但对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且还清醒地觉察到民族危机的进一步严重，他看到，封建军阀们争斗不息，列强“包藏祸心”，图谋不轨，中国被瓜分之危险依然存在，为此，他大声疾呼，唤起人们爱国救亡“以为国人当头棒喝，惊梦之钟，知耻知惧竟奋图存。”^⑦大钊同志很早就看出了以袁世凯为首北洋军阀统治的封建专制实质。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加强镇压人民和南方革命力量的实力，一方面加重了对人民的经济剥削，下令在恢复清朝旧税同时又征新税；另一方面北洋政府不惜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政治借款。这就使所谓的“民国”更为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政治局面更为黑暗。对此大钊同志尖锐抨击“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

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⑧“共和”带来的只是国家的库帑空虚，岁出增巨”^⑨只是人民的“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煨焉，不得安其居。”^⑩而那些军阀官僚们却自命为“建国元勋”、“功臣”，实则盘距各省“贱视其治下之民微若蚊虻，淫威肆虐。惟所欲为。”^⑪所谓的中央政府又是那样一个“陵乱黔首”、“护持元恶”、“抑塞土气，摧折人权”^⑫的黑暗政府，人民根本无民主、自由可言。这深深地刺激着大钊同志，使他叹息：“呜乎，吾中国之待亡久矣。”^⑬

上述，反映了大钊同志对祖国对民族前途的深切关注，对人民苦难命运的深切同情。忧国忧民是李大钊早期反帝国主义思想的萌发基础。

（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忙于厮杀，无暇东顾之机，图谋独霸中国。它借口在军事上对德宣战，出兵我国山东，强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接着又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此作为支持袁世凯作儿皇帝的条件。所以，这时中国的民族危机突出表现在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上。中国人民这一时期的反帝斗争，也就集中表现为以反对“二十一条”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救亡运动上。在这一斗争热潮中，大钊同志站在前列，启发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斗志，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位杰出战士。他通过自己的大量著述鲜明地提出反日救亡的救国主张。

第一，他揭露了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暗相勾结，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提醒人们要了解自己的国情，主宰本国的命

运。

为了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更忠顺的奴仆，帝国主义分子大造反对舆论。日本在华所谓顾问有贺长雄，以及美国顾问古德诺等，故意胡乱编造中国的“国情”。他们胡说什么，中国人“重视家族，淡于政”，自昔无选举制度”，^⑭他们还淫蔑中国人民“无参政能力”，“中国不宜行代议政治”。^⑮企图阻止中国民主思潮的发展。束缚人民反袁斗争的手脚。对这些谬论，大钊同志坚决地予以驳斥。他说：这些顾问所论之国情，完全是美日的国情，“非吾之纯确国情也。”^⑯这实际上就是“欲证吾已往之国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⑰完全中在为袁世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行为张目。因此，大钊同志告诫人们“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⑱我们绝不能盲目地信从外人。要自己明了本国之国情，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否则将祸患无穷。

第二，他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行为，号召人们起而斗争，挽救祖国的危亡。

在帝国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和威逼面前，如何掌握本国的命运呢？只有起而斗争。为了激励人们进行反日斗争，推动爱国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大钊同志痛陈了五四运动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发动三次侵略掠夺战争的事实。甲午中日战争使中国“丧师割地”，日俄战争“以我国为战场，我反作壁上观，其结果敌势日昌；”日德战争“竟欲演亡韩之惨剧于中国。”^⑲大钊同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出兵我国山东，其真正企图“不在报德之前仇，非为履英之盟约，”不过是“欲借

端以树兵威于我大陆。”^②想在军事上占领中国罢了。而那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更是“全出于强盗乘火劫掠之行径，对于中国纯用迫胁威吓之术，对于世界则取欺瞒诈骗之方，国际上不信不义之交涉，莫过是也。”^③如果依了“二十一条”那就会使我国“既丧目前之权利，更萌异日之祸根。”^④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形势下，大钊同志呼吁中国人民，发扬卧薪尝胆之志气，以“破斧沉舟之决心”，“出其丹心碧血。”^⑤坚决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第三，他初步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坚定地提出了日本不能灭亡中国的论断。

在严迫的形势下，大钊同志从未丧失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他从人民群众反日斗争的实践中，初步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坚信“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⑥从而把战胜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军士变色于疆场，学子愤懑于庠序，商贾喧噪于厘市，农夫激怒于阡陌，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⑦有这样的人民，则“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之前。”^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以上就是大钊同志早期反帝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的两大方面，这也构成了他以后反帝爱国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大钊同志是从人民的利益，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怀着兴民族的大志，去求索真理参加反帝斗争的。他的反帝主张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所作的揭露也是很深刻的。我们还可以看出：大钊同志既对广大人民的遭遇寄予了无限同情，又初步地看到

了人民的力量。因此，他对反帝爱国斗争的结局是充满必胜信心的。大钊同志早期反帝爱国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在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以前，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也是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不及的，足以令我们后人感奋、学习和敬佩。

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的早期反帝爱国思想也存在一些不足。他的反帝主张当时主要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而对其它帝国主义的警惕不够，甚至对英美还抱有幻想。例如，他曾在正确斥责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极东门罗主义”同时，却又错误地赞扬了美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最初也认为是“公理”和“强权”之争，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公理、正义”虚伪口号誉为“平和之曙光”^②此外，他虽然认定有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灭亡中国，但同时却也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均势”“群雄角逐”能使中国“赖以苟安”“不即亡”^③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不过是争夺脏物的狗咬狗之争，它们在对外扩张，以掠夺弱小民族为满足的侵略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大钊同志的早期反帝爱国思想中，虽然也同情关心人民的疾苦，并初步看到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伟力，但他有时又认为群众是“浑噩”“无方”的^④大钊同志当时反对帝国主义所借用的思想武器，也主要是进化论。例如，他除了对人民力量有初步认识外，也认为“前此四千余年，吾民族既于天演之中，宅优胜之位置，天道未改，种性犹存，胡竟昔荣而今枯，昔畅而今萎。或者盛衰剥复之几，此暂见之小波澜，正为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之因缘。”^⑤这虽然也能起到鼓舞人民的作用，但毕竟不科学，不能循此找到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正

确道路。至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大钊同志的早期思想也未能达到明确、科学的认识。上述种种局限说明，他的早期反帝爱国思想，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范畴之内。

二、李大钊同志反帝爱国主义思想的重大发展

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发生质的飞跃，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稍后这段时间内，大钊同志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战后之世界潮流》、《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等多篇重要文章，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宇宙观分析帝国主义，观察中国与世界。他开始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爱国者，向坚定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者转变，其反帝爱国思想也相应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有三点表现：

（一）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高度评价俄国“十月革命”。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包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以及战争性质的认识是十分模糊、错误的。不少认为交战双方中的协约国代表“公理”，同盟国代表“强权”。战争最后的结局是“公理战胜了强权”。而大钊同志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后，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为中国人民揭示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真正实质。

早在1917年3月，大钊同志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就批判了那种战争是由于人口过多而引起的错误观点。他指出：这种主张“全根于马尔萨斯之人口论与达尔文天演论。”^④他认为产生战争的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贫惰之根性未除。”^⑤这一认识虽然还未必精当全面，但毕竟已经触及到帝国主义本质的某些方面。以后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掌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认识就开始科学和深刻了。他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这次大战的起因，得出结论：这次大战是“大……主义”冲突的结果，而“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⑥大钊同志还认为：这次大战从根本上来讲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家界限以内，不能涵容它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以便“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⑦这就造成各帝国主义之间彼此争斗，终至爆发大战。大钊同志进而认识到各帝国主义的参战，都不过是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⑧在战争中广大劳动群众得到的只有生命财产的牺牲和凄惨的遭遇。所以这次战争的实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⑨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厮杀，而根本不是什么“公理”与“强权”之争。大钊同志上述分析是我国思想界最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质作出的正确揭示。

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十月革命又该如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给予正确的评价呢？大钊同志从十月革命的曙光中，看到了民主的力量，庶民的力量，他认为大战

的真正结局，在政治上是民主主义战胜了专制主义。大战的结果“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é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⑤ 大钊同志满怀激情地赞誉十月革命，把世界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十月革命带来的新潮流上，认为：自从十月革命“人道的警钟响了！试看将来的世界，必定是赤旗的世界！”^⑥

（二）揭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关系，主张反帝必反封。

大钊同志虽然很早就注意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压迫中国人民而互相勾果，但对二者之间关系达到科学明确的认识，却是在他掌握马克思主义之后。五四运动期间，他连续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太上政府》两篇文章，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必反封的革命主张。

第一，揭露“秘密外交”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互串通的纽带。

大钊同志指出帝国主义除了用武力侵略弱小民族外，还根据“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⑦ 以扩张他们本国的势力，所以“秘密外交”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又一种手段。而中国的封建政府，为了“对内压制一般人民”，对外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也用“秘密外交”、“秘密签约”的方式，出卖中国的民族权益。帝国主义“想要我们的山东”^⑧ 军阀背着人民“就答应送给它。”^⑨ 所以，“秘密外交”是帝国主义同它的代理人封建主义相勾结的一种形式，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必须“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⑩

第二，揭露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军阀的主子，军阀政府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奴才。

大钊同志认为，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强盗”、“中国一部历史是乡原与大盗结合的记录。”^④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依附于各帝国主义的封建军阀们也都是强盗，它们统治下的世界是“强盗世界”，国际帝国主义就是这“强盗世界”的强盗头子。中国封建军阀们之所以能横行霸道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给他们撑腰。军阀们都是一些“没骨头没志气的人”军阀政府也只能是一个“丧失自立性”^⑤的政府，帝国主义才真正是中国军阀官僚政治的“太上政府”在这种“宰猪场式的政治”^⑥下面，人民只能是任意宰割的对象。

大钊同志号召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本质，认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本着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⑦坚决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到底。把反帝同反对封建主义结合起来，这是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的一个巨大进步。

(三) 主张以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大联合运动”，去反对国际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帝国主义召开了彼此分脏“巴黎和会”，这在中国不少人中又一次引起了对帝国主义“和平”、“公理”虚伪口号的善良幻想。但是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钊同志，却始终对帝国主义的阴谋保持着警惕，看到在帝国主义的漂亮口号后面依然掩藏着杀机。“他总是戴着一幅鬼脸，你猜我忌地阴谋怎样吞并、虐待那些小民族”，^⑧什么所谓的“和平会议”“仲裁裁判”都不过是帝国主义骗人的把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

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对讲不出公道话来。”^④他还认识到帝国主义虽然在争夺世界霸权中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但帝国主义的本质都是对外扩张，都以牺牲别国保护自己为出发点，因此在对华关系上，当他们侵略利益一致时，它们也可暂时妥协相互勾结起来对付中国。大钊同志痛斥：在这次“巴黎和会”上议决的事，“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⑤在山东问题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是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⑥所以大钊同志向全国人民强调：我们的仇敌不仅仅是“夺取山东”的日本，卖国贼也不仅仅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中舆，而是国际帝国主义，是“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⑦因此单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⑧不能使中国摆脱被奴役、宰割的地位的，必须去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从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存在幻想到主张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也是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反对势力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推翻“强盗世界”呢？大钊同志认为必须集全世界革命力量“发起一个联合大运动”^⑨在他一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后，他就已看出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并未给本国人民，本国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带来好处。大钊同志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大肆对近邻中国侵略，然而它国内却“贫富的悬隔一天甚似一天，大有法兰西革命以前的样子。一般武人都是一日跋扈一日，压迫自国的平民还在不算，更想和别国的武人勾结，宰割别国的平民。”^⑩据此，大钊同

志结论，我国的反帝斗争“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⑤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Democracy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⑥对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钊同志更是从中看到战胜帝国主义，人类争得自由解放的曙光。他说：“俄罗斯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⑦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大钊同志心底更是将这一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同以社会主义为主要标志的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时代潮流联系在一起。五四风暴刚过，他就著文指出“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汇成一个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大运动”。这一思想高度证明大钊同志已经开始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对待和考虑了。这对于他最终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立志要以科学社会主义去谋求中国的独立、解放，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者之一，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光辉典范

五四运动以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中国迅速扩大了。

1919年5月11日，《新青年》杂志分两次刊出了大钊同志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他已经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此他便以一个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者出现，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辩证唯物主

义世界观、历史观的树立，使他的反帝爱国思想发展的更为彻底，更为科学了。

这一时期，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认识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钊同志掌握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后，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必亡，社会主义必兴的历史规律。他认为：“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今以后，人心渐渐觉醒。”^⑧“……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象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也都象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⑨大钊同志满怀激情地向中国人民呼吁，“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阀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⑩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强大，但它代表的只是“陈旧”、“腐滞”“不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它是完全可以被打倒的。大钊同志强调：“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⑪因此，我们不能为帝国主义表面强大的现象蒙蔽，要认识到“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于与他搏战，信它必可摧拉。”^⑫

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相反，社会主义正走向决然兴盛。

大钊同志欣喜地看到“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④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认为“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⑤他还认为中国若想战胜帝国主义的欺凌。争得独立富强，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⑥为什么中国除了社会主义就别无它途了呢？大钊同志分析到，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世界经济势力之外。”^⑦“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同^⑥）大钊同志以上分析包括了两层意思，一是说在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不合理性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社会主义正勃然兴盛的形势之下，中国的发展也不可能超出世界形势以外，所以“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⑧“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⑨二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它遭受着帝国主义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梦想独吞的一块肥肉。所以中国若想走一条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以至日后可在经济上、政治上抗衡帝国主义的复兴道路，这绝不会为国际帝国主义所允许。如果说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夕对社会主义的想往还比较朦胧的话，那么“五四”之后，他认为

中国应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一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他已经认识到，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大潮中，中国这艘大船，若想抵达独立富强的新岸，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历史必然。把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主张以社会主义道路救中国。这是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的光辉升华。

(二) 主张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为实行这一“根本解决”进行艰苦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极端仇视，也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从内部分裂了。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胡适，首先公开跳出来向马克思主义挑战了。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文章，鼓吹改良主义，反对按照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胡适诬称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真理，说什么“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①他还胡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② 大钊同志旗帜鲜明地对胡适的谬论予以反击。他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③才有解决希望。”^④而这“主义”正是联络与指导社会上多数人进行共同运动的。他还强调：对中国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⑤大钊同志在这里所说的“根本解决”，就是主张使中国经过“阶级竞争”去达到“集产制”的社会主义，以此去争取中国的独立富强。当大钊同志还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时，他虽然也不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但在

“进化论”影响下却更愿意“进化”和“改良”。他曾经说过“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现代之社会调和之社会也。”^⑤“惟其协力与调和，而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乃有可图。”^⑥而当大钊同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便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追求真理的彻底革命精神，既对自己身上原有的改良思想和进化论思想进行了扬弃，又在选择救国救民道路时，最终做出了正确的、符合历史规律的抉择。

大钊同志不仅是一名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宣传家、理论家，更是一位革命家和实践家。他在反驳胡适鼓吹的改良谬论同时，曾经谈到了西欧社会民主党破产的原因。他讲：“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落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到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⑦他借鉴这样的历史教训提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鉴于这样的认识，大钊同志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撰书演讲在中国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奔走联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积极筹备。1921年党成立后，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便同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了。党成立后，他反帝爱国思想的发展，主要有三方面成果：

第一，中国应当按照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早在1919年7月大钊同志就已认识到：“这最后的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⑧党成立后，他在《平民政

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②就在这篇文章结尾，他还强调，他在文章中对无产阶级平民政治与资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做出分析，指出差异，并不是单纯地研究学理，而是“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③

第二，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即中国革命，必须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在一起。

1922年底大钊同志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所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④他在文中回顾了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于弱败地位的屈辱史之后又指出：“十月革命喊出的口号‘对我们格外有意义。’^⑤因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⑥中国必须参加到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中去，才能战胜帝国主义，争到独立、解放。”

第三，中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结成反帝国主义的“民主的联合阵线”。

还是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这篇文章中，大钊同志提出：“凡是象中国这样的被压迫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⑦在帝国主义奴役压迫下，中国社会除去封建主和一小撮买办资本家以外的各阶层，都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都有程度不等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为

了反抗强大的民族敌人，中国人民必须最广泛地团结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以上三点证明，党成立后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同我们党一大、二大、三大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同步前进的。他这一时期的反帝爱国思想已成为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之思想理论的一部分了。大钊同志是一位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在他认定正确的救国救民道路后，他就为使中国走上这条路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不避艰险做了大量工作。为了促进中国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建立，他在党内耐心说服同志，在党外受党委托与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革命派接触谈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大钊同志都不愧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者的光辉典范。

几点评价

李大钊同志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身历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他的反帝爱国思想，最终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思想。这集中代表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一代立志救国救民的革命志士们，探求救国真理“虽九死而不悔”，最终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的历史进程。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鲜明的特点，至今仍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历史启示。

第一，大钊同志是一个彻底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者。

大钊同志的反帝立场始终是坚定的。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镇压，形势严峻，不少人

对祖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就连陈独秀那样激进的人，也在《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中，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如亡了好。甚至还有人因绝望而自杀。此时大钊同志却表示，中国虽然“诚以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⑤中国人民“亦易亟谋所以自救之道，”^⑥大钊同志的反帝思想，又是十分彻底的，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军阀的关系；他明确提出了要以世界革命力量的“联合大运动”去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这就使他反帝爱国思想的彻底性超过了以往历史上各种反帝爱国思想。这一认识高度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已经具有了理性认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大钊同志是从一位忧国忧民的旧学者，“与时俱进”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者。

在辛亥革命后忧国忧民的先进人物中，大钊同志的反帝爱国思想做到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人士，他们的思想发展基本有三种类型：一如章太炎，他最初也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奔走呼号，受过清庭通缉，坐过巡捕的班房。但他晚年却“脱离民众便渐入颓唐”；终于没有找到中国的出路；二如孙中山先生，他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打击下，正当陷入苦闷、徬徨时，取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他的反帝主张坚决起来，革命也大见成效了。我们从他“以俄为师”的政治遗训中，还是可以看出他思想发展趋势的。至于大钊同志，他的反帝爱国思想做到了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最终他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把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而。这时他的反帝爱国思想已经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界限，建立在为祖国、为人类争解放，争进步的基础之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他已经是一名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了。

第三，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相信人民力量，这是大钊同志反帝爱国思想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

大钊同志是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使人民摆脱苦难才去求索救国真理的。他相信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所以他才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灰心、不丧气，勇于进取，百折不回。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当十月革命一爆发，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伟大力量得以充分表现，就很自然的使包括大钊同志在内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民把目光投向苏俄，从俄国人那里接过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武器，继续同帝国主义斗争。自此大钊同志开始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对自己思想中的进化论和改良主义思想进行了彻底扬弃，思想也随之发生飞跃。

今天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要学习大钊同志那种从人民利益出发，崇高真理，探求真理，“与时俱进”的彻底革命精神，自觉地投身于今天的改革。我们要学习大钊同志那种以人民为重，把民族复兴、国际富强做为自己毕生事业而奋斗不息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自觉地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做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我们更要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摸索救国真理的曲折经历中，认识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乃拯救中国于积贫积弱局面中的唯一良方。从而珍惜今天的大好局面，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献身于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注:

-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86页
- ②李大钊《狱中自述》
- ③④李大钊《狱中自述》
- ⑤《李大钊选集》第2页
- ⑥《李大钊选集》第8页
- ⑦北洋法政学会《“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
- ⑧《李大钊选集》第1页
- ⑨⑩《李大钊选集》第3页
- ⑪李大钊《裁都督横议》
- ⑫《李大钊选集》第1页
- ⑬⑭⑮⑯《李大钊选集》第4页
- ⑰《李大钊选集》第6页
- ⑱《李大钊选集》第7页
- ⑲《李大钊选集》第8页
- ⑳《李大钊选集》第10页
- ㉑《李大钊选集》第11页
- ㉒《李大钊选集》第14页
- ㉓《李大钊选集》第19页
- ㉔《李大钊选集》第27页
- ㉕《李大钊选集》第19页
- ㉖《李大钊选集》第27页
- ㉗李大钊《威尔逊与和平》
- ㉘《李大钊选集》第19页
- ㉙《李大钊选集》第38页
- ㉚《李大钊选集》第17—18页

- ③① 《李大钊选集》第83页
③② 《李大钊选集》第85页
③③ 《李大钊选集》第109页
③④ 《李大钊选集》第110页
③⑤ 同上
③⑥ 《李大钊选集》第114页
③⑦ 《李大钊选集》第113页
③⑧ 《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③⑨ 《李大钊选集》第212页
④⑩④⑪④⑫ 《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④⑬ 《李大钊选集》第126页
④⑭ 《李大钊选集》第213页
④⑮ 《李大钊选集》第167页
④⑯ 《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④⑰ 《李大钊选集》第121页
④⑱ 《李大钊选集》第282页
④⑲ 《李大钊选集》第212页
④⑳ 《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⑤⑰⑱ 《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⑤⑲ 《李大钊选集》第327页
⑤⑳ 《李大钊选集》第122页
⑤㉑ 《李大钊选集》第255页
⑤㉒ 《李大钊选集》第282页
⑤㉓ 《李大钊选集》第104页
⑤㉔ 《李大钊选集》第255页
⑤㉕⑤㉖ 《李大钊选集》第121页

- ① 《李大钊选集》第281页
- ② 《李大钊选集》第211页
- ③ 《李大钊选集》第281页
- ④ 《李大钊选集》第121页
- ⑤ 《李大钊选集》第121页
- ⑥ 《李大钊选集》第357页
- ⑦ 《李大钊选集》第356页
- ⑧ 《李大钊选集》
- ⑨ 《李大钊选集》
- ⑩ ⑪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 ⑫ ⑬ 《李大钊选集》第228页
- ⑭ 《李大钊选集》第233页
- ⑮ ⑯ 李大钊《青年与老人》
- ⑰ 《李大钊选集》第234页
- ⑱ 《李大钊选集》第224页
- ⑲ 《李大钊选集》第398页
- ⑳ 《李大钊选集》第400页
- ㉑ 《李大钊选集》第401页
- ㉒ ㉓ ㉔ 《李大钊选集》第401页
- ㉕ 《李大钊选集》第31页
- ㉖ 《李大钊选集》第30页

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先声

——李大钊“平民政治”思想浅析

张济顺

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大钊同志是这个智慧集体中的先驱战士，他的“平民政治”思想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思想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一九二二年七月至一九二三年一月，李大钊同志写下了《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平民主义》、《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等名篇，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平民政治主张”。

李大钊从纵的方向研究了平民政治的起源、现代含义和发展趋势；在横的方面描述了平民政治正“普被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①的图景。在这些纵横古今的议论中，蕴含着李大钊“平民政治”思想的新见地。

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李大钊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区别。他认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这种所谓的为人民的政治是虚伪的，是“借用‘人民’的名义以

欺人”^②。而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真实的”、“纯正的”平民政治，它就是工人政治。李大钊进而阐明了工人政治的内涵，同时说明了它的职能。他说，在革命时期，工人政治是“无产者专政”，“以无产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③。随着阶级的消亡，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即“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只有这时，“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④。在民主政治的实现手段问题上，李大钊鲜明地指出：“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因为“代表制固无平民政治，而无议会制度则依然可行平民政治”^⑤就打破了议会道路是实现平民政治不可移易的手段的神话。这一认识的继续发展，是李大钊关于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思想的基本确立。他认定：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夺取政权的“平和手段”不可行，“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⑥。他洞察到现代平民政治的发展趋向，“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发展途中”^⑦。他向我们指示了工人政治的奋斗目标。

由上可知，李大钊“平民政治”思想的新意在于，他不仅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正确地划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而且把民主政治看作历史发展的延续过程，指出它们之间的历史的、辩证的联系。指明这一联系，对于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不踌躇地联合一个‘民主联合阵线’”，建设民主政治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格外有意义”的，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既不能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直接去谋“工人政治”，但

纯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已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实践证实了其不可能性。因此，李大钊这种既不割断历史，又能明确其必然归宿的“平民政治”，确实是中国实际所急需的。虽然李大钊还不能区分殖民地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中产阶级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平民政治的发展途中”的不同特点，因此还不能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然而，他作为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带着解决中国的民主革命问题的强烈愿望去接受、去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因此，他的“平民政治”思想有新意的部分，也就成为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前途问题的扎实的理论基础。

李大钊在其“平民政治”的主张中，明确而又准确地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虽然在传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方面，他迟于我党其他一些同志，但是，一旦研究这个问题，他就十分自然地选择了“民主政治”这个角度，适合了中国实际之急需。当然，一九二二年的李大钊还不是自觉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然而，他的“平民政治”思想确实起到了催发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萌芽的实际效果。因此，在“民主政治”思想方面，李大钊是我党的先驱和皎皎者。

集中阐述李大钊“平民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的《新青年》九卷六号。此前半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公布于世。《时局主张》极大地震撼了李大钊，直接影响了他的“平民政治”思想。而李大钊“平民政治”思想中的新见解又补充了《时局主张》的某些理论缺陷。《时局主张》大声

疾呼：“解决纠纷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当然是由民主派掌握政权”，“是一个阶级推倒别个阶级，一个制度代替别个制度的意思”。^④这里所指的民主政治，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旧民主政治。《时局主张》虽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党，然而它认为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还是要建立如上的“民主政治”。虽然，这里所揭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是正确的，可贵的，是自一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步走”思想的飞跃。但是，这一步的奋斗结果还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政治，这就存在着“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倾向了。而李大钊能够区分两种不同阶级的民主政治，并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流弊，揭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从他的“平民政治”思想中找不到“二次革命论”的影子，而只有向新的民主政治前进的脚印。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此外，李大钊提出的“民主政治必须有代表制”的思想，也是新的民主政体思想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

尤为值得提出的是：《平民政治和工人政治》发表后的四个月，李大钊在题为《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的短文中，阐发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重要思想”。他急切地呼吁：“凡是象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应该赶快，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⑤李大钊这一认识，是论证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工人政治发展的重要论据。虽然他本人还没有直接运用这一论据进行论证，但距上述时间半年多，施存统在《先

驱》发表的文章里就直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决不能实现”，其主要根据之一，就是中国革命处于“国际资本主义正在崩坏，国际共产主义正在兴隆的时期”^⑩。他进而提出，民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一种过程和手段。

李大钊“平民政治”思想促进了党内同志对于民主政治的前途问题和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探索进程。一九二三年六月，瞿秋白在上述两个问题的认识上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他不只是一般地揭示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也不只是一般地论述无产阶级民主的意义，而是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联系中国的基本国情，得出了飞跃性的结论。他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要取得领导权的思想。同时，他论述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要获得“民主主义独裁制”的政治机会，“以促进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的途程”。^⑪瞿秋白的民主政治思想中已经注进了新内容，他指明了无产阶级加入的民主政治对于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意义，又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可以说，这已经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之初步。

李大钊的“平民政治”思想不仅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先声，而且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不无积极的现实意义。

李大钊同志当年憧憬的“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理想社会，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走过了三十五年的光辉历程。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

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李大钊当年预见的“平民政治”的最终实现是共产主义，这仍是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他这种彻底的民主政治思想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前进的方向。

李大钊又非常强调民主政治的全面性。他曾说：“现代有一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普被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就是今日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⑧他还说：平民主义“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⑨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正是这样。它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但是绝不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在这种民主制度下。把民主扩大到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其它社会领域，成为实现和确保全体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各种社会权利的最全面的民主。李大钊对平民社会的描述与今天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李大钊突出地重视民主政治的广泛性。他反反复复地强调：“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⑩他还认为：除在革命时期内，有用强力以压服反对革命派的必要外，“平时施用强力，适足为政治颓废的标识”^⑪。李大钊在这里运用“革命时期”和“平时”来区分施用强力与否，这未必精当。但他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要求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这一思想的“精髓”是值得肯定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采取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就是为了团结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集合一切致力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力量，走合乎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民

主的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方面，不正是在于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吗？

李大钊同志的“平民政治”思想在当时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决非圣人先知。这里有时代的要求，集体智慧的力量，亲身实践的总结，也有以往积累的思想材料，并且是他不断去除头脑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残余影响的结果。

党的“二大”前后，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军阀纷争的黑暗政局之下。各派政治力量明争暗斗，各种政治主张鱼龙混杂。直奉战争战争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叫喊声甚嚣尘上，各省军阀不甘示弱，“联省自治”呼声四起，鼓噪一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抛出“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企图缓和阶级斗争，维持假共和的反动政治局面。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两次护法先后失败，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炮轰广东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失败的教训告诉人们，旧民主主义的政治理想在中国注定行不通，旧民权学说尽管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最高成就，但它已经终结。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方法是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建设崭新的民主政治。领导这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重担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探索新民主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重任同时摆到了我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前。李大钊同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领导北方区的工人运动的繁重工作中，在为促进国共合作的频繁奔忙中，他的“平民政治”思想顺时应势地产生了。

和任何新思想的诞生一样，李大钊的“平民政治”思想不是即手可得的，而是他努力实践，坚持探索，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的辛勤之果，李大钊不断从集体的智慧中汲取营养，不断地去除自己理论中的旧思想痕迹，推陈出新。他与“好政府主义”决裂的过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生动的例证。

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打出了“好政府主义”的旗号。李大钊同志在开始时并没有弄清其反动实质，也鉴于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有不少与他共事多年的好友，如蔡元培、高一涵等，他在这份《主张》上签了名。这在当时确是个大的政治错误，反映了李大钊头脑中仍然残存着通过和平手段改革中国政治现状的幻想。但是，事隔不到两个月，大钊同志提出平民政治思想时，就具有了“平民政治非打破虚伪的议会制度不能实现”的认识。这个重大的思想变化，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共产党人勇于随时修正错误的坦荡胸怀的主观因素外，是受到了党的民主革命思想的有力感召的。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针对“好政府主义”进行了击中要害的批判，指出在军阀势力之下，“好政府主义者诸君”的妥协和平主义只能是“造成了反动的变乱”^⑧。李大钊同志见到这份《时局主张》并听取了中央的说明后，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他当即表示：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孚都受到排挤，哪里说得到废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李大钊还将中央的《主张》送给“好政府主义”的朋友们，并说：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

才分发给大家看，希望获得谅解^①。更为可贵的是，李大钊并没有停留在对“好政府主义”的具体错误的纠正上，而是把纠正后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且更加深入地反复地清除自己头脑中的和平的改良主义杂质。

李大钊最初提出“平民政治”的思想时，否定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但他还没有解决通过何种手段来实现民主政治问题。到了十一月，李大钊在北京各进步团体举行的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宣传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总结了它的四大好处：“（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高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②。这表明他们对于革命暴力是热情歌颂的。但是到了十二月底，李大钊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中，却又强调议会手段。他认为，要解决社会问题，必先“握得政权”，而欲握得政权，必“先运动到参政权，参政权得到后即可在议会上列席，得以建设和监视”^③。这显然不是暴力革命获得政权的思想，它从否定议会制度的思想向后倒退了。李大钊在这篇文章里既抨击了社会改良派“徐图改善”不良政治组织的主张，又批评了社会革命派“根本推翻”不良政治组织的主张，而倾向于折衷的观点，即：既不“太失机会”，也不“等候机会”，而是依靠政治的力量，“一点一滴地去作”^④。这种貌似折中的美好愿望，实际上还是改良主义在李大钊头脑中隐隐作祟。

在这一时期，蔡和森、陈独秀等对于民主政治的实现手段问题，认识是十分清醒的。蔡和森指出：“只有新势力完全制胜反革命，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成立，不然宪法制定也是无效的，改制修明也是徒然的”。^⑤

他强调，中国的一切政治问题，非革命暴力是不能解决的。蔡和森还在《批评汪精卫君赴奉返沪后的谈话》一文中，从理论上再次阐明“‘以暴力推翻暴力’本是革命的原则”。^②陈独秀在《向导》第一期上，也提出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他写道：推翻封建政治的方法，是“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

虚心好学，勤于思索的李大钊在实践和研究中，在战友们这些真知灼见的启示下，很快地省察了自己认识上的错误，毅然抛弃了改良主义、议会道路的幻想，树立起革命暴力的观点。一九二三年初，他在北大经济学会作了题为《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的讲演。谈到取得政权的手段时，他态度鲜明地说：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的“平和的手段”常归于失败，“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③。李大钊不只是向人们宣传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且是他自己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深切感受。李大钊的“平民政治”思想，就是这样的千锤百炼，不断去除杂质，向着“炉火纯青”的目标前进。

李大钊积累的丰富的思想材料，也是“平民政治”思想的必不可少的来源。

当李大钊还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以他“唯民主义”的历史观来阐发其对民主政治的热切追求与向往。一九一六年五月，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写道：“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④这种对于民主政治的认识，已经闪烁着唯物史观的

思想火花，成为他“平民政治”思想的先导。更为宝贵的是，李大钊在这篇文章里，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表示了大胆的怀疑。他指出：代议政治“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他设想，即使代议政治不良，需要改变，那么“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⑤。那么，这种益于人民掌握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呢？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是不可能明确作答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大胆的怀疑和设想失去它的价值，一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胆的怀疑能变成彻底的决裂，朦胧的设想会化为明确的追求。

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李大钊去思考民主主义的新含义。他在《〈国体与青年〉跋》中开始把社会主义同民主主义联系起来，认识到只有到了“世界大同”之时，“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意义”。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确立了唯物史观，这就为他的“平民政治”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正是在阶级论的指引下，李大钊同志深刻地揭破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他指出，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之所以虚伪，是因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⑥。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引下，李大钊同志理解了工人政治的真实意义，并具备了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思想。也正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指引下，“平民政治”思想取得了广泛的、真实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李大钊“平民政治”思想的理论指南，它之所以达到

当时我党理论的高水平，与李大同是我党早期出类拔萃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有密切关系的。

诚然，李大钊的“平民政治”思想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有欠缺之处，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只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先声，还未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政治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它还不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本身。李大钊的“平民政治”思想中还有某些无政府主义的和旧民主主义的思想痕迹。如，他把“自由政治”与“平民政治”完全等同起来，认为“‘自由政治的真谛，不是仗着多数的强力，乃是靠着共同的认可。’”^①又如，他不恰当地夸大了联邦主义的作用，认为：“有了联邦组织，那时行平民政治，就象有了导师一般”。^②他还把平民政治与联邦主义归于“一线相贯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而要完成一切个性，必然同时要有“联邦主义的大团结”。^③这些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

但是，李大钊的“平民政治”思想的成就方面是主要的，这些缺点和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发展，越来越为正确的方面所代替。

最后赞言几句，略表缅怀先烈之心，并作点题的结束语：

每当我们翻开毛泽东同志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眼前展现出一幅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宏伟蓝图之时，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蓝图的最初起草人李大钊同志，尽管这幅蓝图与最初草稿相比，有了偌大的修改和完善。

注：

①《李大钊选集》第395页。

②同上第397页。

- ③④同上第398页。
- ⑤同上第397页。
- ⑥同上第429页。
- ⑦同上第397页。
-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①第18—19页。
- ⑨《李大钊选集》第401页。
- ⑩《先驱》第22号。
- ⑪《新青年》季刊第一卷第二号。
- ⑫⑬《李大钊选集》第395页。
- ⑭⑮同上第711页。
- 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①第24页。
- ⑰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五卷第三章。
- ⑱张静如、马模贞：《李大钊》第92页。
- ⑲⑳《民国日报》1922. 12. 29
- ㉑《向导》第2期。
- ㉒同上第六期。
- ㉓《李大钊选集》第429页。
- ㉔同上第38页。
- ㉕同上第50页。
- ㉖《李大钊选集》第411页。
- ㉗㉘㉙同上第416页。

李大钊同志在我党早期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杰出贡献

曹延玉 谢作黎

李大钊同志从1922年到1924年期间，党的“三大”前后，积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促成国共统一战线的尽快建立，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辞劳苦，艰辛奔走，多次往返跋涉于大江南北，做了很多工作。国民党“一大”后，大钊同志又肩负起领导整个北方国民党的工作，他在北洋军阀残酷统治下的北方，仍坚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且每每亲自带头冲锋陷阵。这些斗争有力的配合了南方的革命运动，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大钊同志在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有着杰出的贡献，卓著的功绩。

一、李大钊积极促进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

1、李大钊是促成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先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并较快的扭转了单枪匹马的战斗局面。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联合战线，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朝着胜利的大道前进。李大钊同志是我党早期开展国共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急进先锋。

1922年4月党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民

主统一战线问题。会上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但大多数人同意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同年6月，我党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提出要和国民党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同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李大钊未能出席这次大会，但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为实现党的最低纲领，更好的开展实际斗争，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了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三方面召开代表会议，协商进行，由倾向共产主义运动的议员同民主派议员结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在全国各城市联合各群众团体组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春夏就已改变了一大时，在政治斗争中“不同其它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态度和政策。

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集中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涛、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参加了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指示精神，再次“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在会议开始时，多数人反对这一提议，李大钊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他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国民党多年，依然宣传无政府主义，不受约束。国民党内各种不

同政见的人，也都是各行其是。共产党员参加进去，当然也可以不受其约束。要实现统一战线，只有加入到国民党中去才是行得通的办法。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又经马林、李大钊等人的解释说服，最终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国共两党争取党内合作形式建立统一战线。先由中央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再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在这个时期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进行了积极热情的宣传，他号召“全体人民应该赶快地不踌躇地联合一个民主统一战线”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他在与邓中夏等六人联合“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大会的提案中，提出“应该在此共同认定一定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途”。又说“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李大钊的这些言论，对促使我党的关于建立联合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尽快地为广大革命群众及革命团体所理解、所接受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马林一同拜访了孙中山，提出两党合作主张，并建议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这时的孙中山，由于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叛变而避居上海，正处在绝望之中，他表示十分欢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同意了改组国民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

根据党的决定，李大钊专门负责与孙中山进行联络，开展我党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已和孙中山有过接触。他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曾

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说：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中，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份”。

“孙中山是亚洲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者”。李大钊高度赞扬了孙中山为民主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精神。1922年8月下旬，李大钊到孙中山家里会见了，自此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以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会谈的过程中，有一天由孙中山主盟，张继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说明自己是中共党员，而中共党员也就是第三国际党员时，孙中山对李说：“你尽管一方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在李大钊率先加入国民党后不久，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涛等人先后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和孙中山，在频繁的接触和非常融洽的会谈中，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因而李大钊成了孙中山全家热烈欢迎的客人。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他的真诚帮助十分感动，对李大钊的为人也极为钦佩。据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以上事实说明李大钊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以共产党人坦荡的胸怀，诚恳谦虚的态度，出色的工作，赢得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的信赖。这不能不说是推动国共合作得以迅速实现的一个重要

因素。

李大钊在开展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还本着又联合又批评的精神，对国民党和孙中山进行帮助。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作为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过去国民党“不大着重民众运动的努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去宣传、去组织”。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及商人，“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这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他以此提醒国民党、孙中山，必须要克服过去脱离群众，轻视工农的缺点，才能真正组织起联合作战的战线。

在李大钊同孙中山会谈不久，1922年9月4日，孙中山便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起草宣言和党纲党章等问题。从此，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了。1923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宣言提出“今日革命，则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感情……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这说明孙中山从过去依靠少数地方军阀，现在已转变到要依靠广大民众，此举是他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完全是由于共产国际和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影响的结果。

1923年1月中旬，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从北京到上海，由李大钊、林伯渠等陪同，会见了孙中山，经几天会谈，于1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宣言指出：“中国最要紧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我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也”。“孙越宣言”的发表，消除了国民党方面一些人对联俄、联共的顾虑，有助于推动国共合作的进展。

2. 李大钊在党的“三大”会上的正确主张，促使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方针在全党的确立。

党的西湖会议以后，我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还仅限于党内的少数领导人。全党的工作中心仍然是放在领导日益高涨的全国工人运动之上。“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才加速了我党的国共合作步伐。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共合作。西湖会议虽然作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但仍有很多党员的思想不通，因此只有少数几个党的中央领导人加入了国民党。所以这次大会主要议题是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会上，李大钊、毛泽东都坚决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由于他们坚持了正确的主张，促使大多数人接受了与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在会上起了很好的作用，两人都被选为三届中央委员。张国焘由于始终坚持其宗派主义的左倾错误立场，这次就落选了。大会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因此，“应当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而“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所以此次大会通过决议，“中国共产党必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党的“三大”标志着我党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的正式确立。在党的“三大”期间，孙

中山还特地邀请李大钊与他会面，商讨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问题。李大钊在这期间繁忙地在党内外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

二、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后积极投入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工作

1. 李大钊参加党的“三大”回北京后，积极贯彻我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大钊同志回京后，首先在党内针对广大党员的思想状况，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宣传工作，以求得党内思想的统一，步调的一致。为此，他在1923年秋，召集了北京地委负责人和鲍罗廷在一起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当时，张国焘仍未放弃他的错误主张，党内不少同志对加入国民党一事，在思想上还存在着疑虑。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只有领袖，没有群众，而且有许多腐化堕落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就会失掉我们的阶级立场损害我党的纯洁性等等。鲍罗廷在会上讲了话，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李大钊作了长时间的发言，他对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作了说明，对大家提出的要保持党的阶级立场和纯洁性的意见做了肯定。他指出：“今天革命事业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入新的血液，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而共产党为了进行这个革命，也需要同国民党合作。”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必要和适时的了。但是，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还是大有可为

的，如果不是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合作，那就不成了”。总之“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就是可能的”。现在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努力地去促其实现。此次会议开的时间很长、但效果很好，北京地委主要负责人的思想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与此同时，李大钊更加紧张的投入到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去了。1923年10月中旬，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代季陶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改组事宜，亦密电正在北京的李大钊赴上海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10月下旬，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李大钊（后补委员）组成新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改组工作。10月底，国民党临时中执委正式成立，随即着手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及其他工作，并决定在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1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邀请，委派鲍罗廷为常驻广州代表，“具体帮助国民党改组”。10月初，鲍罗廷到达广州，立即投入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2. 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所起的重要作用。

1923年末，李大钊在上海，党中央委派他组成一个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1924年1月20日，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讨论决定国民党的改组问题。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北京的代表，还被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李大钊和孙中山等国民党元老一起共同主持召开了这次大会。整个大会的实际工作，大多是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担

任，如李大钊一人就担任了三个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大会一共四个委员会）还亲自参加了大会宣言和党章的审定工作，他是大会兼职最多的一人。这次大会，由于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及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的支持、合作，开的很好。这时的国民党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也并非一帆风顺、没有斗争。在1月28日讨论党章时，少数国民党右派分子跳出来，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李大钊针对这些右派分子提出，应增加一条“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的无理要求，在大会上讲了话，散发了“意见书”，严正指出：“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运动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努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以此为理由，不但自己愿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的。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因此，对于共产党员参加本党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扫除之”。李大钊在会上全

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观点、立场。明确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完全是出于有贡献于国民党及国民革命事业之公心，并且早已得到孙中山总理的赞同，因此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李大钊在讲话中还揭露了右派分子反对国共合作以破坏国民革命力量大团结的险恶用心，号召大家当即起来对他们“明揭扫除之”。李大钊义正辞严的的声明，打退了右派分子的进攻，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策。经过辩论，大会通过了实行三大政策的宣言和党章，决定接收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

1月30日，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很多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许多部门的领导工作。这样就终于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为此，李大钊同志历尽艰辛，费尽心血，做出了最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指出：“1924年，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苏、联共、扶助工农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1924年国共合作的实现，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成为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新的里程碑。

三、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及其革命运动

1924年底，李大钊从广东回到北京，立即担负起了国民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进行了大量而紧张的工作。据他的长女李星华回忆说：“父亲这次回来，好像有了什么新的任务，一回到北京，他就把全副精力投入工作，忙得废寝

忘餐。有很多青年男女，天天来找他，他们在我家外院的书房里……常常是一直谈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散去”。国民党原来在北方已经没有什么组织，只有少数几个上层人士的党员。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其他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很快就成立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和直隶县国民党党部，及北方各地各级的国民党党部相继建立。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以后还成立了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国民党在北方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由于李大钊的正确领导，几乎北方所有的国民党组织，都是由共产党人着手成立起来的，并且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使原来死气沉沉的国民党，才得以新生，呈现出一派革命的新气象。因此才有了国民党势力的大发展和北方群众运动的高涨。此时的李大钊在广大群众中已享有了很高的声誉，这一切就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恐惧和仇恨。他们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李大钊称作“北赤”。5月，张国涛被捕，他无耻地叛卖了李大钊等许多中共党员，因此李大钊遭到北洋军阀明令通缉，被迫避居河北昌黎五峰山（1923年9月曾被捕一次，由于机智斗争而获释出狱，）6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会后，他留下来，担任了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几个月后，李大钊置敌人的通缉于不顾，秘密地回到北京，投入到正在逐步高涨的实际革命斗争中。这年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了共产党北方区委，由李大钊总负责，为了党的工作，李大钊陆续辞掉了几个大学教授职务，专事党的工作。他和赵世炎、陈乔年等同志一起，领导了整个北方（东三省，陕西、河北、内蒙）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

李大钊同志充分运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形式，公开组织工、农、学生运动，团结广大群众，壮大革命队伍，推进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还特设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专管国民党的事情，由陈毅同志具体负责这一工作，发展了大批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加入国民党（1927年2月为止，北京国民党员4300多人）。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方区党委，正确的分析了北方复杂的政治形势，采取了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正确统战策略。李大钊等人对冯玉祥部主要将领及中下级军官做了大量的工作，宣传了我党反帝反封建、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主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争得了国民军对我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基本上采取中立、同情的态度，甚至有的部队有时名为维持秩序，实为保护群众的集会、游行活动。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党委当时还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他就利用了与国民军的友好关系，救出了“二七”以来被捕的工人领袖，恢复了“二七”以来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铁路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于1925年2月7日，在郑州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对国民军争取工作的成功，为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由于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方区党委出色的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依靠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在军阀反革命势力盘踞的中心——北京展开了工作使一度沉寂、低落的北方革命运动，迅速的得到恢复和发展。北方的斗争，有力的配合了南方的革命运动，并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李大钊同志不但指挥北方革命的全局，而且还亲自领导了“国民会议”、“五

册”、“关税自主”、“三一八”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他在斗争中每每身先士卒带领群众冲锋陷阵，赤手空拳与武装军警英勇搏斗。李大钊同志用他的鲜血和生命点燃了北方革命的熊熊烈火。

李大钊同志把自己的一生，无私无畏的奉献给了党的事业，人民革命的事业。他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代表，光辉的典范。他在我党早期国共合作事业中建立的不朽的功勋，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今天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我们深切的缅怀革命先烈，要继承先烈开创的革命伟业。今年又恰逢第一次国共合作六十周年，我们尤其要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李大钊、孙中山等革命先辈，在六十年前为挽救民族危机，为振兴我中华的斗争中，那种紧密团结、合作共事的精神。当前海内外中华同胞，正热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次携手并肩，为尽快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而共同奋进。

1984年9月

附：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李大钊选集》
2. 李大钊年谱
3.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
4.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962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5. 李星华：《为了革命，他忘了家庭》
6.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李大钊与冯玉祥

——记大革命时期的北方战场及国民军政治工作

阎稚新

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是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和促成者，我党最早开创中国军队政治工作与从事军事活动的先驱者之一，并且亲自担任过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开始，到举行五原誓师，进军西北，策应北伐，都是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亲自推动和战略指导下实现的，其中包括邓小平同志身临前敌，运筹指导和造就大批人才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本文试图透过我党领导人李大钊、邓小平同国民军统帅冯玉祥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探讨大革命时代北方战场和党在国民军中创设政治工作的几个侧面，以缅怀李大钊同志早期在军事战线上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一）南北两大战场与国民军的战略地位

我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是由南北两个战场组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战争。”①毛泽东的这一正确论断，既肯定了大革命在南方战场上的伟大胜利，又肯定了大革命在北方战场上的伟大胜利，从北伐战争时敌我双方态势和力量对比看：我国革命力量的中心在南方，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而反革命政权的中心却在北方，以北京为反动军阀的大本营。

当时，北伐战争的打击对象是三大军阀：一是亲英美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盘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及陕西东部，控制着交通干线京汉铁路；二是，亲英美的原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二十万，占领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和上海地区；三是，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三十五万，控制着东北三省、河北、山东，及北京、天津一带，与纵贯南北的交通干线津浦铁路北段。这三大军阀在各自的帝国主义主子支持下，互相之间虽然矛盾重重，但反对革命是一致的。

当时，在革命政府指挥下的武装部队有：南方的国民军革命军共八个军，拥有兵力十万人；在北方，国民军虽几经起伏，但北京政变后不到三个月，即迅猛扩充到三十万人，而且单独抗击、威吓和牵制着三十五万奉军及直系主力一部的强大兵力。特别在南口大战的危急关头，国民军处于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孤军苦斗，抗击着全国七十五万军阀军队中——奉张、直吴、晋阎、鲁张五十万联军的军事进攻，承担

了非常繁重的战略任务。

一九二七年七月，党中央曾在北伐战争展开前，就对冯玉祥本人及国民军的战略地位作出如下估计：“冯玉祥这次回来，的确是非常进步，非常左倾。”而国民军能够在西北存在和发展的战略意义在于：“第一，现在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住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未来北伐，对奉若没有国民军之骑兵炮兵参加，实难驱逐奉军出关”。党中央还对国民军的作战能力评价为：“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实较一般的北伐军为好。再加以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同时助以政治工作，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大作用的。”党中央指出，我们所以“对于现时的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完全是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西北军在现时的革命斗争中占什么地位，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占什么地位。”^②因此，中央特别会议作出决定，“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的是在帮助国民军”，为此，必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③由此可见，党中央从整个革命的发展前途与北伐战争的战略地位出发，曾经寄厚望有冯玉祥将军和他率领的数十万国民军官兵，是可以理解的。

（二）北京政变与党的“联合国民军”方针

李大钊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倡导者与促进者，曾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两下广州，三赴上海，四跨长江，终于经过党的“三大”决议和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加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新高潮到来奠定了政治基础。由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方

军事活动的加强，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北洋军阀内部发生了重大分化。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时，直系爱国将领冯玉祥，趁吴佩孚同张作霖激战之际，命令自己的部队撤出战斗，班师回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权。

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北苑召开了紧急军事政治会议，一致同意将参加北京政变的各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正式宣布脱离直系军阀。会议公推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第三军军长，各兼副总司令。这支国民军兴起后，相继占领了北京、天津、直隶、河南、绥远、察哈尔等广大地区，北京政权完全掌握在冯玉祥之手。而且不到三个月，至一九二四年底，国民军就由发动政变时的四万多人，迅猛发展到近三十万兵力的大军。应该说，整个国民军的兴起和迅速扩大，李大钊同志和他领导的北方区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北京政变是大革命时期，具有重大影响和进步作用的一个政治事件。当时中共中央指出：这次政变“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表现军阀势力的崩溃，一是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开使形成”。^④由于“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党委，正确地分析了北京政变后复杂的政治形势，采取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正确策略。”^⑤适应全国革命潮流和我党联合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同冯玉祥将军见面了，并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与推动下，冯玉祥由北洋军阀阵营转向革命。一九二五年冬，冯玉祥受挫下野后，李大钊曾为冯玉祥

出访苏联，亲自秘密到张家口，做了进一步的安排。

（三）李大钊亲自做冯工作与开创国民军政治工作

大钊同志“早在直奉军阀混战之际，他就开始联络冯玉祥。后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回师北京，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在这一期间，大钊同志曾多次亲自对冯玉祥做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担任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只是“由于李大钊同志在北京未能到职，总政治部主任由刘伯坚同志代理，一直到大钊同志就义后。”^④ 早在一九二五年初，“北方国民军指挥部根据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的请求。”经李大钊亲自疏通国际关系，介绍共产国际鲍罗廷、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冯玉祥认识和谈判后，全部得到满足。此时，李大钊提出在国民军“军队里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俱乐部应成为政治工作的基础。”冯玉祥批准李大钊建议方案后，“当时，委托李大钊负责领导政治工作。”^⑤ 从此以后，党从北方区委、黄埔军校、上海中央，以及苏联留学生中，派出包括邓小平、刘伯坚等二、三百名共产党员，陆续到国民军中开创政治工作，并且担任各路军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其中著名的有：国民军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宣侠父，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第五路军政治部主任方仲如，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魏野畴（曹力如），韩复榘部政治部主任李世乐，方振武部政治部主任卢绍亭，刘郁芳部政治部主任贾从周。邓小平同志担任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并曾担任该校教育长。以外，共产党员张兆丰任国民军第三师师长，还有许多同志担任了中山学院及其他学校与部队的领导工作。至此，国民军党政工作系统基

本就绪。

(四) 李大钊制定战略方针与敦促冯帅回国北伐

冯玉祥出访苏联半年，北方战场发生了激剧变化。一九二六年八月，由于南口大战失败，国民军仓促西撤，损失惨重，陷于存亡绝续的困境。此时，南方革命军已誓师北伐。为了敦促冯玉祥回国收拾残局，参加北伐战争，当时正被奉军通辑的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欣然接受李大钊的约请和委托，偕同翻译中央党员马文彦，前往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由于北方战局危急，在于抵苏半个月内，李大钊接连三次发出电报，敦促冯玉祥迅速回国。

一次是，于右任由北京出发时，李大钊已约定冯玉祥在上乌金斯克同于会面，冯因故改变计划，要于到莫斯科同他会谈。恰好此时奉军进攻更加激烈，国民军寡不敌众，十分危急。当时每日战况，由驻张家口国民军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及时电告北京苏联大使馆，大使馆随时转告李大钊。战局紧迫，大钊随即发出电报，告于迅速赶到莫斯科见冯。于同冯经过秘密商谈，冯玉祥毅然决然接受李大钊提出的战略方针，“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并立刻就此达成协议。

二次来电。冯同意李的战略方针后，决定八月下旬起程回国时，李大钊再次从北京来电，为避免战局继续恶化，预防察、绥再出问题。催促冯玉祥早日动身回国。于右任为促成冯及早回国。自己先期起程赴库伦（今乌兰巴托），“先归收拾残局。”冯这时始觉形势严重，径直赶往库伦。

第三次来电。于右任刚到库伦，又接李来电，说冯军已投降阎锡山，再催冯氏尽快回绥，收拾局面。冯因事在库伦停

留数日，直到固阴县一带，冯的车队才赶上于右任，一同回到国民军驻地绥远省五原县。^⑧

一九二六年九月，党中央对全国形势及南北战局分析道：“全国重大的政治事变，就是北方国民军之失败与南方北伐军之胜利。不仅改变了军阀间和帝国主义间利害的关系，并且对中国革命前途有极大的影响。”中央指出：虽然当时的“国民军士兵纪律之好，战斗力之强，与人民感情之洽，在全国各军之上，”但“此后国民军非另换强有力之将领，宣明政治主张，则纵有很好爱民能战的军队，亦不能救其失败。”^⑨在此成败转捩关头，李大钊约请于右任赴苏说服冯玉祥，并三次亲自发电报敦促冯尽速回国收拾局面，使国民军官兵能以又在自己的统帅指挥下，根据李大钊提出的战略方针，担负起“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任务。

（五）邓小平刘伯坚助冯五原誓师进军西北

冯玉祥在李大钊亲自安排下赴苏考察，是他一生中思想转变和政治上进步的转折点。冯氏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对陷于困境的国民军仍能历尽艰险坚持斗争，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冯玉祥能够得到同他一起回国的共产党人邓小平、刘伯坚的鼎力协助，在五原举行誓师，重振旗鼓，再度兴起，更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不久前，邓小平同志根据他的亲身经历，畅谈了我们党与他自己同冯玉祥将军长期合作的深情厚谊，回顾了党在西北国民军的工作和五原誓师的情景，并高度评价了冯玉祥将军的生平业绩。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四日，由原西北军及后来跟随冯将军的一百多老人提议酝酿，经党中央和胡耀邦总书

记亲自批准，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可敬的民主斗士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小平同志在大会前夕，特地会见了冯玉祥将军的亲属，作了一篇感人至深的谈话。冯将军的儿子冯洪达与儿媳余华心作了真实的记录，摘抄以下几段：

“纪念会定于九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接到通知后，我们和两个孩子分别于十三日赶到首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几十年未见的二哥洪志，他是专程从美国回来参加大会的，相见之下，二哥紧紧拥抱着我们，流下了热泪。居京的姐姐弗伐、理达、颖达和姐夫们，以及我们的第三代的十个孩子们，都快乐地相聚了。这是我们这一家前所未有、将来也难得的一次大团聚。”

第二天，下午“快六点时，听说小平同志就要来了，我们赶紧走近门旁，按年龄大小排好。接着就看见小平同志神清气爽地健步而入，微笑着和我们一握手。小平同志问道：

‘弗能呢？’

‘大姐弗能已经去世了。’二姐弗达回答说。

‘啊！’小平同志惋惜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小平同志同大家合影、入座后，语气十分庄重地说：‘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焕章先生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

小平同志接着说：‘弗能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他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当时有两个人

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弗伐说：当时我也在苏联’。”

小平同志又畅谈了他自己在一九二六年，开始同冯玉祥将军结识与交往，以及小平同志与冯玉祥一同从苏联回国，参加五原誓师的情景。

小平同志说：“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多个人。”

小平同志回顾他冯玉祥同一起离开苏联后，“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他说：“记得一九二六年跟李大钊的弟弟（弗伐插话：是李连成）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

小平同志接下去说：“回到内蒙以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当时还检阅了部队，是马鸿逵的队伍。记得我们还和焕章先生在洪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候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

小平同志沉思了一下，又对冯玉祥将军继续评价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

小平同志说到这里笑了，他说：“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点缘的”。⑩

这是邓小平同志首次公开谈话，评论李大钊与冯玉祥之间的合作、友情，和他自己助冯五原誓师、转败为胜的一份珍贵历史文献。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民国大事记》

记载：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与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刘伯坚等人帮助下，于是日十二时，在五原宣誓就国民联军总司令职。”^①刘伯坚任总政治部副部长。”“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接着“号开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刘伯坚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②

五原誓师是冯玉祥一生中的光辉篇章。从此，在邓小平、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与组织指导下，冯玉祥着手改编军队，整顿队伍，并在全军范围建立健全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制度，使国民军走上新生道路，变为一支具有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纲领，同共产党积极合作的人民革命武装，同广州誓师北伐的十万国民军南北呼应，从中国北部再度兴起，并很快恢复到二十万兵力的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西征南伐了！

（六）邓小平主办“第二黄埔”与创建“许权中旅”

一九二六年十月，冯玉祥采纳李大钊密信中建议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行动方针，率国民军由绥远出发，绕道宁夏、甘肃，向陕西进军。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举解围被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城。国民军入陕及西安解围，标志着西北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处于大革命急风骤雨中的西安城为北方革命运动的重要根据地。自五原誓师后，我党人员在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与大钊同志领导下，一面积极开创国民军各部队政治工作，一面大办学校培养军政骨干。一

九二七年二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号称“第二黄埔”、“西北黄埔”的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了。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又担任过教育长），高文敏（克林）负责中共支部书记。这所中山军官学校，形式上隶属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完全掌握与直接领导。中山军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营、连、排初级军官，及我党选送的革命青年。开设有《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及《劳工神圣》、《新三民主义》等多门政治理论，对广大青年军官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中山军校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快形成了一个种类齐备的“军校群”。国民军先后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重要城市，开办了很多所军政干部学校，招收下层军官、青年学生和有文化的士兵，经过短期训练，给各部队输送骨干。为了帮助冯玉祥提高国民军军政素质，在中共党员与苏联顾问组织指导下，相继办起了步兵、炮兵、骑兵、机枪、交通、军械、军需、军医、航空、钢甲车等十六所军事学校和军官教导团，共招吸与培训了八千名各类军官。此时，杨虎城将军举办了“三民军官学校”，委派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政治部主任，又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辰为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南后来作杨虎城秘书长），为杨部培训出大批下级军官。与创办中山军校的同时，还在西安开办了以共产党员刘含初为院长的中山学院，邓小平、刘伯坚、许权中、唐澍、高克林等共产党人，经常应邀来校授课或作报告。中山学院名义上由国民党开办，实际上完全由共产党领导，为我

党训练出很多党政工作和工农运动的重要骨干。

在开创部队政治工作与创办军政学校的同时，党也进行了直接掌握军队的工作。早在一九二四年，大钊同志在动员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时，就深有体会地讲道：“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他还强调指出：“我们党要建立革命军队，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非常需要懂得军事的人。”^⑭可见，大钊同志提出共产党要直接掌握军队与建立革命武装的思想是很早的。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南北两大战场顺利进军的时候，斯大林不仅精辟地论断：“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模范的体现者。”^⑮而且及时警告：“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提出“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⑯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斯大林指出了中国革命组织真正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和共产党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斯大林这些“完全正确”的、“宝贵的意见”，虽然没有“唤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及时的警醒，”但对李大钊、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在西北直接掌握军队是有积极作用的。

一九二七年一月，冯玉祥进驻西安后，国民联军中有一个由邓小平、史可轩、许权中领导创建，并为我党直接掌握

的正规旅。这是由中山军校的学员军官与由党掌握的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为骨干建立的。这个正规旅的主要领导人有：曾担任国民二军郑州警备司令、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长、共产党员史可轩，中山军校我党组织负责人高文敏（克林），中山军校总队长、共产党员许权中，并由许权中担任该旅旅长。形成这个正规旅组织基础的——中山军校的军官学员和国民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骨干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非常敌视和惧怕这支革命军队。他们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下达反动命令，强迫中山军校和政治保卫队开出潼关，阴谋趁机消灭这支革命武装。“在此紧急情况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陕西省委决定，我军转移北山独立发展。七月二十四日，史可轩、许权中率部北移。…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成立了中共旅党委，由高文敏任书记，许权中、杨晓初、高治凯、张汉泉为委员。与此同时，部队吸收了许多在地方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又加强了武装力量与改善了军队的成份。”^⑩

一九二七年底，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到许旅，“传达了陕西省委的指示，要在国民党和各派军阀部队中，通过党的领导，实行武装起义，参加和配合农民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接着，党的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又“向许旅传达省委关于组织渭华暴动的决定，要求许旅扩大武装，准备起义。”^⑪许权中旅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决定指示，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清除内部的坏分子；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指挥员，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担任部队基层连队的指挥职务；同时，加强部队军政

训练，又补充了一批枪支弹药，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渭华暴动充当了主力军的光荣任务。

（七）冯玉祥率国民军官兵痛悼李大钊

一九二七年初，南方北伐军已进长江流域大部分省份，痛歼吴佩孚、孙传芳主力时，北方国民军亦已占领黄河流域大部分省份，正势如破竹彻底打垮张作霖等军阀势力，从而出现了南北两个战场配合夹攻北洋军阀的新局面。自从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关于“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挥师西征，攻占西安后，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积极准备出师潼关，向中原进军。

为了促进冯玉祥迅速决策出师东征，我们党给了国民军全面的支援：“一、李大钊从北京密函驻西安的冯玉祥，报告奉（张作霖）、鲁（张宗昌）、孙（孙传芬）三方的兵力情况，并‘建议出长安、会师郑州’；二、中共陕西党的组织，积极帮助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克服财经困难…从财力物力和粮秣供应上保证国民军出师潼关之需；三、接受冯玉祥的请求，我党选送一批优秀干部去国民军任政治领导工作；四、北伐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陕西工农运动，特别是关中地区，一九二六年底以后迅速走向高涨。”^⑤在我党和西北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国民军以约二十万兵力分两路进攻河南，策应武汉北伐，南北两军，会战中原，围歼尚在挣扎中的吴佩孚残部和南下入豫的张作霖主力。

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月，正当冯玉祥将军亲自督师东征途中，国民联军总部进驻潼关时，噩耗传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突然派兵包围苏联驻京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同年四月二十

八日，李大钊同志被刽子手张作霖绞杀。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冯哭之甚哀，在潼关总部开会追悼，并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运动。”电令中说：“李大钊……等二十人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秘密绞杀，噩耗传来，悲愤万状！如此重大之党狱及惨杀，实为中国革命史上最壮烈而又惨淡之一页。应即时在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运动和其他各种宣传方法，务使全军将士及当地民众，均对此事变的真象和意义，有明确的认识，增加我们消灭敌人的决心和义愤。”^⑧

冯玉祥当即号令国民军全体官兵，人人戴孝以志哀悼，军官士兵出于对大钊同志的多年爱戴和真诚崇敬，无不悲愤泪下！冯玉祥将军在追悼电文中，特别对李大钊同志作了以下评价：

“李大钊同志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又为北京政治分会委员，在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领袖。李同志的牺牲，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的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又李同志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但他只是努力国民革命，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敌人欲以共产党三字，减轻李同志在革命中的地位，适得其反，并足以证明李同志更是世界革命中的领袖。李同志因地域的关系，与本军在南口转进以后，发生最密切的关系，李同志一死，北京革命工作，失了领袖，本军亦受极大的影响。”^⑨

冯玉祥将军一面号令国民联军全体官兵，开展大规模的追悼李大钊运动，一面为吊唁李大钊这位良师益友，还亲自

沉痛赋诗，刻石铭志。诗文曰：

“何故被绞杀兮？为革命。

何处被捕兮？

于苏联大使馆所在之北京。

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

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

帝国主义倡首的日与英。

我方率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为之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咷，

为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

非为同志之寿夭！

死我同志兮，增我灭敌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

将复为之激荡而高涨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为世界工农。

革命者的肉体虽可死兮，

其精神永留被压迫人民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

起来向贼猛攻！

继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

远到革命成功！”^②

（八）继承李大钊遗志，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放在中间！
今天，当先烈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新中国，已

由美好的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我们纪念李大钊同志的光辉生平，饮水思源，很受教益。

首先，统一战线仍然是新时期的重要法宝。大钊同志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已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推动北伐战争胜利，建树了不朽功勋。三十年代民族危亡，党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的三大任务”，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②为此，全党要对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者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方针。中央指出：“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为了有利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只要台湾当局同意换上五星红旗，连蒋经国这些人也可以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我们国家就会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③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

其次，彻底否定“突出政治，”加强和改善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④从北伐战争开始，周恩来、李大钊在国民革命军与国民军开创政治工作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奠基、形成和成熟、创新的过程，政治工作被公认为是“战斗力的源泉”和“军队的生命线”，只是由于历史的曲折，特别在“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遭到空前的损害。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及时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

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又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⑤当前，要在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基础上，彻底否定“突出政治”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决摒弃一系列错误口号观点、方针政策和“左”的做法，并结合整党任务，落实到老中青全体人员中去，使政治工作在实现国家“四化”和军队“三化”建设的总任务中，继续发挥它的“生命线”和保证作用。

最后，办好军事院校，造就现代人才。我们党历来为办好党校军校，培训军政干部的好传统。大革命开始后，在周恩来、李大钊、邓小平的主持和领导下，先后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和号称“第二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几十年来，经过实践锻炼和学校培训，我们造就出大批会治党、治军、治国的领导骨干。进入新时期，军队现代化，关键在人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们军队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年龄普遍老化，文化科学知识和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比较缺乏，去年以来，采取青中选优的方针，……干部队伍向四化迈出了较大的一步，但是，仍然不能适应部队建设的很要。”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教育训练切实摆到战略地位，加强院校培训，”“经过严格的、正规的、系统的军政训练，充分发挥科学文化知识对提高军政策素质的作用，提高干部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指挥和作战能力。”^⑥当然，我们既重视学校深造，又鼓励自学成才，决不能造成我们党的重视院校“文凭”，轻视实际水平的错觉。古语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千古名训，仍应借鉴。

注：

- 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936页
- ②《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1926年11月9日）
- ③《中央特别会议》（1926年2月21—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2）第34页
- ④《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集》（1921—1926年）
- ⑤《李大钊传》第107页
- ⑥李运昌：《大钊同志送我上军校》，载《河北革命回忆录》第2辑第32页
- ⑦《冯玉祥与国民军》第10—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作者：〔苏〕维·马·普里马科夫，1925—1926年担任冯玉祥军事顾问。本书引用有关文献资料，具有真实性与史料价值。
- ⑧马文彦：《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回国策应北伐的经过》，见1928年《党史资料通讯》年9期第25—29页
- ⑨《中央局报告—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1926年9月1日）
- ⑩冯洪达、余华心：《亲切的勉励》，原载全国政协《文史通讯》1982年第三、四期合刊
-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2辑第155页
- ⑫《刘伯坚传》，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卷第255页

- ⑬同⑥
- ⑭《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
- ⑮同上第10卷第20、31页
- ⑯《渭华起义史略》，载《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第53页
- ⑰同上
- ⑱《北伐战争时期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见《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第61页
- ⑲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出版社1982年1月第1版第96—97页
- 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报导
- ㉑周树一：《李大钊同志对西北军的工作》，见《山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4期
- ㉒《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04页
- ㉓《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1979年9月1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文献简编》第64页
- ㉔毛泽东在修改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加写的一段话（1983年战士出版社重新出版）
- ㉕《邓小平文选》第114页、324页
- ㉖杨尚昆：《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载《红旗》1984年第15期第5页

李大钊和国民军

王承璞

一九二四年十月，原直系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这次政变对北方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政变后，组织了国民军。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分任副司令兼二、三两军军长，分驻河南、河北、察哈尔和绥远等省。奉系首领张作霖乘机派十多万大军人关，进驻天津，并继续沿津浦路南下。这时冯玉祥和张作霖都无力控制中央政权，遂抬出已经下野的皖系首领段祺瑞，暂时维持政局。由于段祺瑞自己已无实力，于是他又希图利用冯玉祥与张作霖之间的矛盾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在冯、张、段之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错综复杂，并交织在一起，使北京的政局处在动荡之中。

北京政变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对这次政变曾持否定态度，认为只不过是军阀之间的内哄而已。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国民军乃是由直系军阀中蜕化出来的一部分较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①为此，党就进一步将革命统一战线方针推广到北方，转而采取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张作霖和吴佩孚的策略方针。

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党的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在国

民二军和一军中积极开展工作，为促进国民军倾向革命起了重大作用。由于李大钊这时还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系孙中山北上时移到北京），担负着国民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这就为李大钊在国民军中开展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李大钊除了亲自做国民军的工作外，还可以推动于右任、徐谦等国民党人士去影响国民军。

北京政变后，国民二军进驻河南。军长胡景翼系老同盟会员，思想比较进步，信仰三民主义，倾向并同情革命。胡景翼十分敬慕李大钊，并很想结识李大钊。以后，胡景翼通过他的同乡。北京大学教授康醒孚的关系，结识了李大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胡景翼抵开封，就任河南省督办。为了解决国民二军面临的一些问题，胡景翼便派人持他的亲笔信前往北京，邀请李大钊来开封指导工作。十二月底，李大钊应邀抵达开封。李大钊在开封逗留一周时间，多次与胡景翼晤谈。当时胡景翼的三弟胡景铨参与了会晤。据胡景铨回忆说：“李先生谴责吴佩孚在京汉铁路枪杀工人，还讲了工人力量大。我大哥胡景翼说：‘我就是要依靠工人，工人说话算数，他们不哄我。’我说：‘工人不造枪，咱就没办法。’还说了些无产阶级的道理。”^④李大钊对胡景翼作了细致的思想工作，给胡景翼以积极的影响。

同时，胡景翼还向李大钊提出，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来国民二军指导并给予军火援助。李大钊同意了胡景翼的请求。随后，通过李大钊的邀请，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访问了开封。一九二五年一月下旬，胡景翼又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就苏联援助国民二军一事，同加拉罕进一步磋商。而李

李大钊就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对推动谈判起了积极作用。

应胡景翼的请求，加拉罕首先派克利莫夫到河南，任国民二军政治顾问。以后，苏联又派了一个由四十三人组成的顾问组来到河南。总顾问是斯卡洛夫（西纳尼）。这个顾问组为国民二军制定部队军事训练的计划，并为高中级指挥官开办短期训练班。这对提高国民二军的战斗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日，胡景翼不幸病故。国民二军师长岳维峻继任河南督办。岳维峻思想落后，对共产党不信任，对胡景翼在世时制定的各方面政策不愿执行。且亲近直系分子马骥，而疏远胡景翼过去所信任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岳维峻上任不久，野心毕露，不顾国民二军实力不足，准备向外扩张地盘。他计划东攻山东，南打湖北，西战山西，北取河北。很显然，这个四面出击的战略计划，会导之国民二军复灭的危险。当时中共豫陕区委了解了岳维峻的这一军事动向，并立即派人向李大钊作了汇报。同时，在国民二军的苏联顾问组也持不同意见，并向李大钊作了反映。李大钊深感河南形势严重，为了争取岳维峻，大约在七八月间，③李大钊在于右任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开封。

李大钊到开封后的第二天上午，即由胡景铨陪同，前往督办公署会晤岳维峻。李大钊在晤谈时首先劝说岳维峻放弃他的“杀四门”的战略计划。李大钊在详尽地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后对岳维峻说：“你不要弄着这一摊，又搞那一摊。目前奉军的威胁暂时还不算大，你应该集中力量先打吴佩孚。京汉铁路工人我已经安排好了。”④同时，李大钊还进一步

向岳维峻宣传我党的主张，希望他能支持工农运动。

李大钊在汴期间，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专程从郑州来到开封，向李大钊汇报了关于国民二军的工作。李大钊同岳维峻会晤后，即在王若飞陪同下，由开封来到郑州。王若飞又进一步就豫陕区委党的工作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作了汇报。李大钊对豫陕区委的工作表示满意，并强调工人运动仍是党的中心工作，应尽力做好。他指出，我们做国民二军的工作，固然是为了在北方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以便配合南方革命势力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在北方创造有利的条件，以便于我们开展工农群众运动。随后，李大钊离开郑州回到北京。

一九二六年三月，国民二军在直鲁联军的夹击下遭到失败，岳维峻在败走风陵渡时被晋军俘获，河南复为吴佩孚残余势力所占据。

尽管如此，李大钊在河南援助国民二军的工作，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党利用了这段时期较为有利的条件，积极开展了工农群众运动。在此期间，河南的工人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早已成立工会的京汉、陇海铁路的工人运动更为活跃，走在全县工人运动的前头，带动了全县工人运动的发展。七月初，焦作煤矿举行了大罢工。在焦作煤矿罢工斗争的影响下，一些厂矿也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斗争，并相继成立了工会。在此基础上，一九二五年九月中旬，成立了河南县总工会，加强了对河南全县工人运动的领导。河南的农民运动虽比工人运动开展较晚，但在李大钊的关切下，豫陕区委也积极地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并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农民协会。同时，党还利用国民二军驻在地的条件，发展了

组织，吸收了不少党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李大钊在国民二军中开展工作分不开的。

二

一九二五年初，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虽然这时冯玉祥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认识，没有决心同南方国民革命军合作；但是，他却倾向革命，敬慕孙中山先生。所以，他极愿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士的帮助。同时，由于国民一军地处西北贫瘠之区，给养困难。所以，冯玉祥这时也急需从苏联方面获得援助。经过李大钊的建议和介绍，冯玉祥结识了加拉罕和鲍罗廷。据当时冯玉祥的幕僚毛以享回忆，在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关系中，李大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冯玉祥在张家口期间，加拉罕和鲍罗廷常来会晤。他们向冯玉祥阐述关于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问题，对冯玉祥的思想以很大启发。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回忆当时情景时曾这样写道：“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谈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解见也慢慢起了变化。”^⑤

会晤期间，冯玉祥提出苏联政府援助国民军的请求。随后，鲍罗廷和加拉罕向苏联政府反映了冯玉祥的这一请求。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通过援助国民军的决议。一九二五年五月初，一个约三十余人的苏联军事顾问组去张家口，到国民一军中工作。总顾问是普特纳，副总顾问是普利马科夫（林）。苏联军事顾问为国民一军建立起炮兵、步兵、骑兵等学校，帮助训练军官和士兵。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援助国民一军大量的枪炮弹药。这一切，对提高国民一军的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

同时，李大钊十分重视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李大钊建议冯玉祥在国民一军中成立俱乐部，作为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的基础。冯玉祥接受李大钊的这个建议，首先在国民一军中成立两个俱乐部，并委托李大钊和徐谦负责指导政治工作。根据李大钊的提议，俱乐部周围建立起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俱乐部里成立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孙文主义小组，并由十余名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国民党工作人员讲课。同时，在国民一军中工作的苏联顾问也在俱乐部里讲课。这对于提高国民一军的政治素质，起了一定的作用。

冯玉祥虽然这时在政治上仍采取了所谓“不党不派、不南不北”^⑥的“超然”态度，但他却日益倾向南方革命势力，对民众日益接近。当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对广学生和工人表示深切同情，对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进行谴责，并致电段祺瑞表示，如果英日帝国主义不肯认罪悔过，“甘愿身作前驱，力与彼獠相周旋。虽粉身碎骨，亦所不辞。”^⑦

一九二六年春，国民一军在奉直军阀进逼下，退出北京，固守察、绥一带。这时冯玉祥将国民一军交给其部下张之江统率，自己于四月下旬，在普利马科夫顾问和徐谦陪同下，由库伦（即今之乌兰巴托）出发，赴莫斯科考察访问并寻求苏联政府给予军火援助。行前，适逢鲍罗适由库伦绕道海参威回广州。双方进行了会晤，商谈国民党与国民军合作事宜。在赴苏途中，普利马科夫和徐谦不断地对冯玉祥予启发，终于使冯玉祥认识到自己过去“不党不派”的主张是错误的。于是，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冯玉祥于五月九日抵达莫斯科。在苏逗留期间，冯玉祥除到各处参观访问外，还同苏联军政各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了

广泛的接触。为了更好地帮助冯玉祥提高认识，这时党还派共产党员刘伯坚去做冯玉祥的工作。所以，在访苏期间，冯玉祥的政治认识得到迅速提高，“憬然其从前所行之未能轨入革命正途”。^⑤他在同其参谋长刘骥谈话时深有感触地说：“吾人既倡言革命，推倒贿选总统，铲除复辟祸根，乃顾虑、牵就，不能彻底改革，致转瞬之间复归失败，真可惜也”。^⑥

一九二六年秋，国民一军在奉晋和直鲁军阀夹击下，从南口、张家口和归绥退到包头和甘肃一带，处境厄困。这时国民一军急需冯玉祥亲自统帅。在刘伯坚、徐谦、于右任以及苏联顾问的劝说下，冯玉祥毅然离苏回国，九月十六日抵五原。十九日，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准备同国民革命军配合，共同讨伐奉直北洋军伐。

冯玉祥在归国途中，就曾致函北方党，特称同志，措辞极其恳切。他表示：“此次归来，系要革命。”^⑦随后，冯玉祥又派人会晤李大钊，要求北方党给予援助。李大钊同意冯玉祥的请求，立即派方仲如带着他的亲笔信，驰往冯部，向冯玉祥致意。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即委任刘伯坚为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部队政治宣传工作。同时，李大钊又派石克宣、邓希贤（邓小平）、刘景桂（刘志丹）宣侠父和王一飞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国民联军中去做政治工作。通过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艰苦工作，使国民联军发生了新的变化，部队中公开传阅《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概论》等书籍。在该军的军事政治速成学校中，由苏联顾问讲授《帝国主义论》，刘伯坚讲授《共产党宣言》。这一切，使国民联军的政治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提。当时冯玉祥十分钦佩刘伯坚。他说：“我

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⑩

这次国民一军虽因战事失利，损失惨重，几将全军复灭，但由于冯玉祥即时回国，还可重整旗鼓。所以，李大钊在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对国民军还是寄予很大的期望。他说：“似此则国军退却之损失，虽不在小，而经此一番折磨，一番淘汰，捲土重来，必多一层革命色彩矣！”^⑪

国民一军虽地处西北一隅，但它对北方战局的发展至为重要。正如中央所估计的那样，它“可以随时威吓奉军不敢疏南口之防，不敢存长驱南下而无顾忌的野心”。^⑫那么国民军究竟采取什么战略方针，才能使奉军不敢疏南口之防而长驱南下呢？应该指出，当时国民军的处境还是十分艰难的。地处西北一隅，陇东、陇南正受到张兆钾等军阀部队的骚扰，而西安在镇嵩军刘镇华围困下一直未能解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如集中兵力沿京绥线向东反攻，则难以取胜。这样，不仅不能解西安之围，而且腹背有受张兆钾，孔繁锦重创之虑；国民军如分道出师秦陇和包头，也会因兵力分散而难以奏效。

还在五原誓师前夕，李大钊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在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对国民军的作战方针就作了透彻分析，指出国民军的作战方针是平甘援陕，东出潼关，会师中原。他在报告中说：“出兵陕西，经富谷县、佳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⑬

五原誓师后，李大钊即派人将这一战略计划送给冯玉

祥。

冯玉祥这时对采取什么战略计划正举棋不定。当他接到这一密件并详加研究后，欣然接受李大钊的这一战略计划，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战略方针。此后，李大钊还不断派人给冯玉祥送去作战计划，一再强调“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⑥的意义。

冯玉祥根据李大钊所提出的这一战略计划，组成援陕部队。除留小部驻扎包头一带以牵制奉军外，其余部队取道甘肃，进援陕西，以解西安之围。国民联军首先在陇东、陇南消灭了张兆钾和孔繁锦后，使甘肃得到巩固。接着，国民联军由甘入陕，驰援陕西。经过一番艰苦战斗，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将围困西安的刘镇华部击败，解了西安之围。

西安之围解后，冯玉祥即督励国民军各部东出潼关，会师中原。为了利用各系军阀之间的矛盾，以打击北方势力最大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李大钊又一进步为国民军制定策略方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李大钊在给中央的信中，根据军阀之间的矛盾，提出三条策略方针：第一，利用鲁张（即张宗昌）与奉杨（即杨宇霆）争夺江苏的矛盾，提出了接近鲁张的策略方针，“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即孙传芳）而拒杨”。^⑦第二，利用靳鹗、田维勤、魏益三与张作霖的矛盾，提出了收纳靳、田、魏的策略方针，“使之北拒奉，东扼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⑧第三，利用晋阎与奉张争夺地盘的矛盾，提出了联络阎锡山的策略方针，“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⑨

不仅如此，李大钊还采取切实的步骤，积极地去做法阎锡山的工作。早在给中央写信前一个月，李大钊即派人向晋阎

试探其对国民党的真实态度。究竟为敌，抑为友呢？阎锡山当即表示：“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

② 为了坚定阎锡山靠拢国民党和国民军的态度，李大钊再次派人向阎锡山的驻京代表痛陈利害，劝阎锡山认清形势，支持北伐战争。他致书谓：“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③ 阎锡山接其驻京代表致电后，颇为动色，当即给驻京代表复电谓：“本号（暗指山西）与田君（暗指国党）同行，早具决心，幸为转达。”④ 并声称准备联络靳翼、魏益三等，以及毅军米振标，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共同讨奉。李大钊对阎锡山这种倾向革命的态度，表示欢迎。为此，李大钊在北京亲自接见了晋阎代表孙繁蔚，表示赞同阎锡山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的主张，要求他迅速与国民政府联系，并在军事上作好部署，听候国民政府军事中央部的命令而行动。

与此同时，李大钊还积极调解阎冯之间的矛盾，促进他们捐弃前嫌，一致对奉。从信中可以看到，由于李大钊出面斡旋，阎锡山应允京绥线上之晋军，除留一军三旅驻绥远外，其余部队全部调回晋境。同时，国民军除留部分部队在包头布防外，其余大军挥麾西指，固甘援陕。这样，既解决了阎冯在京绥线上的矛盾，又复牵制了奉军，使其“不敢深

人于黄沙白草无人烟之原漠，以穷追国军也。”^②

由于李大钊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方针，使国民军东出潼关，会师中原时，解除了后顾之忧，并免遭阎军侧击之虑，从而对北伐战局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虽然在这以后不久，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而使大革命遭到失败，冯玉祥也未能继续坚持革命立场，但李大钊这时所进行的统战工作，确实为冯玉祥后来成为反帝、反蒋的民主主义战士，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注：

①《向导》第150期，1926年4月23日

②胡景铨1981年11月23日谈话纪要。转引自《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

③关于时间的考证，参考了张绛的《李大钊在开封》一文。见《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

④ 同②

⑤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32页

⑥《冯玉祥日记》卷6，第50页

⑦ 同上 第73—74页

⑧《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第368页至369页

⑨《冯玉祥日记》卷9第35页

⑩《守常政治报告》（1926年9月8日），《中央政治通讯》第3号，1926年9月15日

⑪ 同⑤ 第113页

⑫ 同⑩

- ⑬ 同⑧ 第362页
 ⑭ 同⑩
 ⑮ 同⑤ 第104页
 ⑯ 同⑤ 第113页
 ⑰ 《守同志来信》（1926年12月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⑱ 同 上
 ⑲ 同 上
 ⑳ 同 上
 ㉑ 同 上
 ㉒ 同 上
 ㉓ 同 上

李大钊同志与北京蒙藏学校学生

赵履谦

六十多年前，李大钊同志为了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把北洋政府控制的蒙藏学校转变成为培养党的民族干部的阵地，培养了一代蒙古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为在内蒙古草原开展革命活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回顾他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热情关怀与辛勤栽培少数民族干部的业绩，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

的斗争中，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压榨、凌辱和歧视，严重地阻碍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人民长期处于落后愚昧状态，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全国响应。辛亥革命的风暴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1912年1月1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庄严宣告，要“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倡导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蒙藏学校，就是在辛亥革命的凯歌声中，于1913年诞生的。它是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子弟的学校，校址座落在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今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招生的对象是蒙族、藏族子弟。当时为了鼓励蒙、藏同胞的子弟入学，规定学生在衣、食、住方面都享受“优厚待遇”。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建立了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对外卖国、对内镇压，继承历代反动统治者的衣钵，倒行逆施。为了维护和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妄图把蒙藏学校变成在少数民族中培养自己走卒的阵地，使蒙藏学校隶属于北洋军阀政府的蒙藏事务局。在北洋政府蒙藏事务局的控制下，蒙藏学校变成了一座小衙门。他们掌握了学校的行政人事大权，排除异己，打击进步势力。例如原校长张武，思想进步，向往民主、自由，关心少数民族学生，忠于教育事业，是一位备受教师和学生尊敬的校长。北洋军阀的官僚们却把他视若眼中钉，在他头上硬加上“治学无方”等罪名，把他排挤出校。先后派其亲信王

维瀚、金永昌等人充任蒙藏学校校长。这些人不学无术，思想反动，依特权势力胡作非为，采用建封军阀专制的方式管理学校。稍不如意就对学生训斥，下令学生不能与闻政治，不准“轻信异党宣传”。要求学生对于北洋军阀政府俯首贴耳，如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言行就要“开除、判刑、镇压”，妄图把学生培养成为自己服务的忠实奴才。由于反动官僚把持校政，“从中克扣和贪污”。①伙食标准一再下降，衣服、被褥得不到解决，生活每况愈下。学校校政黑暗，教学内容陈旧，这种状况与当时的新思潮背道而驰、同蒙藏青年学生渴求进步、追求真理的愿望完全相悖，使千里迢迢，离乡背井来到北京学习的蒙藏青年大失所望，感到苦闷和窒息。

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皱了蒙藏学校这一潭死水。“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蒙藏学校校园里洒进了阳光，给这所学校带来了蓬勃生机。同时，蒙藏学校也日益成为新、旧势力争夺的场所。北洋军阀要继续使它成为培养自己忠实奴才的阵地。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对蒙藏学校十分关怀和重视，要把它变成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变成在少数民族地区散布革命火种的革命干部学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认为民族问题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以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的学说作指南，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坚决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号召各族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反对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求得各民族的彻底解放。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都

为彻底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而积极努力。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为实现党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为培养教育少数民族青年，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所蒙藏青年较集中的学校，培养了整整一代为党的革命事业、为全国各民族的解放，尤其是为蒙古族的解放，英勇奋斗的革命骨干力量。例如北伐战争时期，在挥戈北上中壮烈牺牲的荣耀先；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坚持斗争而英勇牺牲的多松年、被反革命分子白云梯暗杀的李裕智；抗日战争时期，在大青山领导蒙汉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并多次把内蒙古地区的先进青年送往延安学习深造，为此遭白寇枪弹而献身的贾力更，以及后来成为内蒙古党组织著名领导人的乌兰夫、奎陞、吉雅泰等同志，都是在蒙藏学校学习期间，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负责同志的启蒙、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蒙古族早期的优秀革命战士。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列主义广泛传播，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蒙藏学校的学生也显示了青年人热烈追求新思想、新潮流的特点，学潮不时发生，曾先后赶走了北洋政府派来的三个校长，如迫使原任警察厅长的反动校长王维瀚，窜出校门，“跳上人力车就一去不复返了。这件事轰动了北京”。^②因此，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各派的政治势力都为争取这批少数民族而来校活动，学生的政治思想随之而异”^③。最后这批追求民主、自由、热爱祖国的蒙族青年靠近党，有些人终于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跟共产党走，成为蒙古民族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其中的一些人成为杰出的革命家。这是马列主义的胜利，党

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以李大钊为首中共北方区委辛勤培植的结果。

蒙古族青年荣耀先，蒙名谦登若宪，就是李大钊等同志培养的蒙藏学校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最早的蒙古族党员”^④。荣耀先于1918年由原绥远省土默特旗政府，保送到北京蒙藏学校读书。这位蒙族青年到北京后，就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视野大开，心潮激荡，热情地投身到各种政治运动中，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五四”运动时，荣耀先成为蒙藏学校学生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通过这次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他进一步接受了革命的洗礼。1920年参加了李大钊同志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地扯在北京宣武门外一个庙内）。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蒙古族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23年，荣耀先同志遵照李大钊同志的指示，以蒙藏学校招生的名义，回原绥远省土默特旗招收新生。经过他的努力，动员了乌兰夫、奎陞、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佛鼎、赵诚、高布泽博、康成根、康计民等二十多个蒙古族的进步青年进入蒙藏学校学习。此后，李大钊同志对蒙藏学校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同年秋，李大钊同志为了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派北方区委的邓中夏、朱务善、黄日葵等同志深入蒙藏学校，向学生了解调查有关蒙古族的问题。冬天，李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更多同志，经常来到学校，深入到学生宿舍、教室，有时在院中的大枣树下和同学们聊天、谈心，通过这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讲解宣传马列

主义、共产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国内外形势，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关系，及作报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等等。李大钊同志曾对他们说：“咱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要想推翻这些剥削者和压迫者，也需要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单靠一个汉族是不行的。”勉励他们要“成为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⑤殷切的期望使这些进步青年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循循善诱的教导，使这些青年对马列主义、党的民族政策有粗浅的了解，思想上受到很大启迪。李大钊同志在他所著的《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一文中，阐述了蒙古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一致性，指出蒙古民族要摆脱民族压迫，“只有推翻军阀、王公两座大山，才能求得解放”。因此，李大钊等同志还常提醒这些青年，“要抵制反动军阀和王公的腐蚀，永远保持革命精神”。这些教导正如奎陞同志回忆说：“真象是拨亮了心头的一盏灯。过去，总以为穷人穷命，生的穷是命里定，没办法、没出路。听到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感到有奔头了，有前途了。从此以后，我懂得了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坚定了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胜利的信念”^⑥。

在蒙古族青年思想觉悟日益提提的基础上，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局先后发展了乌兰夫、奎陞、赵诚、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立了团支部。通过青年团的组织，李大钊同志又引导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阅读当时党所主办的刊物——《响导》、《新青年》，《政治生活》等。教导他们在学习中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以所学的理论分析当时社会上的种种矛盾，及蒙

古民族受欺压的根本原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向他们讲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平等自由和民族的解放的道路。在李大钊等同志的培养下，1924年下半年，青年团员中的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的组织，“组成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⑦。也是蒙古族的第一个党支部。蒙藏学校的党组织成立后，在举行各种会议时，李大钊和北方区委的负责同志经常参加，并让他们参加校外的各种活动，据吉雅泰同志的回忆，李大钊同志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会议回来所作的报告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那次会是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举行，蒙藏学校的几十个党、团员都参加了。李大钊同志在报告中介绍了“苏联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后，进行巨大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当他讲到苏联如何逐步实现民族平等，解决民族问题时，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兴趣，差不多一字一句都紧扣我们的心弦，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和希望”。使这批蒙古族的先进战士进一步“懂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懂得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和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联系和一致性，并坚信内蒙古民族的真正出路和彻底解放就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⑧。

蒙古族学生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思想、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后，李大钊同志又进一步培养他们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组织领导他们投入各种政治活动和学生运动。并担负一些社会工作，如多松年同志担任北京西城区党的宣传员职务。1924年11月，在欢迎孙中山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中，蒙藏学校的学生，“是这次

运动的生力军之一”。为了把斗争引向少数民族地区，李大钊同志派吉雅泰同志回内蒙古（绥远）开展工作。他很快就组织起了“绥远国民会议促进会”，领导当地群众投入斗争。

1925年3月1日，在李大钊、孙中山亲自主持下，“国民会议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吉雅泰、奎陞、赵诚和崇德臣同志以绥远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李大钊同志常叮嘱他们要坚持党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主张，以及要注意国民党右派在会上的破坏活动，贯彻执行“扩大左派、批评中派、反对右派”^⑩的方针，使他们的政治斗争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反帝爱国的烽火席卷全国。在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蒙藏学校的学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时，“全校才有120个学生，就有90多个党团员”^⑪。他们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不仅倾校而出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而且经常担任纠察、联络等各项工作，在斗争中做出应有的贡献。后来，北方区委又派遣李裕智、吉雅泰等回内蒙古开辟工作，把革命烈火引向内蒙古草原。这些经过锻炼和考验的蒙族青年，回家乡后很快打开了局面，吸收了一批蒙古族青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团的组织。

1925年上半年，中共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工作委员会先后在斗争中诞生，下半年中共张家口地委建立，兼管热、察、绥三特别区党的工作^⑫。从此，内蒙古地区的各族

学生、工人、农民、牧民、市民纷纷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如绥远地区开展的声援上海“五卅”死难工人、学生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同年冬，在李大钊同志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吉雅泰、李裕智等同志被选入领导机构。李大钊、赵世炎同志亲自担任工农兵大同盟的正副书记。多松年同志担任机关报——《蒙古农民》的编辑和发行人。不久，在李裕智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又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旺丹尼玛任总司令，李裕智任副司令。革命组织和革命军队的诞生，是内蒙古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产物，而革命组织、革命军队的建立，又推动了内蒙古地区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蒙汉等族人民逐步接受了党所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废除王公扎萨克^②封建特权制度。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等主张，掀起了革命斗争的高潮，标志着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领导下的新觉醒。这正是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他们精心培养的蒙藏学校学生，从事革命活动结出的丰硕果实。

李大钊同志为了培养、发挥、蒙藏学校这批革命新生力量的作用常常亲切地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好好干！”当他们做出点成绩时，李大钊同志就无限喜悦、倍加赞扬。例如：多松年同志将自己负责主编的《蒙古农民》创刊号送给李大钊同志审阅时，他十分高兴地说：“哎呀！松年同志，真想不到你能搞得这样漂亮！完全像一个老手办的。辛苦了，辛苦了。”^③。又如在“五卅”运动等各种活动中，李

大钊同志把蒙藏学校的学生称之为“最靠得住的力量”^④。

同时，李大钊同志十分关注蒙藏学生的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的学习革命斗争需要知识，一个优秀的革命者更需要接受人文化的优秀遗产，从中吸取养料，指导当前的革命斗争。因此，每当许多人由于参加繁忙、张紧的政治运动，忽视文化课程和理论书籍的学习和钻研时，他就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教导他们，在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同时，必须刻苦认真读书，学好文化知识，还要求他们精读一些基本理论书籍，为将来回内蒙古进行革命工作打好基础。李大钊同志对青年人一向抱着殷切的期望。以火热的心培植他们。在一次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会上，他满腔热情地说：“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使中国将来能产生几位真正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采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⑤。许多青年包括蒙族青年，听到革命先辈发自肺腑，充满信任与期望的讲话，受到激励和鼓舞，增强了学习理论的信心与决心。

当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时，李大钊同志对他们极为关怀，经常提醒他们要时时提高警惕，不可冒险粗心，连宣传品、文件放在什么地方，是否安全都要过问。有时李大钊同志因工作缠身，不能亲自去蒙藏学校时，就让北方区委的同志去指导和帮助工作。1925年初，为反对段祺瑞泡制的“善后会议”，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开展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敌我斗争非常尖锐，李大钊同志常派邓中夏同志到蒙藏学校看望学生、检查工作。有一次邓中夏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是李大钊同志亲自让我来的。李大钊同志在正开会，每天忙得很，可是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

他估计军警这几天要加紧抓人，所以要我们格外当心。他知道你们的热情高，有胆量，可是，越在忘我工作的时候，越要注意安全。他特别强调说，你们是内蒙古革命的火种，党把很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可千万不能大意呀”^⑩！李大钊同志关切蒙族学生的深情跃然纸上。果然几天以后，一批反动军警气势汹汹地到蒙藏学校学生宿舍搜查，由于李大钊同志和北方区委其他同志的关照，早有准备，军警毫无所获，悻悻而去。

李大钊同志对这批“内蒙古革命的火种”的关怀、教育、培养、使用，不仅着眼于当时的革命需要，而且放眼于将来，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对这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蒙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倍加爱护。由于蒙藏学校学生积极参加、组织了校内外的各种斗争，敌人已经知道“蒙藏学校里有一批革命学生是北平革命风潮中的重要力量”^⑪。“蒙藏事务局竟以取消官费，停办学校相报复”^⑫。反动派决心消除这些对他们来说是极危险的革命火种。就革命方面来说与敌人相反，需要千方百计保证这些新生的革命力的安全，并为了使他们更好地成长，李大钊同志请示中央，分别把他们送往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和北方党组织在天津开设的训练班等地学习。这些同志获得进一步深造机会，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李大钊同志具体的精心栽培。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在内蒙古草原生根、开花、结果，使内蒙古地区首先成为我党进行革命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在蒙古族中出现了像乌兰夫同志那样的国家领导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李大钊同志一直念念不忘蒙古族革命青年的成长，一直

关注着内蒙古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为此呕心沥血。李大钊同志关心着少数民族青年的成长和少数民族解放斗争事业，少数民族的青年和人民，也和李大钊同志心心相连。193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惨杀。当噩耗传到内蒙古草原后，该地的各族人民无比悲愤，沉痛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示威和追悼大会，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开创者，缅怀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内蒙古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少数民族人民心中。

注：

①奎陞：《磨难虽多志弥坚》。引自《实践》1981年第10期。

②陌南：《旧地重游 缅怀先烈》
——乌兰夫同志视察原蒙藏专门学校。引自《民族团结》1984年第5期。

③彭致禧：《李大钊与内蒙古早期革命运动》。引自《内蒙古日报》1980年11月13日。

④乌兰岱心等：《最古的蒙古族党员荣耀先》。引自《内蒙古日报》1980年8月20日。

⑤赛希等：《多松年》引自《草原》1980年第1期。

⑥同①。

⑦同③。

⑧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
引自《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

⑨同上。

⑩同②。

①《内蒙古地区党组织年表》。引自《内蒙古日报》
1981年6月1—6月10日。

②蒙古语：执政之意。

③赛布：《创业艰难百战多》
——忆我的爸爸多松年。引自《内蒙古日报》
1980年9月26日。

④同②。

⑤同⑧。

⑥同⑬。

⑦同上。

⑧同③。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

陈泰生

一九一九年，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在北京领导了五四运动，这是史学界一致公认的论断。但是，李大钊同志如何领导五四运动，对运动的发展方向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专门谈及到这方面的文章还不多，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尝试。

“催生五四运动的人物”

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勇气，广大人民在五四运动中把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

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李大钊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北京领导了五四运动。他的思想在运动爆发前已经达到了世人所未及的高度，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封建主义的腐朽性有了相当的认识。十月革命的炮声，使长期勤奋不懈地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李大钊，很快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一伟大真理。从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到五四运动爆发，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重要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正确地剖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原因，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阶级实质。他指出：“原来这些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

①从经济关系中寻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原因，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乃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乃是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他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实际是并吞中国的隐语，是“侵略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在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的同时，大钊还阐述了世界人民要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看到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才能取得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必要把世界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民主作为世界的民主的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②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

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的资本的阶级。”^⑤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钊同志提出要中国人民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为在中国实现“劳工社会”而奋斗。“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帝国主义）的野心，不惜在世界大战的时候，起了世界革命。”^⑥因此，这次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⑦文章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此看为人民打败帝国主义的楷模，是反帝斗争的一个成功范例，号召中国人民“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⑧

欧战结束后，广大的中国人民表现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颇大程度上，则是同一种错觉或幻想扭合在一起，就是“公理战胜强权。”“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⑨在大街小巷里，在天安门前和中央公园举行的演谈会上，人们谈的都是这个题目。正当“公理战胜”之风盛行之时，李大钊在中央公园登台演说。发表了以上的看法，不久，又写了《布尔什维的胜利》一文。这些论文解答了欧战结束究竟是什么人的胜利，这一根本性问题，给沉浸在“公理战胜”迷雾中的人们吹来了一股和煦的春风。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还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把从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创办开始，就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推向深入。陈独秀创办《青年》（一九

一六年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后，就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开展了猛烈的进击，用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新思想，启发人们的理智，使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盲从、蒙昧中解放出来。但是，当时由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采取了不评时政的方针，把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分割开来。这种作法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同志也是《新青年》的编辑之一，他反对回避现实，不涉时政的倾向，十分注意研究苏俄的十月革命，以十月革命的作法来对照中国的现实。他说：“我们要求民主，也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须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⑧一九一八年他还先后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Pan...isra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这两篇尖锐批评时政和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虽然，这两篇政论文都没有及时在《新青年》上发表，但是，这两篇文章同其它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却是代表了时代的发展潮流，推动了《新青年》杂志改变不评时政的偏向。欧战的结束使文化运动同现实政治斗争相脱离的状态迅速得到了改变，陈独秀等人深感不评时政的《新青年》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于是，从第五卷第五号起，刊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的胜利》。同时，为发挥及时分析形势和指导运动的作用，李大钊和陈独秀又发起和主编了一个新的刊物《每周评论》。《每周评论》每星期出版一号，每号都有国内外大事评述和社论，从创刊起就鲜明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

命以及德奥等国的革命斗争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同时，又继承了《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文化、道德的传统。它是当时全国革命性和战斗性最强的刊物，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影响，事实上成了五四运动在思想舆论准备方面的一个指导性刊物。因此，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同现实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这里李大钊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文章比同时期的人更早地涉及中国的时政，比别人更刻深、更鲜明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比他人更大胆，更直接地提倡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给五四以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以有力的推动。

李大钊同志在五四以前大力宣传反帝反封的思想，宣传十月革命的经验，在制造革命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参与《每周评论》创刊工作的张申府回忆：大钊同志为创办《每周评论》不惜劳苦，“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号编好，当夜就由李大钊与我，同到宣外大街印刷地点从事校对，直到深夜四点，校完印好”。^⑨他在这个刊物上常用“常”、“守常”、“明明”、“冥冥”等笔名，对重大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他还指导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北大学生办了《国民》杂志和《新潮》月刊，担任这些刊物的导师和顾问。他还帮助《晨报》第七版（付刊）实行改革，并在这个付刊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曾陆续刊载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即《雇用劳动与资本》）以及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这些报刊的创办和改革，尤其是大钊同志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大钊同志的宣传、组织和领导下，

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风起云涌，终于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大钊同志的同辈人回忆起那风云激荡的岁月，都推崇他是“催生五四运动的人物”。

把握运动发展方向的领导者

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终于爆发了。大钊同志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直接参加和领导了北京的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即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之日，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在中国报纸上第一次纪念世界无产阶级的节日。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阶级“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是工人阶级的祝典日。

“直接行动”这是李大钊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时多次提到的，含意就是不经当局同意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在五四前夕，大钊同志公开提出“直接行动”的口号，为即将来临的五四革命风暴发出了战斗讯号。

五月四日，北京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集会天安门，并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演出了火烧赵家楼这出动人的话剧。受到大钊同志培养教育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活动，并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与李大钊接触密切或受其影响的青年学生许德珩、张国涛、刘仁静、罗章龙、以及新潮社成员罗家伦、傅斯年等也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五月六日，北京学联成立，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都在其中任职或参加了学联工作，大钊同志和北京学联的负责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学联

的重要文件，就是由他代拟的。他还坚持在红楼的图书馆办公室上班，积极从事教职员联合会的活动。九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惩办爱国学生，辞职出走，在学生和教职员中引起挽蔡运动。当晚在北大教职员召开的全体会上，李大钊被推举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付增湘设法挽留蔡元培。十日，大钊同志等北大教职员代表，向北洋政府交涉，坚决挽蔡，更广泛地发动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采取同一步骤。据高一涵回忆：“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⑩

大钊同志不仅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中的各种活动在组织上与运动保持着联系，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方面把握着发展方向，密切注意运动的动向，及时提出新的理论，引导运动向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他白天参加各种活动，夜晚伏案工作写书撰文。十八日，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深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更进一步地指出中国人民的斗争目标，号召“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他说：“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政府作扩张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大钊告诉人们，决不要对帝国主义抱有任何幻想，“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和平得到了胜利，以后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色彩了。谁知道这些名词，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

牌。我们且看巴黎和会所议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和平、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大钊同志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反动本质，进而指出，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就不仅要反对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和日本侵略山东，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整个统治。他说：“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④在文章中，大钊同志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敌人，不仅有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还有整个帝国主义的强盗世界，做出了全世界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正确论断，响亮地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口号。这里所谓“改造强盗世界”，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所谓“民族自决”就是要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这个口号喊出了中国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它具有及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种坚决的反帝思想指导下，才使五四运动具有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才把中国反帝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李大钊同志这一阶段的思想比五四运动爆发前更进一步，反帝的思想变得更加彻底了。

另一方面，大钊同志把反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二十六日，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三号上

发表《黑暗的东方》、《太上政府》等文章。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特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②点明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的主奴关系，告诉人民要维护民族的独立国家的主权，就必须既反对封建主义、又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中外反动派的强大统治必须联合各界力量，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号召“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③邓中夏等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学生五四前就到工厂、农村作宣传、讲演和调查工农生活，这是知识分子接近工农群众的初步尝试，为以后的结合打下了基础。六三以后，五四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北京政府对青年学生的疯狂镇压激怒了全国人民，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英勇地参加了斗争。六月五日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接着长辛店、唐山、长沙、武汉等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各城市的商人也相继举行罢市，运动扩大到全国二十余个县的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参加五四运动的，就不只是知识分子了，成为一个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阶级。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向青年知识分子们发出与劳动阶级打成一气的口号，这时更成为势在必行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实际行动了。

蓬勃开展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迫使反动军阀政府在六月七日释放了被捕学生，九日、十日公布了准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本职的命令。

在这期间，李大钊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运动和工人为主的群众斗争，把五四运动推向深入，和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提出了“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经济上之权利；”“免除徐树静、曹汝霖……六人官职；”“取消步军统领和警备司令两机关；”“市民需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④等五项要求。《宣言》不仅要求罢免军阀和国贼，而且提出了“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⑤的问题。大钊同志根据罢免曹、章、陆后的新形势，提出了运动进一步的斗争目标。大钊将《宣言》印成传单，十一日带领两人去城南游艺园散发。同时，陈独秀等三人去新世界散发传单，被化装的便衣侦探捕去，大钊同志立即设法营救。

大钊同志在《宣言》中提出的要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人民群众不以罢免曹、章、陆为满足，不为反动政府的捕禁而沉默，在全国学联成立以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拒签和约的运动又在全国兴起，二十七日，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学联请愿团、北京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陕西学生代表等共四百余人前往新华门请愿。要求徐世昌认可三事：不保留山东则和约决不签字；决定废除高徐、济顺两路草约；立即恢复南北和会。徐拒不出见，全体代表则在外伫立一天一夜。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举国人民严厉督责下，未签对德和约，并将此事电告徐世昌。二十九日，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上，李大钊发表了六篇随感录。题目是：《牢狱的生活》、《不要再说吉祥话》、《新华门前的血泪》、《改造》、《哭的笑的》、《威先生感慨如何》、他在这些短文中，激昂愤慨地说：“今天（二十八日）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呼声必能

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今年今日新华门前的哭声。”“这样的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拒签和约，挽救了山东于危亡，不能不说是五四运动取得的一个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此，大钊同志才提醒人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前的哭声。”

“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⑩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这就是形成了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是五四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运动同时又是一次思想文化运动的必然发展方向。

李大钊同志随着运动的进展，配合革命的需要，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与革命运动的实践具有这样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对五四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又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力条件。大钊同志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随着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不断提高，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一九年五月至十一月，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近三万字的长篇文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由于处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还不完备，

有些地方写的还不准确，但它毕竟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在我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还没有整本地翻译过来，而帝国主义者、军阀势力及其文人的百般攻击、歪曲，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各种曲解、附会。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大钊同志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很不容易的，这表明他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篇长文，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好教材，影响很大。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同时，大钊同志还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真正的解放》等文章，一再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这一时期大钊同志在家乡的五峰山上写了反驳胡适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寄回北京。八月十七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发表了大钊同志给胡适的这封公开信。在此之前，胡适曾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割裂问题与主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打着所谓反对空谈主义，要研究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幌子，反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贩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他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空谈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作到的事，是鸚鵡和留声机都能作到的事。”针对胡适的一派胡言，大钊同志从“主义”与“问题”的关系；假冒牌号的危险；所谓过激主义；必须“根本解决”四点，阐论了自己的主张。在这“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大钊革命坚强果断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打击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更进一步地向中国人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不仅批判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指出了当时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

场的局限性，促进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在这一阶段的文章中，李大钊同志着重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旗帜鲜明地宣布自己崇信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努力”应该使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①他说“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社会的新纪元”，^②社会主义的特点与要求，就是要和各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大凡一个主义，都要有理想和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思想尽量运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③社会主义虽然是外国人创立的，但由于它是普遍真理，所以只要把它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一定能够在中国实行。在这里，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了极为重要的精辟论述。它不仅从根本上驳倒了胡适的“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无用，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而且对指导整个中国革命都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实现呢？李大钊指出，必须进行革命，必须开展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领取

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必须要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②这里的根本解决就是指运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进行革命，是与胡适的改良思想针锋相对的。李大钊还介绍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由来。所谓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在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结构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这种对立的阶级“一方面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③他说阶级斗争不但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这样，“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的阶级斗争，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倒了“生产力非常发展”，“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最后”^④时刻就到来了。

这时的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已经有了较深刻的领会，他的以上思想对五四以后的青年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同时他追求真理，信仰马克思主义及其坚定的无畏精神，也给青年学生以巨大的鼓舞。他蔑视那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凭空造谣和肆意诽谤，在批驳胡适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进行了辛勤的口播笔耕，从五四运动到党的成立期间，他发表的文章、讲义、演说，据目前所知，就在一百三十篇以上，平均每六天就发表一篇。同时他还在各学校授课，讲授的课程也达十门以上。这是多么巨大的贡献！

一花引来万花开。在大钊同志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前导下，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更多的人开始宣传和接受新文化、新思想，考虑改造社会的问题。继《每周评论》之后，五四以后新出版的刊物就增至四百余种，绝大多数都是宣称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象湖南的《湘江评论》，天津的《觉悟》、以及《浙江新潮》等进步刊物。不仅在传播革命思想上作出了成绩，而且造就了一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

在增办刊物的同时，各种社团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社团的成立起到了团结青年，研究问题的作用。李大钊不仅重视在舆论宣传方面影响青年，还注意利用团体的作用组织团结青年。一九一九年三月，他就指导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以后，“少年中国学会”经一年筹备，于七月一日在北京成立，总会设在北京。会上根据大钊同志等建议，改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立少年中国。”这是五四时期最大的社团之一，加入学会后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的就有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刘天章等。一九二〇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十九人，这些人多数成了北京早期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同年八月，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二十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茶话会，李大钊提议各团体有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他认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不足以团结一致，对

外尤不足以与人进行联合行动。他所提倡的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五四以后接受大钊同志指导和受他影响的团体还有很多，这时期大钊同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已经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准备了。

李大钊同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进步团体的同时，还注意推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领导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北京五千多个大、中学生捐款买了十七万个面包，印上“劳工神圣”、“推翻专制”等字样，在全市沿途分送给劳动者，同时散发了三十万张传单和进行演讲。一九二〇年一月，部分青年学生分组到洋车工人的住宅区去作调查，二月份，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一次洋车工人大会。大钊同志还安排了邓中夏、张国涛等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去进行工作，并在以后建立了长期的工作活动点，发展了工会组织。五四以后，大钊同志指导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带领青年学生深入工农群众，与工农相结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而这一结合的必然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五四以后，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迅速分化，原来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转变为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即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而这一时期新旧文化思想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激烈动荡的时期，李大钊同志激流勇进，奋力拼搏，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不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旗手，倡导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功臣。他的活动，他的思想代表了五

四运动的正确发展方向，真正代表了运动的未来。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又是李大钊诞辰九十五周年。在这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里，就把对革命先驱李大钊领导五四运动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为对伟大运动和伟大人物的纪念吧。

一九八四年五月

注：

①《李大钊选集》第110页

②《跋〈国体与青年〉》见河北文史资料选辑（3）63页

③《每周评论》第3号，《新纪元》

④《庶民的胜利》见《李大钊选集》110页

⑤⑥《李大钊选集》第113页

⑦“每周评论发刊词”

⑧同5

⑨河北文史资料选辑（3）63页

⑩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

⑪《李大钊选集》212—214页

⑫《李大钊选集》215页

⑬《李大钊选集》146页

⑭《五四运动在北京》201页

⑮同上

⑯《马恩选集》第一卷、284页

⑰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⑱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⑲同17

⑳同17

㉑同18

㉒李大钊《阶级斗争与互助》

李大钊对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之贡献

白桦

李大钊烈士壮烈牺牲至今已经五十七年了。象五十多年前那个“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青年之中华”如强大、蓬勃的巨人，屹立于世界东方。今天，回忆李大钊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以顽强不屈的革命意志，不倦地研究和思考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研究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研究我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继承前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和求索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必须强调指出，李大钊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过程，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条红线。科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是李大钊这一探索过程的精髓。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破天荒地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为实现这一纲领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和行动计划等，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道路，具有深远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他还没有十分充足的领导革命的经验，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农民土地要求等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罢工高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在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中，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经受了考验，充分显示出中国无产阶级坚强的组织力量和彻底的革命精神。

为了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党的三大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促成了以国共和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李大钊当时以主要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工作，并且就全党来说研究和领导农民运动的方面是薄弱的。但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引起了李大钊同志的重视。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夏，随着革命的进行，农民运动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全国农民暴动此伏彼起，反苛捐杂税、反贪官污吏，反预征钱粮、反军阀战争，要求武装、要求土地成为全国广大农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呼声。但是，围绕着已经兴起和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都开始尖锐起来了。反动军阀极端仇视农民运动，他们对农民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对农

民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混入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对农民运动一方面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另一方面利用地主反动武装捣毁农会，杀害农会干部，甚至公开组织武装叛乱，妄图使无产阶级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把无产阶级孤立起来。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对反动阶级一再忍让，说什么“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唯恐农民运动“过火”了，以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他们虽然感到势单力孤，但找不到真正的革命动力，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限制”农民运动。

其实，关于农民问题，我党是有过指示的。一九二五年一月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益关系，天然地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此决议案指出：“无论在哪一国，农民总是占大多数”，他们是一部分革命势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同盟者。“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同时指出：“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能可能。”在这个劳动大会的宣言中，我

再次强调，中国劳苦群众的解放，关键是“要由进步的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去进行斗争。

同年十月，我党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发布《告农民书》，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广大农民：劳动阶级的工人和农民是最苦的人，世上的一切都是他们造创的，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完全为厂主地东做了牛马，这是世上第一不平的事”。《告农民书》还指出，农民受地东、外国资本家、封建军阀、贪官劣绅的重重剥削而困苦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并号召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解除自己的艰难与困苦。

以上事实表明，革命发展到一九二五年时，我们党已逐步开始重视农民问题了。根据当时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五卅”运动以后，李大钊为阐述我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第一个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间，先后发表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两篇文章，为发展中的农民运动呐喊助威，为探索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不懈努力。

在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中，李大钊根据我国国情，强调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阐述了农民革命的中心内容，指出了发动和武装农民的重要性。

首先，李大钊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要求平均地权的运动，分析了原始社会的“土地共有阶段”、周秦土地制度、汉代土地兼并、晋代占地制度、孝文帝均田、唐武德年间租庸调、宋代限田制……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和孙中山的民

生主义。通过分析，使我们得到两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其一，土地农有、平均地权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普遍要求和共同愿望；其二，农民自发的均权运动以及资产阶级所拟平均地权的办法，均因阶级的局限而不能实现。

接着，李大钊分析了当时中国农民破产的趋势，指出“中国革命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从而明确了农民革命的中心内容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李大钊指出，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所以在估计革命动力时，不能不看到农民是重要成份。而当时农业主要是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因受外币入侵、军阀横行的影响而每况愈下，农民生活日益困苦，“农村虽显出不安现象，壮丁相率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加上由于土地占有情况的极端不合理，自耕农与佃农成为农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土地委员会报告》，我们可以对二七年前后土地占有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当时全国共有农户56,000,000户，共336,000,000人，而当时全国人口，420,000,000人，可以看出其中80%是农民。而富农、中小地主和大地主占有地农民总数的32%，其土地则占全数土地81%。无地农民或有地而地极少的贫农却占农民总人口的75%。李大钊依据大量调查统计材料，分析了农民当时的情况，指出在土地严重不均等的现实下，多数农民破产而无以为生，所以“‘耕地农有’便成了

广大的农民所急切要求的口号”。李大钊指出，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当时所有土地，并进行改进，兴修水利，“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的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强”，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而这正是我们争取农民这个广大的同盟军进行革命斗争，成为革命动力的关键。可见，农民土地问题是农民革命的根本问题。

面对农民日益走向破产，土地要求日渐强烈的情况，怎样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呢？李大钊指出：“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农民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必须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反抗封建阶级的压迫，谋求自身的解放。

在农民暴动的浪潮中，农民自发的武装组织红枪会应运而生。红枪会活跃在鲁豫陕等省，给反动势力造成了很大威胁。但在那时，党内对红枪会看法不一，不少人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李大钊力排众议，全面地对红枪会作了客观分析。他指出：红枪会反洋人，这是农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引导他们消灭狭隘的人种的见解，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到全世界革命的工农民众都是他们的朋友；红枪会要真主，这是农民要求政治安定的表现，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得到安全生活的唯一出路；红枪会讲迷信，这也是客观事实自然的反映，一旦现代武器进入了他们手中，把他们武装起来，迷信则必然失去效力。

同时，李大钊指出，由于经济基础的局限，使农民有一种狭隘的村落主义和乡土主义。这往往能分裂农民运动，使

得农民武装为军阀土豪所利用。所以，面对农民的要求和弱点，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必须主动地积极地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克服由中国落后的经济生活带来的弱点，搞好农会和红枪会的工作，领导农民夺取土地，谋求解放，这正是无产阶级政党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发挥重大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我们研究李大钊对农民问题探讨的贡献，可以看出，在李大钊的研究过程中有三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

其一、根据新形势，探讨新问题。早在“五四”前夕，李大钊就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问题，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劳动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青年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必须先有一个立宪的民间，若要有立宪的民间，必须先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他历数了农村的昏暗和广大农民的疾苦，发出“青年啊！速向农村去罢！”的呼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主要从事建党和统一战线工作，虽然也关心和支持农民运动，但毕竟未用主要精力。但是，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使得农民问题成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党能否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能否得到最广大的革命动力，能否取得最后成功。根据这新出现的形势，李大钊同志也及时地积极地立刻投入研究，成为党史上第一个开始面向农村，研究农民问题的人。

其二，重视革命理论。我们知道，李大钊一九一九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向中国全面介绍了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是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李大钊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回顾，可见李大钊是时刻以革命理论为指导的。他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确信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确信群众的创造力，看到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他深刻地认识到由于经济基础的局限，农民思想和行动上都存在着本身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农民的革命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但农民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否则他们是完不成革命任务的。

其三，理论联系实际。李大钊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过程，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他处处以正确理论为指导，联系中国广大农民现状，运用大量具客观性的调查统计资料，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农民的处境和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农民生活、进行农民革命的途径和方法，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楷模。以后，毛泽东同志更是深入到农村现实中去，亲自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揭开了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新篇章。革命领袖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求索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

李大钊运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去思考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认识到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工农联盟，要不要领导，发动和武装农民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已成为历史发展趋势。面对这种新情况，我们如果能继承李大钊积极思考，不断求索的精神和严肃的科学研究态度。庶几可使前辈人的理想临

进一步，后代人的道路宽广一些，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创造，中国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无产阶级解放是妇女彻底 解放的必由之路

——学习李大钊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

季 华

李大钊同志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对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等问题，都作过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并为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际斗争。李大钊同志极为重视妇女问题，把妇女解放视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五四”运动前后，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等刊物上著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了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宣传了无产阶级关于妇女解放的正确思想。本文谈谈学习李大钊同志在“五四”时期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的几点粗浅体会。

一、必须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妇女问题

妇女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人类的历史。妇女的历史，融汇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和男子一样，她们的发生、存在和发展，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同样，她们的地位、作用和命运也受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制约和影响。和男子又不一样，妇女和男子的性的差别，她们的存在和发展，她们的地位和命运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就有了不同于男子的所谓“妇女问题”，在人类社会科学中，就有了以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它的发生、存在和发展，它的地位作用和命运的理论即妇女理论。

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妇女观或妇女理论。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对妇女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并逐步形成系统的妇女理论。剥削阶级的妇女观的基本特征是否认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同男子一样是历史主人的地位，否认妇女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轻视妇女，特别是轻视劳动妇女。资产阶级的妇女理论有以下两种基本倾向：一种倾向是建立在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的，只强调妇女的自然性，否认其社会性，只注重妇女的特殊性，忽视它作人类的共同性。另一种倾向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基础上的，以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以谋求妇女（实际上是有产阶级妇女）为某些实际权益为目的。本世纪初提出的女权主义和后来出现的新女权主义就是这种妇女理论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论男人和女人，都不单纯是生活在自

然界中，不单纯是自然的动物，不单纯具有自然的特性，强调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是社会的动物，具有社会性。妇女作人类的一部分，从妇女的自然性和一般社会性出发，各阶级的妇女有其共同性，但从她们的阶级性出发，各阶级的妇女又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奴隶主和地主家庭中的贵族夫人和奴婢，资本家公馆里的太太小姐和老妈子女佣，她们同为女人，但其阶级界线、地位和命运迥然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李大钊同志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这块沉睡的黑暗的土地上，在被封建主义思想深深禁锢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刚刚兴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最先吹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号角。他不仅著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观点，而且率先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妇女问题，特别是考察中国的妇女问题，创立了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基础。他在“五四”时期，写的《战后的妇女问题》（1919年2月）、《废娼问题》（1919年4月）、《妇女解放与Democracy》（1919年10月）、《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月）、《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现代女权运动》（1922年1月）等文章，就是代表作。

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李大钊同志阐述了“唯物史观的要旨”就在于：“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精神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①李大钊同志明确指出，必须用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意识、道德等等的历史变迁，考察妇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一切与妇女有关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上风俗习惯的演成，也与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物质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同样，“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甚至，“女子贞操问题也是随着物质变动而为变动”。②

李大钊同志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妇女的一切问题的变化的动因归结为社会的物质的经济的变动，这就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这就找到了一把钥匙，使历史上妇女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歪曲和谬误得以澄清，给妇女的彻底解放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顺便指出，李大钊同志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在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阐述道德的历史变迁的同时，还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道德的本质，认为道德这种社会本能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是动物界所同有的，是动物界的产物。对于这一不正确的观点，我们不应该苛求于作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钊同志的。

二、妇女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社会形态更迭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妇女作为社会中的人，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从根本上说也取于社会生产方式，取决于社会物质的经济状况的变动。但妇女作为人类的一个特殊部分，它和社会的关系，又有其与男子不同的特殊性。从社会生产来说，按照恩格斯的讲法，“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

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①恩格斯讲的这两种生产都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它们的有机的内在联系是不说自明的。其一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就其抽象性一般性来说，它应该由社会主体的人，包括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包括男人和女人共同来进行的。但就其现实性特殊性来说，它又可以由社会中某一部分成员，如在阶级社会中乃由被剥削的阶级成员来进行；它也可以由于特殊的自然分工，或主要由妇女来完成，或主要由男子来完成，至于第二种生产即“人类自身的生产”或“种的蕃衍”，也是由男女双方共同完成的，但由于妇女本身具有的自然特性，则是通过妇女才能完成。这样，在妇女身上既同男子一样负有两种生产的共同任务，又单独负有更多的人类自身生产的特殊任务。正因为如此，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既有与社会形态更迭相联系的和男子一样的共同的规律性，又有与妇女的自然性相联系的和男子不同的特殊规律性。

李大钊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了妇女社会地位的历史演变。他指出，在原始社会的游猎时代，狩猎和战争是当时的主要活动。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自然分工。男子专门承担了狩猎和战争的活动，而妇女由于自然的生理特性，此类活动终非妇女所宜。因为妇女具有生产人类自身的机能，哺儿育女的责任便自然落在妇女身上；同时在游牧住所附近从力采集、耕作和手工业等生产活动；还有，要承担做些烧煮缝纫等家务事情。因为哺育子女延续种族的责任重大，妇女从事的农作、采集、制陶等生产活动的效果比较稳定，而男子的狩猎的效

果相对没有保证，所以在当时，“妇女的地位比男子高，势力比男子大”，④掌握整个部落的支配大权，处于中心地位。李大钊讲的这种情况，就是以母亲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母系氏族。后来物质生产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发生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繁衍，财富的积累，农业生产占居主导地位，象农业生产活动就逐渐由男子专门去从事操作了，妇女在生产中退居于次要地位，只在家里从事生育子女烧煮缝纫的事情了。正是根据以上情况，李大钊同志认为这时“妇女的地位也就渐渐低下”，⑤男子成了社会中的中心人物。于是母系氏族制度就让位于父系氏族制度。

由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妇女被排斥在社会财富生产以外，被贬为男子的附属物，单纯作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存在。这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⑥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中，男女两性分工被固定化了，男子专事生产物质财富，参与社会公共活动；妇女专事生育子女和操持家务，被关闭在家庭之中。

原始氏族社会瓦解以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初期，社会生产力虽然在缓慢地发展着，但整个说来，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生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妇女的社会地位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在这里特别指出的，在社会成员中，除有男子和妇

女的自然的性的差别外，还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分野。这样，一般妇女要受男子的压迫和奴役，被剥削阶级的妇女却受着双重压迫，除受男子的压迫和奴役外，还受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奴役，劳动妇女被踩在社会的最低层，被视为最下贱的人。沦为奴婢，迫为娼妓，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汉字中，表示一些下贱的、丑恶的行为的字，很多都用“女”偏旁，如“奴”、“婢”、“奸”、“妾”、“妖”、“妒”、“嫉”等等。总之，妇女为不祥之物，是“祸水”。

自资本主义进入大机器工业时代，由于社会的物质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妇女的地位也开始有所变化。李大钊同志说：“到了现代工业时代，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家内手工渐渐不能支持，大规模的制成许多无产阶级，男子没有力量养恤妇女，只得从家庭里把他们解放出来，叫他们自由活动，自己谋生。一方面因为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为妇女添出了许多与他们相宜的职业，妇女的地位又渐渐提高了。”^⑦在这里，李大钊同志是从两个方面分析妇女地位变化的：首先，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看，由于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生产技术有了巨大进步，机器生产简化了劳动操作过程，许多劳动都可以由女工和童工来担任。“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⑧其次，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看，由于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贪得无厌的追求，用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压低工资等办法，加强对工人的敲骨吸髓的压榨，男子成年工人单靠自己一人劳动已无法养活全家人的生活，这就迫使他们不得

不把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抛到资本的扎格纳特车轮下，置于资本的直接支配和剥削之下。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经济条件下，妇女走出了家庭，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不再专门依靠丈夫过活，提高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本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由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男子（主要是男工）纷纷走上战场，妇女更加广泛地参加了工业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这就更加提高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就在上述社会经济条件下，女权运动、妇女解放就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了出来。

但是，在资本主义这个同样是剥削阶级的社会里，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劳动妇女的彻底解放是不可能的。李大钊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仅分析了历史上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而且科学地预示了妇女彻底解放的必然趋势。他指出：“将来资本主义必然崩坏。崩坏之后，经济上发生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变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⑩李大钊同志的这一论述指明，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崩溃之后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妇女才能真正取得与男子一样的平等地位，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从以上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李大钊同志用唯物史观考察妇女地位的历史演变，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历史上妇女地位的变化取决于物质和经济的变动，当代和今后妇女

地位的改变也取决于物质和经济的发展，妇女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一股由社会物质经济关系发展所决定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抗拒不了的。

三、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妇女才能彻底解放

自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直在探索妇女的权益和妇女的解放问题，并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一个课题。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了女权主义，兴起了女权运动。其核心内容是要求男女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平等，使妇女得以发展她们的个性，享受她们应有的权利。作为实践纲领，政治上，要求妇女有与男子一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参政，当议员，做官吏；劳动上，妇女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与男子同工同酬；法律上，妇女应具有法律的人格和民法上的完全职能；教育上，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道德上，男女的道德标准一致；等等。

李大钊同志肯定了当时在西方各国兴起的女权运动的进步意义。他说：“妇女屈服于男子‘力的法则’之下，历史已经很久，故凡妇女对于男子的‘力的法则’的反抗，都为女权运动，历史中包含甚多，名之曰‘革命’并不过分”。^⑩ 他并认为现代的女权运动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妇女解放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Democracy断不是真正的Democracy，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Democracy，必须要求妇女解放”。^⑪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肯定了作为女权运

动一种形式的妇女参政运动的进步性，认为这是有组织的妇女所提出的最急进的要求。李大钊同志也肯定了各国“妇女国民会议”、“妇女国际会议”、“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等女权运动组织的进步作用，因为它们有助于把妇女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但是，李大钊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鲜明地指出：“女权运动，仍是带着阶级的性质”。^②他用这一观点分析了当时的女权运动的源起说：“各国底的女权运动，都是发源于中流阶级”。^③他具体研究了当时女权运动提出的各种要求，认为那些要求“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人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无产阶级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④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现代女权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

李大钊同志分析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妇女参政运动与工人运动和劳动妇女运动的关系。他认为，女权运动和工人运动“纯是两事”，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目的是“想管理他人”即劳动人民；工人运动的目的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他特别强调说：“中产阶级妇女的利害，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⑤李大钊同志举例说，假定一个无产阶级的妇女因生活所迫卖淫被法院拘留，单靠捉她的女警官、审讯她的女法官和为她辩护的女律师，这个卖淫的无产阶级妇女的问题就能解决吗？这与男警官、男法官、男

· 律师处理这个案件有什么区别呢？即使女法官和男法官对这个案件的科刑轻重上可能有所不同，但这只是枝叶问题，并不能解决强制无产阶级妇女卖淫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他在《废娼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废娼的种种办法，但最后指出所有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⑧

但是，李大钊同志又认为现代的“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底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味，而且有互相辅助的必要。”^⑨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妇女和劳动阶级妇女这两个阶级的根本利益虽然有所不同，但由于历史造成的轻视妇女的传统，它们都同属妇女又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正如李大钊同志所说，如果多数劳动妇女尚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然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如若劳动妇女运动取得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得到提高。李大钊同志特地指出，在一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未剧烈展开的国家，中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和劳动妇女运动全无敌对的形迹；但在阶级斗争剧烈的国家，上述两种运动就决然分离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男工驱往战场，妇女顶替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战争结束后，男工返回乡土，要求妇女让出他原先赖以谋生而现在被妇女占领的地盘，而女工因生活维艰不愿把已经取得的新领土拱手让还男子。这种情况造成了男工和女工的矛盾。而且，男工因为受传统偏见的影响，也存在轻视妇女，轻视劳动妇女运动的倾向。李大钊同志针对以上情况，呼吁劳动男工运动和劳动妇女运动应以阶级利益为重，停止“互相敌对”，“应该有一

种阶级的自觉，（劳工妇女团体）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行动。”^⑩如男女工人之间发生争执，必为资本家所乘，结局对工人阶级不利；如果男女工人团结起来，就一定会加强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力量。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⑪恩格斯非常赞同傅立叶的下述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⑫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李大钊同志坚决主张实现男女之间的真正民主、平等、互相的关系，坚决主张妇女的彻底解放。他认为，社会上的一切阶级都可以变动，如若社会经过改造，地主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可以消泯。“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⑬而“一个公正的愉快的两性关系。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互相辅助的关系，不靠妇女的附属与男子的优越。男女各有各的特性，全为对等关系，全有相与补足的地方。”^⑭所以，结论是：“两性间的‘妇女解放运动，比什么都要紧’”。^⑮

李大钊同志认为，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解放的时代，也是妇女解放的时代。那么，妇女怎样才能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呢？列宁曾经说过，“妇女的真正自由，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有可能。”^⑯李大钊同志也认为，只有全社会妇女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妇女联合起来，同男工人们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实行共产主义才有可能。他写道：“我以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

入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②“妇女要想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③

李大钊同志热烈欢呼国际劳动妇女运动的兴起。他认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指定克拉拉·蔡特金为妇女共产党的国际书记并召开国际共产主义党劳工妇女会开辟了妇女运动的新纪元。^④李大钊同志热烈称颂苏俄在工农政权下妇女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他认为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里一位女子当了救济部总长，是妇女参政的新纪元。^⑤

四、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必须打破孔子主义

李大钊同志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上，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孔子主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大钊同志在对孔子主义进行全面批判中，无情抨击它的旧礼教、旧道德，它的轻贱妇女的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李大钊同志在1920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一文，用唯物史观进一步解释了经济变动和思想变动的辩证关系，矛头直接指向孔子主义。他指出，孔子主义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落后的农业组织和封建大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产生的，是这个经济基础的表层构造，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如今时代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发生变化，孔子主义再也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了。他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解放运动必须打破孔子主义。

李大钊同志指出，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

理，所谓纲常名教、道德、礼义，都是撰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至于夫妇关系，更是把女性完全浸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母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伊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李大钊同志深刻地揭示了孔子主义的要害。他说：“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事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例如，在夫妻关系中用“顺”、“从”、“贞节”这些字眼，“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⑧

李大钊同志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中国的农业经济因为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已经发生动摇，封建的大家族制度也面临崩颓粉碎的局面。这样，在落后农业经济和封建大家族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的旧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礼教、风俗的“全结晶体”的孔子主义跟着崩颓粉碎的命运是必然的了。因此，中国今日的社会解放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打破封建大家族制度，打破孔子主义。李大钊同志指出，这就“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也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⑨李大钊同志指出，就妇女问题而论，现在提出的“女子职业问题”、“女子参政问题”、“法律上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婚姻问题（包括自

由结婚、离婚、再嫁、一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恋爱、婚姻废止) ”等等，都是过去封建大家族制度和孔子主义统治下断断不许发生的问题，而现在断断不能不发生的问题。要解决中国妇女的这些问题，就不能不打破孔子主义的轻贱妇女的思想，就不能不批判封建的旧礼教旧道德。

五、中国妇女应该努力参加社会革命运动

李大钊同志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指出了妇女真正解放的道路，而且在革命实践中积极开展妇女运动。

李大钊同志认为，中国妇女要能得到解放，首先要在经济上自立；而要在经济上自立，就要有职业；而为了求职，就要受教育求知识。他甚至强调说：“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似乎比承认参政权还要紧。”他特地摘引Canon Gare如下痛言，奉告尚未获得解放而正在努力争取解放的中国今日的妇女界：“除非你得了知识，一切为正义公道的热情都归身有。你可以成为强有力与骚乱，你可以获得一时的胜利，你可以实行革命，但若把知识仍遗留于特权阶级的手中，你将仍旧被践踏于知识的脚下，因为知识永远战胜愚昧。”^②

李大钊更鼓励妇女走出家庭的小天地，摆脱资产阶级参政运动的影响，投身到人民群众的革命的洪流中去。他在“五四”时期赠女友弱男先生（即章士钊的夫人）的题词写道：

“暗沉沉的女界！
须君出来作个明星，贤妻良母主义么？
只能改造一个家庭。
妇女参政运动么？”

只能造就几个女英雄。

这都不是我所希望于君的。

我愿君努力作文化运动，

作支那的爱冷恺、与谢野晶子。”

题词中的“文化运动”，就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一部分急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发动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题词中的“爱冷恺”，其人情况不详，不知是否俄国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府中当救济部长的“郭冷若”？与谢野晶子（1878—1942）是日本著名女诗人，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曾因发表反战诗而被攻击为“乱臣贼子”。看来，李大钊同志当时是把这两位女士当做值得“支那”（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来看待的。

李大钊同志在“五四”运动中，在党成立以后开展起来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中，不仅注意发动和吸收妇女参加，而且亲自关心和直接领导了妇女运动。1919年，李大钊同志亲自参加受封建家庭压迫患病而死的北京女高师学生李超的追悼会，对反封建的妇女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五四”时期前后，李大钊同志亲自在北京大学、北京女高师等学校讲授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1922年，北京女高师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得到了李大钊同志的有力支持，并应邀到会发表演讲。1926年在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二一八”运动中，就有许多女学生参加，牺牲了的刘和珍、杨德群就是其中的英勇的觉醒了的妇女代表。在李大钊同志的培育下，不少妇女干部迅速成长，她们和男子一样投身于革命斗争。象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以及刘清扬、张秀岩等人，都曾受到李大钊同志的直接教诲。李

大钊同志教导她们认识妇女运动的重要性，不光要争女权，还要争人权，争工作的权利，指派她们到女学生中去，联系广大妇女，引导妇女关心政治斗争，要求她们注意把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北京区党委成立后，李大钊同志就亲自组织直接领导了1925年“三八”妇女节的纪念活动。在这一天，李大钊同志带领大女儿李星华亲赴设在中国大学礼堂的会场，向妇女们祝贺战斗的节日并发表了讲话。这一天，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庆祝自己节日和检阅自己力量的日子。

李大钊同志从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起，经过“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到他最后牺牲，在这十多年时间内，他的著述甚多，其中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也不少，思想尤为精辟，亲身教育和启迪妇女参加社会革命运动。他在创建中国妇女理论、开展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是我国和我党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妇女问题理论家。他的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只是个人初读李大钊同志几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的肤浅体会，一定不全，可能还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注：

①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35页。

②同上书，第139—143页。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④同上书，第140页。

⑤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40页。

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页。

⑦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40—141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3页。

⑨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42页。

⑩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5页。

⑪李大钊：《妇女解放与Democracy》，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页。

⑫李大钊：《战后的妇人问题》，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8页。

⑬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7页。

⑭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9页。

⑮同上书，第19页。

⑯李大钊：《废娼问题》，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49页。

⑰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97页。

⑱同上书，第97页。

①⑨《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12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71页。

②⑩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0页。

③⑪李大钊：《妇女解放与Democracy》，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7页。

④⑫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同上书第98页。

⑤⑬李大钊：《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同上书，第27页。

⑥⑭转引自蔡特金：《列宁印象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2版第75页。

⑦⑮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见《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9—20页。

⑧⑯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同上书，第95页。

⑨⑰参见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同上书95—96页。

⑩⑱参见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同上书第15页。

⑪⑲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同上书第149—150页。

⑫⑳同上书，第153页。

⑬㉑见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同上书第98页。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 奠基与李大钊

刘茂林

中国历史学发展到近代，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是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史学伴随着本阶级走上政治舞台而出现，为中国史学别开一生面。它在破除封建史学的“崇古”观念，扩大史学研究领域，注重史事真实，重视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订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把中国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它也如同资产阶级本身一样，在与封建史学的较量中，显得非常软弱和不彻底，而成为时代的匆匆过客。

第二次变革发生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必然结果。这一变革，使中国历史学真正步入了科学之林。七十多年来愈趋愈进。

本文试就这二次变革的奠基与李大钊等同志的作用，作一初步考察，以探其渊源，明其本末。

一、“五四”前没有产生科学的历史学

科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唯物史观和它的科学方法论为前提的。只有人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认识历史，才能促成中国史学的革命，因此，要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

义史学的产生，就必须首先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被人们接受的情况，从而考察它对人们历史意识所发生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最早介绍，开使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它是与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齐被传入中国的它曾和其他学说一起，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未登上政治舞台，还没有产生自己的政治代表和文化代表。当时能够出现的，只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接触或点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却不能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眼光加以吸收。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还格格不入，他们只能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眼光，选择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他们赞成共产主义理想，而不赞成实行共产主义的方法；或赞成革命，却又不主张阶级斗争；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等。孙中山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无疑地曾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变革学说的影响，如他曾表示“社会主义极思不能须臾忘者”。^①“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②但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毕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当时，还有人认为，《共产党宣言》“对史学发明之功甚巨”，曾主张“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③还有人认为，“今中国言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④但这只是一束微波，未能发生影响。梁启超是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最早者之一，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未采用唯物史观。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历

史著述中也没有唯物史观的痕迹。致于朱执信、江亢虎等人，他们虽一度赞成过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但他们既非历史家，也未提倡过用这些观点去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因此，可以认为，“五四”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影响甚微，更未对史学发生若何影响。这可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二十世纪初还在方兴未艾特别是当辛亥革命似乎已经取得成功的时候，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还被普遍当成治国良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只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遭到彻底失败，“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噩梦”，^⑤资产阶级的治国方案已证明其失效，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与十月革命的震撼，于是，“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⑥马克思主义才以不可阻遏之势，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人们的思想意识（包括历史意识）才起了极大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才开始了它的最初行程。

过去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们，总把自己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接受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称之为科学。其实，西方资产阶级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远比他们的自然科学领域落后。如果说他们的自然科学植根于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科学实验，而他们的社会科学则仍然遨遊于唯心主义的王国，它的进化史观，注重证据，考查史事真实与因果等等，固然比封建史学大进一步，但它仍然是资产阶级唯心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上，仍然归之于政治、思想、文化或英雄伟人的活动。它的方法论虽然曾对无产阶级历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毕竟还不能称之为科学。

二、科学历史意识的产生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七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有如风起云涌，成为中国思想界一股巨大潮流。从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任弼时等人，是这种传播的中坚力量，他们所主办的各种报刊，是这种传播的坚强阵地。其中尤以李大钊对奠定新史学之功甚巨。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斗争是烈激的。它曾遭到地主资产阶级本能的抵制。它们用中国的传统儒学，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英国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俄国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印度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主义，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主义，醒狮派的国家主义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之对抗。于是有了：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间的，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梁启超、张东荪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与黄凌霜、区声白、易家钺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间，对“人生观”论战、“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的批判；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间，与季戴陶主义，与曾琦、李璜、余家菊等国家主义派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且对人们历史意识的变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这种传播中为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

人们总是立足于现在，总结过去，以推测未来。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直接推动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人们又同时用此理论，检验过去，认识社会的来程，以求对现实斗

争和未来的去向作出合理的安排。于是，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们，就产生了对历史重新评价的要求，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这种新的意识的产生，显著地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是对唯心史观的批判，给社会发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李大钊叫它做“精神的文化之物质的说明”。^⑦也就是从社会存在上去说明社会意识。

二十年代，中国的传统的封建史学虽已一蹶不振，然而它仍企图捲土重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仍顽固地坚守着封建史学的破碎阵地，继续鼓吹封建道德。说什么，中国“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世界中之经验固皆导源于诸圣，即其生世以前，人类之经验，亦多籍诸圣的归宿”。说什么，生产力不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因”，最高动因“还在人的精神方面”，“精神是能决定经济现象的”，^⑧等等。资产阶级史学家，也竭力以唯心史观否认从经济上说明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可能。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只从人“心”出发来讲哲学。他把史学家分为“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愤世派”等等。在胡适的眼里，社会历史仍然是精神的产物，“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⑨梁启超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限制其中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社会。”“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⑩何炳松也说：“人

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演化之真因维何？即人类心理之动机是己。”^⑩杨鸿烈也认为：“历史上的现象”，“乃是全出于人类的意识”。^⑪朱谦之也曾主张：“历史之意义应该以新生机主义的生物学说为根据”，这就是人类的“本能”，“本能在人类历史中是头等重要的原动力”。“历史上的种种变动莫不是本能变动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本能支配历史行为。”^⑫所有这些文化史观、英雄史观、多元论、精神史观、新生机主义等等，都在思想舞台上与唯物史观进行了较量。

李大钊在正面介绍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唯心史观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指出：“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⑬他说：“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⑭唯物史观“则谓人类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条件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这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⑮瞿秋白在批判梁启超的唯心史观时指出，社会历史变迁的程序是：“一、生产力之状态；二、受此生产力规定的经济关系；三、生长

于此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直接受经济现象的规定，另部分受生长于经济现象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之社会心理——（社会的人之心理）；五、反映此等社会心理的种种性质之‘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家之理想）。”^⑭“若明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基础，……然而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⑮陈独秀在批判胡适、梁启超时也指出，唯物的历史观不是机械的，它和宿命论不同，“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本不否认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能和经济立在同等级位。”^⑯“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⑰李达在批评精神史观与生物史观时说：“组成社会之有意识的个人，与构成生物之无知觉之细胞大异。支配生物体之定律，不能适用于社会可知。”“心理之要素，完全随物质生活而变更”，心理“不能说明社会之本质。”“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出，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⑱这种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的認識，是“五四”后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普遍认识。这是人们社会历史

意识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主要标志。

其次，通过批判历史不可知论和历史循环论，促进了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了解，认识到人类社会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

二十年代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发展，曾达到了它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形成了它的黄金时代。然而，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却存在着一个主要缺陷。这就是，他们只能说明历史上个别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不能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且，他们还反对对历史作规律性的说明，宣扬历史的不可知论。胡适就认为，社会和历史（胡适叫做“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历史就像“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②梁启超也认为，历史“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因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③何炳松也认为，“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或欲以社会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似是，其理实非。”^④梁启超、何炳松等人，为了否认历史规律，还指出了另一条理由，即认为，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不同，同样的现象不会反复出现，只有一个个特殊的事情，没有共相，所以说不上有什么规律。梁启超说：“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天下无阿铸一型的史迹。……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

历史盖难言之矣。”^②何炳松则说：“夫人类之特异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无穷。故凡属前言往行，莫不此往彼来，新陈代谢。此历史上所不能有所谓定律也。盖定律以通概为本，通概以重复为基。已往人事，既无复现之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通概难施，何来定律乎？”^③这是新康德主义者法国哲学家李凯尔特和法国资产阶级史学家赛诺波等人的观点。胡适、梁启超等人有时也讲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但他们所说的“因果关系”，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只叙明诸事之前后相生，并依前后相生之理而编比之，即为已足。总期编中无孤立之事迹，各事有相互之关系，斯则可矣。”^④也即是表面现象上的，偶然性的联系。天大的事情，可以由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事促成；重大的因也可以毫无反响。这种因果关系是任意性的，不可捉摸的，毫无规律可寻。

李大钊等人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人类社会发展，也同自然界一样，是有一定规律的，这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并且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李大钊指出：“世界的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殊的理法。”在人类的历史上，原始社会后，“继之以奴隶制；奴隶制度，继之以农奴制；农奴制绝，最后又发生资本家工业上的榨取。……将来的社会，必定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命运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⑤瞿秋白也指出：人类历史进程有“共同的因果律”，虽然，“社会里与自然界同样是偶然的事居多。然而凡有‘偶然’之处，此‘偶然’本身永久被内部隐藏的公律所支配。”^⑥蔡和森

在一九二四年写成了一本《社会进化史》，将“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家族之起源与进化”、“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进行了规律性的阐述，说明人类社会经过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他指出：“当氏族制度、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成为人类生产力发展之障碍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临终的时候；这种时候又轮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大生产，不仅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且为他自己养成了最大多数的掘墓人——近世无产阶级。”一九二六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问世。书中以大量篇幅阐述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指出了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四种社会形态，现正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这是“历史所诏示吾人者”，“是亦社会进化所必经之途径欤！”此外，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人所写的《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社会主义大纲》、《帝国主义概论》等等，都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学说。他们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介绍与论述，冲破了历史循环论和历史不可知论的迷雾，不仅为革命者树立了坚定了信念，也为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指明了方向。

第三，阶级斗争学说的介绍和研究，不仅使中国民主革命找到了新的力量，它在史学上也冲破了地主资产阶级循环论和进化论的束缚，形成了用阶级斗争和革命变革的眼光去观察历史的新思想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新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把阶级斗争与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把阶级的产生、发展和灭

亡的规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重要方面揭示了出来。说明了它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李大钊曾形象的说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各个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的一条金线”。^⑳

胡适以“一点一滴的改良”来反对革命，以“生存竞争”、“阶级互助”来反对阶级斗争。他说，阶级斗争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养成阶级的仇视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可以互助的两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经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㉑他认为人类历史都是“一点一滴进化”而来的，如果有斗争，那也只是一种“生存竞争”，也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他所谓的个人“不朽论”，表面上似乎在讲每个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实质上他是在宣传个人主义的历史观。他说，个人“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善亦不朽，恶亦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㉒这种夸大个人作用的概念，仍然是抹杀阶级斗争、否认人民群众作用的英雄史观的翻版。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认为，社会历史的“突变”，不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引起，也不是由体现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所推动，而是由于人们心理的变化。他说：“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如果传统的权威较脆弱，社会的物质供应缺乏，则社会的突变的可能性就较大。他又把这种突变归因于个别的伟大人物，他说：

“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

帝，……其局面当如何？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顛、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如何”？他称此等人为“历史的人格者”，是历史的“主动”。③

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的争论，贯穿了整个这一时期。其中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要不要阶级斗争，要不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旧制度，进行社会变革，促进社会发展，以及依靠什么力量进行这种变革，在这一系列的论争中，李大钊等人写出了大量的阐述阶级斗争学说的文章，他们反复宣传了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李大钊说：“有许多人听见这阶级竞争说，很觉可怕，以为人类的生活，若是长此争夺强掠残杀，必没有光明的希望”。其实“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他指出：“自太古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凡过去的历史社会的经济构造，都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矛盾斗争的反映，是改造社会的“手段”。④李达指出：“阶级斗争又为变革社会之唯一动力”，“社会组织之改造，不能不惜阶级斗争之形式以行之”。“无对立斯无进步”，这是“支配过去文明社会之法，而现存之生产力，亦即所以借阶级对立之基础发达而来也。”⑤毛泽东同志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

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②肖楚女指出：“伟大的阶级斗争，……是产生正义的催生妇。”^③

他们还进一步阐明了人民群众在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批判了“英雄”、“伟人”史观。李大钊指出：“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为所造。”^④“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绝不是几个伟人。”^⑤“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构造的唯一的基礎。”^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的高度评价，是马克思主义对待群众运动的根本思想。这一观点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又一分水岭。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学说，在二十年代虽然还未能深入研究，但已无疑地改变着人们的历史观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于史学变革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唯物史观所促成的科学历史意识的产生，提供了中国史学改造的前提，虽然它本身还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

三、中国史学理论的最初形成

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还表现在直接促成了无产阶级史学理论的最初形成。一九二五年前，李大钊在北京几所高等院校的讲坛上，先后讲授了“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并陆续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时》、《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与哲学》、《演化与进步》，以及《史

学要论》等著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旧史学“改作”、“重作”的主张。此外，李达、蔡和森、恽代英、陈独秀等人也都提出了如何研究历史的意见。这些主张，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李大钊指出，在旧的历史著作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自己。这种历史全把人们的个性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而已。”^①二十四史等典籍，“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它们“是这活历史的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身。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这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凡是社会生活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历史是互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他们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②历史研究的对象“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它“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③李大钊还进一步提出：“今日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似为国民生存的经历”，“团体的生活”，而不是“个人的生活”。不要迷信“英雄、伟人、圣人、王者，说历史是他们造的，寻历史变动的原因于一二个人的生活经历，说他们的思想与事业有旋转乾坤的伟力”。^④这里，李大钊虽然还没有用“人民群众的历史”，或“生产者的历

史”这样的名词，但这种思想是十分清楚的。这种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中心，以社会生活、社会变革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思想，是非常杰出的。它与旧史学以历代政治沿革为对象，将历史看成“帝王贵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英雄伟人的传记，或把史料作为历史研究对象，主张“史料即史学”，等等主张，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

关于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旧史家是为统治者“资治”、“求鉴”而治史，或为了逃避现实“为考据而考据”，“为历史而历史”。他们有时也说历史研究要求“真理”。但他们所说的“真理”，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一种“人造的”有用的“价值”。胡适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们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④这就是胡适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李大钊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真理观和反动的目的论。李大钊说，史学的要义有三：一、对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考察；二、寻究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三、“于全般（盘）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他又说：“世界的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历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⑤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理法”，很明显是指历史发展规律。他的三条要义是互相连接、层层深入的，最主要的是要寻求历史的发展规律。正如瞿秋白所说：“历史现象的研究应当更深一层。英雄伟人以至于群众

的动机，不论是显而易见的，或是隐匿难见的，都不是历史现象的最后原因，最后原因却是造成这种动机的现实力量。”历史进程有“共同的因果律”，“科学的职（责）任便在于发见这些公律。”^⑦

寻求历史发展规律还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李大钊指出，它的最终目的是要：第一、研究过去，是为的“寻出一种新世界”，促进人们“合理的生活”。“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未来的新世界，是真的，实的，脚踏实地可以达到的。”它像“人生世界上建起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人们若将这

“所陈列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从而了解，“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就是历史学应给人们的“科学的态度”。^⑧第二，史学应给人们一种“脚踏实地”、“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要使大家知道，这“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

“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失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要使大家知道，“社会生活的创造，不在天神，不在圣哲”，“乃在社会生存的本身”，是“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第三，历史学要使人民觉悟到自身力量的伟大，激发起“感奋兴起”，“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有一种“舜人亦人”，“有为者亦若是”的精神。^⑨

李大钊等关于历史学的任务与目的的思想，与梁启超、

胡适等人所说的“因果律”划清了界限，同时也澄清了他们所提倡的追求知识、为历史而历史所造成的迷雾。

关于研究历史应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梁启超提倡“不宜预先存一先入为主的历史观”，主张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在方法上要采取叙录、考证、说明、推论等几个步骤，最后使千差万别的史实“凑筭”成为“结构精悍”之历史。^⑧胡适则提倡庸俗进化的“历史的态度”和“实验主义”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所谓“科学方法”。

李大钊指出，“纯客观”是没有的，无论何人，总于不知不觉之中，有他的历史观在那里存在。”而且，“史实纷纭，浩如烟海，治史者不有一个合理的历史观供其依据，那真是一部十七史，将从何说起？必且治丝益棼，茫无头绪。”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观乃解析历史的公分母，其于认识事实的价值，寻译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实为必要的主要的要因。”^⑨要什么样的历史观？李大钊说：“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它们是不能说明历史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⑩“为史学开一新纪元”。^⑪

李大钊等人还认为，研究历史也必须采取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方法，即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一般规律的原理，去研究各部门、各阶段历史的特殊规律；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原理，去说明思想、文化、道德等的变动；以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原理，去分析历史的治乱与学术思想的变迁。李大钊还具体地用此方法说明历史上经济基础变

动与道德变动的关系，说明原始时代文字书契是物质的反映，说明近代经济的变化如何促成思想上的变动与现代革命的兴起，等等。尽管当时运用这种方法还不熟练，解释还不准确，但它对旧史学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关于如何看待过去的历史著作，李大钊指出了史学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和知识不断地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④“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和改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⑤

“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⑥李大钊这出针对旧史学“改作”和“重作”的主张，是新的史学革命的先声，是中国无产阶级史学诞生的号角。

这样，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历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目的，到历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然而系统的思想，标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为新史学的诞生铺下了基石。

四、对历史的初步考察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酝酿，还突出地表现在接受了唯物史观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进行了初步考察，写出了一批介绍兼研究性的著作。李大钊写了《史学思想史》、《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五一’运动史》、《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主义的反映》、《胶济铁路史》、《工人国际略史》、《土地与农民》等；蔡和森写了《社会进化史》、《义和团与中国革命》；李达写了《第三国党（即第三国际——笔者）大会缘

起》、《介绍几个女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传》、《女权运动史》等；蒋光赤（慈）写了《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基本上摆脱了旧史观的束缚，运用唯物史观介绍与解释了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这是对旧的历史“改作”和“重作”的新尝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准备进入实际研究的一个重要步骤。

但是，总观全体，这些著作带有明显的过渡性：一、大部分还是一些历史介绍性的东西，还未给予科学的研究与分析；二、一些著述是借历史的一些史实解释唯物史观，而不是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历史；三、大都为了论证现实革命而回顾历史，借历史作革命宣传，基本上还是政治性的文章；四、少数带有研究性的著作，也才开始作尝试性的探索。这些情况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正处于萌芽阶段，恰象拂晓的天际出现了朝霞。

此外，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没有自己的队伍，没有形成独立的力量。主要是政治活动家们在革命斗争中对历史学提出的新要求，从而承担了新史学的奠基工作。他们也无暇集中精力于史学，并从事研究。等到大革命失败后，才有一部分经过革命洗礼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逼退于文化战线，开始认真地对社会历史加以研究。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他们在前一时期准备的基础上，冲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已经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回顾当年的发轫，我们不由得不对中国无产阶级史学的先行者们——李大钊等同志，缅怀思念之情。

注：

①孙中山：《复某友人函》，《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

②《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③申叔（刘师培）：《〔共产党宣言〕译序》，《天义报》15号。

④海因秃曼：《社会主义经济论》首章译者识语，《天义》第16—19册，1908年春。

⑤⑥瞿秋白：《饿乡纪程》四。

⑦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

⑧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⑨胡适：《答陈独秀先生》，《胡适文存》二卷二集，1923年11月29日。

⑩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16页。

⑪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11、13页。

⑫杨鸿烈：《史地新论》晨报社丛书第20种，1924年7月。

⑬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书局1926年初版。

⑭⑮李大钊：《史观》，《史学思想史讲义》转引自《李大钊选集》291页，294页。

⑯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选集》335、337页。

⑰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二期，1923年12月30日。

⑱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一期，1923年6月15日。

⑲陈独秀：《答张君勱及梁任公》，《新青年》季刊三期，1924年8月1日。

⑳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载《科学与人生观》1923年11月13日。

㉑李达：《现代社会学》第三章《两种对立的社会说》，《李达文集》第一卷238~243页。

㉒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1集卷2，106页。

㉓㉔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11、114页。

㉕㉖㉗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

㉘李大钊：《桑西门的历史观》，《李大钊选集》465、474页。

㉙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2期，1923年12月30日。

㉚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

㉛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1集卷2。

㉜胡适：《不朽》，《胡适文存》1集卷4。

㉝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16、113页。

㉞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李大钊选集》223页。

㉟李达：《现代社会学》，《李达文集》1卷276~

277页。

⑳毛泽东：《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
转引自《新民学会资料》149页。

㉑肖楚女：《反抗五卅惨案中所见的阶级斗争》，《中国青年》86期，1925年8月1日。

㉒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选集》。

㉓李大钊：《孔道西的历史观》，《守常文集》1949年版45页。

㉔李守常：《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晨报》1920年8月17日。

㉕李大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选集》507页。

㉖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㉗㉘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选集》

㉙㉚㉛㉜㉝㉞

㉟李守常：《史学要论》1924年商务印书馆版

㊱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1集2卷101页

㊲同㊱

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32页。

㊴㊵李大钊：《史观》，《李大钊选集》。

㊶李大钊：《史学思想史讲义》，《李大钊选集》。

试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刘庆福

近几年来，报刊上发表的研究李大钊同志文艺思想的文章，大都论述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肯定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但是，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只肯定李大钊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因素，而不认为他具有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文艺主张。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七辑上，朱德发同志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商兑》一文中的下述观点是有代表性的。朱文说：

“《什么是新文学》对文学革命提出一些重要见解，并且含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但从全文的总体来看，我认为不能说它全是无产阶级文艺观，也就是说基本上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主张。”

朱文虽然说的是《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但据我们所知，这篇文章是李大钊生前所发表的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所写的唯一一篇专谈文学问题的文章，文中有他对新文学发表的一些重要看法。如果这一篇文章尚且只是“含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而“基本上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主张”，那么，李大钊是否有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是否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岂不是成了问题了吗？在我看来，这种看法，

和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及他的整个文艺思想实际是不相符合的，很值得研究。

众所周知，李大钊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以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观察和研究中国的革命问题，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虽然不是专门的文艺家，但他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中，却始终关注着文学艺术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门。他不仅自己写过不少诗歌、散文和文艺性杂感等，还在许多文章中论述到文学艺术问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介绍唯物史观，指明文艺 的上层建筑性质

李大钊早年在《文豪》、《厌世心与自觉心》、《“晨钟”之使命》、《美与高》、《新的！旧的！》等文中，发表了对文艺问题的一些看法，指出“文学本质，在写现代生活之思想”，它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应该表达积极向上的思想，唤起人们的自觉心，“救人救世”。他极力反对增加人的愁哀，“躯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的颓废厌世、柔靡艳丽的文学。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他盼望我国青年能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学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担负起创造“青春中华”的使命。这些文艺观点无疑是进步的，但是比较空泛。此外，那时的文章中，也还常常流露出某些唯心主义观点，比如他说文豪有“洒一滴墨，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的“本领”，就不适当地夸大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带有精神主宰世界的痕

迹。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李大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九一八年下半年起，他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一些震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名文，标志着他基本上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初步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后在革命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战士。随着他的世界观的转变，他的文艺观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大钊文艺观的显著变化，是从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的。他在介绍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指出了文学艺术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九一九年，李大钊在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时候，从日文转译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批评”序文》（现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唯物史观的著名段落。从《哲学的贫困》中摘译的是，马克思论述人类随着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变化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创造相应的思想意识的段落；《共产党宣言》中摘译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概述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的发展，论述人们的意识随着社会的存在，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变化而变化的部分；《“经济学批评”序文》中摘译的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所作的经典概括的全文。这几部分译文，为我国读者第一次提供了从马克思的论述中直接了解唯物史观的便利。

从李大钊的上述译文和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后来所写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中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人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是社会上层建筑之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观点。关于前者，李大钊说：“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础（Basis）与上层（Uberbau）。基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①关于后者，李大钊说：“文化是以经济作基础，他（指马克思——引者注）说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②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阐明了文学艺术的上层建筑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和理解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观点，它科学地说明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等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赖以建树和发展的根基。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把它作为唯物史观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为中国革命的文学艺术家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建和发展铺下了最初的基石。

二、《什么是新文学》，

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什么是新文学》，是李大钊同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专论五四时期新文学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由于写得

简短概括，个别用语不甚精当，因此，大家对它的涵义理解不同，评价很不一致。我不同意前述朱文看法，他说该文“基本上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主张”，而我却认为，它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体现的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主要理由是：

（一）文章提出了新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社会”而不是为“个人造名”。

李大钊对新文学的要求，首先就是“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③。这里除了“写实”的要求以外，主要谈的是新文学创作的目的，他提出文学“为社会”的主张。联系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社会观，所谓“为社会”，虽然说的比较笼统，但绝不是为维护五四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旧社会服务，而是为劳工社会服务，为反对旧社会，实现赤旗飘扬的新社会的革命斗争服务，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从他“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的对比提法来看，“为社会”还包含有为集体为群众的意思。“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很明显，就是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把文学当作获取个人名利的工具。由此看来，学术界那种认为李大钊提出的“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和陈独秀一九一七年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的，以欧洲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为榜样的“写实文学”，一脉相承而无实质突破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实质的突破就在于，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文学创作目的的看法。他的这个看法，涉及到文学为什么服务或者说为谁服务的问题。尽管他从正面说的很不具体，但在我国新文学的开创时期，能够提出这个带方向性的问题，确实对新文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文章提出了新文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根基，要清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毒素。

什么是新文学？这是文学革命深入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形式主义地看待新文学，认为新文学就是“国语的文学”，白话的文学。李大钊在回答什么是新文学的时候，首先就否定了这种观点，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李大钊认为决定新文学的东西不是形式而是思想内容。新文学最根本的是要以作家新的革命思想作基础，表现出新的革命思想来。因此，他提出新文学应“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并用生动的比喻指出：“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它们。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④其中，“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博爱的精神”或者说“博爱心”，就是李大钊提出的新的革命思想，它们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具体说明。不过，联系李大钊当时的思想主张，还是不难理解的。所谓“宏深的思想、学理”，指的是精深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坚信的主义”，指的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博爱的精神”或“博爱心”，沿用的是人道主义的词语，但这里不同于一般人道主义的涵义，因为李大钊讲博爱，同时也主张消灭剥削，反抗压迫，实现社会主义，所以说他说的“博爱精神”或“博爱心”，主要指的是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热爱。有人说，上述这种理解太简单化

了，理由是，当时李大钊的思想还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思想中还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等因素，所以说他说的“思想”、“学理”、“主义”，应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思潮。我认为这种意见，对李大钊当时的思想状况的分析不无根据，但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一九一九年底，李大钊虽然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还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杂质，但是，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他的主导思想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既然如此，就不好把他所说的“思想”、“学理”、“主义”，看作是各种新思潮的综合，而看不到它的主导方面，它的实质。总起来说，李大钊所说的作家创作的思想根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无产阶级热爱人民的感情。有这个根基，新文学就会“长得美茂”，没有这个根基，新文学就会衰落、枯萎。

李大钊不仅正面提出了对新文学作家的思想修养的要求，而且，还严肃地批评了那时一般流行文学在思想感情方面表现出来的缺点。这些缺点最突出的是，“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在作品中必然会反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所谓“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毒素。这种毒素必须清除，否则就会给新文学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

李大钊的上述意见，无论正面论述，还是反面批评，都是从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作家的思想修养提出问题的，这实际上已经论及到作家的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影响。而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原则问题。

作家的世界观是重要的。但是，世界观并不等于创作，只有正确的世界观，还不能创作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李大钊同志熟悉创作，有亲身经验，深知文学创作的规律，他在提出“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和“博爱的精神”作为创作根基的同时，还提出要有“优美的文艺”作根基，要求作家从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中吸收养料，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以便创作出既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又有完美的艺术形式，内容形式统一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来。

《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受历史的局限，没有论述更多的问题，论述到的问题也没有具体的阐述，还有个别问题提法不够妥当。虽有这些不足之处。但是，它毕竟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解决新文学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建时期的文献之一，也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指导我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具体表现。由于它发表在一个偏远地区的刊物——四川成都的《星期日报》上面，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影响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它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却不应因此而低估。

三、文学要“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

李大钊在革命活动中始终关注着文学问题，把指导文学革命当作指导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一九一九年底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之后，一九二三年，他又在《百科小丛书》之一的《平民主义》中，对作为时代潮流的“平民主义”进行论述时，也对文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

“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

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那就是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他在现在的世界中，是时代的精神，是唯一的权威者，和中世纪罗马教在那时的欧洲一样。今人对于‘平民主义’的信仰，亦犹中世欧人对于宗教的信仰。无论他是帝王，是教主，是贵族，是军阀，是地主，是资本家，只要阻碍了他的进路，他必把他们一扫而空之。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到群众的讴歌。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⑤

李大钊把“平民主义”（亦译“民主主义”）看作是“时代的精神”，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文学也不例外。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文学必须在平民主义旗帜的引导下前进，努力体现平民主义精神，为实现平民主义的社会理想而奋斗。

李大钊心目中的平民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他主张的平民主义，是反对一切特权阶级的平民主义，“无论他是

帝王，是教主，是贵族，是军阀，是地主，是资本家，只要阻碍了他的进路，他必把他们一扫而空之。”他认为“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妇女对于男子要求解放”等，“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⑥他说劳农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实行的“工人政治”，“在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而且是高度的平民主义，如列宁所说，是和“中产阶级的‘平民主义’”有原则区别的“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⑦由此可见，他主张的平民主义，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即我们后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象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据此，我们可以了解，李大钊所说的文学要“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就是要求文学导以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导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旗帜，努力表现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表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具有时代精神，才能表达出人民的要求愿望，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因此，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得到广泛的传播，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完成新文学时代的使命。

四、利用通俗文学对劳动人民 进行革命教育

平民主义或言民主主义，是时代的潮流，是支配一切的东西，这是李大钊对时代的一贯认识。一九一九年二月，他在《晨报》上发表《劳动教育问题》那篇短文时，就表述了类似在《平民主义》中的见解。那时他强调的重点是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学上的平等权利。他说：“Democracy（当时译作“平民主义”或“民主主义”——引者注）的精

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④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主张：

“现代的著作不许拿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须用通俗的文学，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道理。”^⑤

这一主张在文学理论上的意义，不仅在于反对当时所指的内容陈腐，形式僵化的“古典文学”，提倡“通俗文学”，更重要的是，他主张打破千百年来少数人享受文学的特权，少数人对文学的独占，公开地为劳动人民争取文学权利，要求用劳动人民易于接受的通俗文学，向他们普及知识，传播革命道理。这也可以看作是文学为劳动人民服务，文学大众化思想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初表述。

李大钊同志很重视通俗文艺的宣传作用，他曾多次向做农村工作的同志提出利用通俗文艺向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建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九二六年二月，他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谈到利用农闲时间向农民进行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教育宣传的时候，他说：“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⑥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中，为破除农民对“真主”的迷信，使他们懂得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有好日子过的道理，他说，“‘从来没有什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类的歌声，应该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⑦。为做好包括文艺在内的革命宣传工作，他在《青年与农村》中还深刻地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

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希望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俄国的文人志士，克服种种困难，到乡间去做社会主义宣传的革命精神，刻不容缓地到农村去，加入到农民的组织 and 斗争行列中去。李大钊这种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思想，对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文学、新文艺，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五、社会主义社会“要注意 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李大钊同志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成立会上发表讲话，就社会上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某些疑问，进行了解释。后来这个讲话的内容，以《社会主义释疑》为题，发表在同年十一月三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在这次讲话中，李大钊同志对一些艺术家怀疑社会主义社会艺术发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说：

“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表现纯正的美呢？那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②

李大钊同志这段话，表述了精辟的文艺理论见解，重要的有这样几点：（一）“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指出了艺术创作的重要特点和规

律。艺术是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是精致的精神产品，艺术要以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感染人，必须有“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的确艺术“最忌的是平凡”，平凡和艺术的特性是不相容的。（二）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污染艺术家的灵魂，限制艺术创作的自由，不利于创作“纯正的美”的艺术品，阻碍艺术的发展。这个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解决，要发表艺术美，繁荣艺术，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的这一论述，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④的著名论断，他的看法和马克思的观点是相似的。（三）社会主义社会有利于艺术家发表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能为艺术的发表开辟广阔的前景，但是，必须认识艺术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并自觉地按照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去做，才能促进艺术的繁荣发展。李大钊同志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天才预见。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三十五年来曲折发展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已经充分证实了他的预见的科学性。什么时候我们尊重艺术规律，给作家自由创作的权利，为作家提供艺术个性发展的机会，文艺创作就繁荣；反之，什么时候我们忽视艺术规律，侵犯作家自由创作的权利，不为作家提供艺术个性发展的机会，文艺创作就受到阻碍。今天，在和艺术上“左”的干扰作了长期斗争之后，我们对它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李大钊同志这个意见，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李大钊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除了上面谈到的以

外，比较重要的还有他在生前未曾发表过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俄国文学的时候，对俄国文学发表的一些评价和见解，其中有些看法，有普遍的理论意义。比如他说俄国文学“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俄国社会视文学“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吾人实未见其他国家尚有以诗歌为社会的，政治的幸福之利器，至于若此之程度者。”^⑭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作用，革命作用，是大有益处的。此外，一九二二和一九二三年，他还在《今与古》（其一、其二）两篇文章中，回顾了欧洲十七世纪以来“崇今派”战胜“怀古派”的“荣誉史”，分析了人们产生怀古思想的原因，正确评价了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认为“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的艺术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创造的，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我们凭我们的天才创造的艺术，古人也不见得能赶上。”^⑮他既肯定了古代的艺术，更重视现代艺术的创造。他以科学的历史观，既批判了复古主义，也否定了虚无主义，主张“讴歌现代，颂祷今人”，尽我们“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⑯他的这些辩证的论述，对我们正确看待文学艺术遗产，正确处理继承遗产和革新创造的关系，也是很有启发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同志从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指导我国革命实践的活动中，对文学艺术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见解，提出了一些带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建铺下了最初的基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在我国早期奠基人之一，他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虽然总的说来，他的文艺理论观点只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萌芽阶段的产物，有着明显的不够精确和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和开拓者，他的贡献早，而且和我国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人的文艺理论观点相比，他的贡献也比较大。那种认为李大钊同志只是提出了某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因素的文艺观点，基本上没有提出无产阶级艺文主张的看法，显然是不大符合实际的。

以上意见不当之处，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八月

注：

①《李大钊选集》第293页

②同上 第480页

③《李大钊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
第240页

④同上 第240—241页

⑤《李大钊选集》第407页

⑥同上 第415页

⑦同上 第426页

⑧同上 第139页

⑨同上 第139页

⑩同上 第535页

⑪同上 第567页

⑫《李大钊诗文选集》第2版第322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296页

⑭《李大钊诗文选集》第2版第125页；第126页

⑮同上 第151页

⑯同上 第303页

李大钊图书馆学思想研究 ——纪念李大钊诞生九十五周年

陶秉福

李大钊从1918年1月至1922年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部主任共有五年^①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对如何办好图书馆，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主张，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所以，研究他的图书馆学的思想，对于改进我国图书馆的工作，开发图书情报资源，为四化建设服务，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下面分五个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努力从事图书馆事业的改革。

马克思说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李大钊从事图书馆工作，首先运用辩证法，着眼于改革。对此刘复曾做过如下的描述：“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自从做了图书馆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很刻苦的想法改良；而且曾经开过几次会议，请校内诸位注意收藏事业的教员，帮同他设法改良”。^③

李大钊接任后两个月。于三月十五日便带领几个图书馆

职员到清华大学参观，重点是学习办图书馆的经验，此后又从事国外图书馆发展史的研究。对美国十七个图书馆的概况做了考察，突出的研究了他们重视图书馆员训练的工作。他从古到今，由国内到国外，对图书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提出了一些重大改革的意见和设想。从而明确了办馆的方向。

第一，区别古代藏书楼和现代图书馆的不同性质和任务。他在《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的演说词》（以下简称《二周年纪念会的演说词》）中指出：“古代的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根据李大钊的这一思想，作为现代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要掌握三套本领，一套是图书馆专业，如分编、出纳等技术和知识；另一套是某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第三套就是联系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本领。只有具备了上述三套本领的工作人员，才能做到善于接近群众，善于进行群众工作，善于了解他们的要求，善于把他们的兴趣纳入一定的轨道，启发读者的自学精神。在读者中间进行巨大的指导工作。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中级图书馆员应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丰富的知识，并在政治上受过一定锻炼，有一定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只有当图书馆专业人员具备了上述水平的时候，才能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避免把图书馆办成脱离群众的“衙门”式的官僚机构。

用上述标准来衡量我国图书馆的现状，还存在着以下两

个问题：（1）人员不足，素质偏低；（2）单纯藏书、出纳工作做得多，主动发挥教育和研究性质的作用少。

第二、要把图书馆办成一个带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机构。他提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④这种主张和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列宁曾经把图书馆事业办得怎样作为断定一国文化水平高低的标志。列宁在一封家信中写道：“在巴黎作研究工作是不方便的，国立图书馆办得很坏，我们时常回忆起日内瓦，那里的图书馆很方便，便于做研究工作。”列宁非常赞美瑞士的文化，并想到革命以后俄国的图书馆事业要做怎样的安排。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立即，并且反复多次地发出改革图书馆的指令，其中多次提到要采用瑞士和美国的图书管理制度。由于列宁对图书馆工作的重视，使得苏联图书馆事业发展得很快，以致后来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美国。

至于把图书馆办成研究室。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把图书馆办成读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本身从事图书情报的研究工作。李大钊提出将各种杂志中的重要论文分门别类的编成卡片式的目录，以供研究某种问题时，依类检集材料之用，并举例说明：“闻日人在中国所设之东亚同文学院即用此法蒐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之材料，日刊新闻则剪裁之所得，因甚丰富，《支那调查报告书》、《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等，皆其成绩也。”^⑤这个例子，既说明了图书情报研究工作的重要，同时，也指明了做图书情报研究工作的方向和方法。

第三、一切从方便读者出发。这也是李大钊办馆的指导思想之一。早在1917年11月列宁在《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图书馆阅览室，应当象文明国家为有钱人服务的私立的图书馆和阅览室那样，每天从早8点开放到晚11点，节日和星期日也不例外。”

工作人员不足怎么办？列宁指出：“应当迅速从国民教育部各部门中把必需数量的职员调到公共图书馆去。”^⑤

李大钊本着列宁的这一思想，在北大图书馆从马神庙旧址迁往沙滩红楼新校址期间，为使北大师生们能够不间断地借到书，决定“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间仍在旧舍开馆。”^⑦在暑假期间也尽量方便读者安排开馆时间。“近日暑气渐退，本校为便利阅者起见，自八月二十三日起除上午七至十时开馆外，下午二时至五时一并开馆。”^⑧

第四、实行开架式书库。他在《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词》中提出，旧图书馆采文库式，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阅读的人不能亲自拿书，只能在目录里查出书名填在单子上叫管理员拿来。若是拿的不合用，又要按以前的手续去换。现在欧美各国为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所以主张开架式。但是开架式有一层弊处，就是损失较多；不过这是少数金钱的损失算不得什么，据美国的统计，开架式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英国有安全开架式，比较稍好一点。

对李大钊上述这段话，要作正确地理解，一方面要变文库（即闭架式书库）为开架式书库，这是图书馆管理制度发展的一种趋势，它的好处很多，可以方便读者查找所需要阅读的书籍，可以减少借书的手续，节省读者借书的时间，这

是应该坚持和加以推广的。另一方面，它也存在着弊处，就是损失较多。这是应该制定规章制度，采取措施，加以防止的。绝不能因为李大钊讲过“不过这是少数金钱的损失算不得什么，据美国统计，开架式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这句话，就放松对开架书库或阅览室开架图书的管理。问题是既要方便读者，又要保管好图书，这才是对李大钊主张实行开架式思想的全面、正确地理解。

二、把图书馆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者的基地。

李大钊接任图书馆部主任之职，其中首要的目的在于以图书馆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李大钊积极参加或组织以群众团体名义的革命组织。

1918年冬，，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当时所以不用马克思的名字，为的是要迷惑警察的耳目。反动警察当局一听马尔格斯便与马尔萨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大家逐渐搜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籍书，又筹集资金购买书籍，设立了一个附属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斋或“亢慕”，对外发出公告、资料都是用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生办公室，党支部

与青年团和其它一些革命团体也常在这里集会活动。1922年2月17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招收会员，19日该会举办讲演会，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此外，于1919年1月，他还参加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并被推选起草组织大纲，又参加筹备“学生游艺大会”，同时，担任“学余俱乐部”的发起人，李大钊通过这些组织形式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开展了革命活动。

第二、积极参加一些杂志社的组织和撰稿活动。李大钊对《国民杂志社》的成立和刊物的出版曾经给予积极的帮助。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国民》杂志开始刊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具体指导下，《晨报》付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新潮》是北京大学学生办的刊物，李大钊担任了新潮社的顾问，同时又在图书馆拨了一间房子给新潮社使用。他和鲁迅都为《新潮》撰过稿。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李大钊为主要创办人之一。

1919年5月，李大钊担任《新青年》的责任编辑，组织了一期“马克思研究”专号。

第三、热情诚挚地帮助青年学生提高马克思主义的觉悟。对此，当时北大的一位青年学生有过如下一段的回忆，

“我认识守常同志是在1920年春天，……我受了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一次到图书馆找守常同志谈话，请他介绍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我谈了不少学术与思想方面的问题。谈完话，他从桌旁一个堆满书刊的书架上，拿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文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给我，要我看完提出意见，又给我几本河上肇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一本英译的列宁写的小册子。他送我出图书馆时还说，‘这本英译的小册子你看完后交还给我，不要转借他人。’因为那时谁保存列宁的著作，谁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嫌疑。第一次和守常同志见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确是热爱青年，特别是热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同那时北大的一些所谓名流学者相较，截然不同。”^⑩

三、图书馆工作者应是具有广博学识的人。

要把图书馆办成带有教育性、研究性、学术性的服务机构，就要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首先得是个学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否则，就做不好图书馆的工作。

第一，兼做教学工作。李大钊在担任图书馆部主任期间，除做好图书馆部主任工作以外，当时还担任了繁重的教学任务。1920年7月他被聘为教授，他先在北大史学系开设“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又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在法律系开“社会主义”课。到了10月，又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课。同时，还到校外其它学校讲课，在女子高等师范、北高师（今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和“图书馆学”等。

第二、积极撰稿，发表文章。他在担任图书馆部主任期间，撰写和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

第三、重视图书馆的技术问题，提倡管理人员的业务训练，他把图书馆工作者获得业务知识的训练看作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⑩为此，他除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兼讲图书馆学课外，还在1921年12月1日的北京《晨报》上发表题为《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的文章。李大钊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考察了美国十七个图书馆学校的简史，着重地考察了学员入学的条件，需要本科大学四年毕业的，21岁以上，35岁以下。这样，就使得图书馆工作人员既懂得某一专业的知识，又掌握了图书馆的技术，这也就是现在美国所实行的所谓的“双学位制”。同时，还具体考察了几个学校的课程内容，并从几个学校的课程内容的比较中，找出它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的课程，从而提出了图书馆学的一般性的课程。

这一点在今天尤为必要。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目前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偏低，从北师大图书馆来看，具有大学本科毕业水平的人数不及一半，他们之中经过图书馆专门训练的就更少。图书馆专业毕业的本科生也很少，而且他们掌握的其它专业学科的知识也嫌不足。

四、发动群众共同建设图书馆

这里所说的群众包括专家及一般的大学生。要想把图书馆办好，没有一批比较固定的热心于图书馆事业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光靠图书馆本身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李大钊主持图书馆工作期间，极为重视依靠群众办馆，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如1920年7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刘复教授《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1920年9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顾颉刚教授

草拟的《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1920年9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吴康关于《〈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之商榷》。在图书采购方面，李大钊提出：选书“必须经过具有专门学识的人审查”，才能经济，符合实用。在分编工作中，他也注意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开展图书馆的事业。如当时北大图书馆有各种文字的（英、德、法、日等）外文书籍，急待整理上架。可是，当时图书馆中又极其缺乏懂得外语的人才。李大钊便采取“义务劳动”的办法，邀请几位熟悉外文的同学来帮助整理，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工作了一个时期，外文书便都可以上架了。

我们仿照这种做法，邀请了几位图书馆系的同学，利用暑假突击整理了旧中文期刊的目录。这项工作是很迫切的，可是，解放已经三十多年了，却一直没有整出一套解放前中文旧期刊的读者目录，经过突击，只用了两周的时间就做出了一套解放前旧中文期刊目录草片，创造了使用这些期刊的初步条件。

五、注意研究图书馆的建筑结构。

李大钊去清华大学参观时，对清华大学新建图书馆的结构观察得极为细致，作了如下的描述，“其建筑方法，全用瓦石钢铁等材料以防火险，现方在纠工葺造中，然大体规模已具。书库与阅览室各别而相毗，以便出纳。书库拟筑三阶，由上至下每隔二尺余之砖墙间以通天之长牖，用铁栏钳以玻璃，可以开合，以便空气与阳光常常注入，可免晒曝书籍之劳，而无虫蚀腐烂之患。阅览室之书架及一切什器皆量室之容积而为配置，均皆精妙适用，将来全部落成，当益完备可观也。”^①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李大钊对图书馆的建筑

思想有以下几点，1、建筑材料要有利于防火；2、建筑结构，要能防潮，采光、通风设备要好；3、书库与阅览室要同层高而相毗连，以便于图书的流通和出纳；4、阅览室中的设备要“精妙适用。”这些思想至今仍然适用。只不过现代化的图书馆的建筑思想比这更丰富，更先进罢了。

结 束 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较解放前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和我国是一个具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相比，和“四化”建设的需要相比，都差得很远。早在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总理强调为发展我国科研工作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指出其中“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这些指示是极为重要的，切合实际的。但是，由于二十多年来“左”的思想影响，这些指示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致使我国目前图书情报工作处于落后的状况。在国际上也有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件事震动了全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指派其科学顾问组织调查。1958年发表《贝克报告书》，1960年艾森豪威尔下令图书馆员应由专家担任，并享受同教授、工程师等一样的专家待遇。1962年公布《克劳夫特特别工作小组报告书》，1963年公布《韦伯格报告书》。美国国会也组织了调查。所有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共同的要点：美国科技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在科学情报的流通不够灵活，信息检索系统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全国性的情报网没有建立起来，情报管理效能低落。这些报告建议，改善情报系统，把消息传播看作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由研究人员担任资料处理的工作，建立全国性情报网。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图书馆服务及建设法案》。拨款给各院校图书馆作为充实建筑，设备，训练人员及研究图书管理之用。第一年实行。就有1800所院校接受支援。1966年约翰逊总统下令设立全国图书馆咨询委员会，同时，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表《公共图书馆系统的最低标准》。由此可见，美国图书馆真正成为现代图书馆也只是近二十年的事。这个变化是在美国受到震惊后，经过冷静的思考，而做出的决策。

我国“四化”建设的实现要能得到切实的保证，图书馆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赵紫阳同志曾经指出：“信息在经济建设中，在未来的发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信息系统是我国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要把信息当成一个大问题抓起来。”最近，邓小平同志为《经济参考》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这表明党和政府已将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的现代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希望有关部门加以落实。

作为图书馆工作者，但愿在纪念李大钊诞生95周年之际，继承他的图书馆学思想，结合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为把我国图书、情报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努力奋斗！

注：

①关于李大钊接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部主任的时间，其说



2 027 3285 5

不一，有的书上写作1918年2月。据《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中“职员一览表”记载，图书馆主任章士钊于“民国七年一月”离职，李大钊是在章士钊离职后到北大担任馆主任的。1918年1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载“进德会报告”，其中甲种会员名单内有李大钊的名字。因此，本文把李大钊到北大图书馆担任部主任的时间定为1918年1月。关于李大钊辞去图书馆部主任的时间，其说也不一致，有的说是1922年春，有的说是1921年。但据1922年12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的《李守常启事》：“鄙人已辞图书主任职，本校同人如有关于图书部的事件，乞与图书主任皮皓白先生接洽可也。”因此，本文将李大钊辞去图书馆部主任职的时间定为1922年12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③《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28日

④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的演说词》

⑤李大钊：《致北大日刊记者书》

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0页

⑦见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图书馆主任布告》

⑧《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2日

⑨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43页

⑩同④

⑪《致北大日刊记者书》，1918年3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第95号